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足音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序--永久的笑脸后面是辛勤的汗水

小莉要出书了，这是她的幸事，也是凤凰的幸事！

她请我为此书作序，难住了一贯以“低调”为原则的我，耐不住她再三再四诚挚地邀请；更耐不住对她在凤凰辛苦劳作战功卓著的回顾，我“从命”了。

小莉是最早进入凤凰卫视的台湾主持人。1996年“凤凰”开播初期，她离开卫星电视台湾频道，重回香港，加盟“凤凰”。从此在这个崭新的舞台上，她的技艺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推出一个杰出的电视主持人，不讲天赋是骗人的。小莉就具有这种天赋。她的屏幕形象，抢眼却不妖艳，可亲却不平庸。她的主持风格，庄重中透着轻柔，聪颖里裹着质朴。看她主持的节目让人感到既掷地有声又娓娓动听，既不卑不亢，又有义有情。她的这种超凡脱俗的魅力，实在让许许多多的同业者羡慕又嫉妒，爱煞又恨煞！

小莉的成功，更多的理由是来自于她自己的勤奋。她那“永久的笑脸”后面就是辛勤的汗水，《九七回归60小时播不停》，她连续3天带妆作业，诱发严重的皮肤过敏症；采访朱镕基总理欧洲之行，她集采、编、播音、发稿于一身，累到几乎脱水休克；有时《小莉看时事》节目因忙碌无法即时完稿，急得她痛哭失声，哭罢再挥泪上阵；工作压力最大的时候，她会悲叹“我实在顶不住了”，可事过之后，她照样笑容可掬地出现在观众面前。

小莉的成功，得益于凤凰的崛起。诞生不到三载的凤凰卫视，以其勃发的生机，在亚太地区异军突起。所有的凤凰人，都抱定了“我们在创造历史”的雄心去打拼。小莉参加主持的《时事直通车》及《小莉看时事》这些深受观众喜爱的节目，正是他们倾心创作的产物。

“凤凰”造就了小莉，小莉也为“凤凰”争了气，李白有诗云：“凤凰台上凤凰游”，小莉和凤凰台一批出类拔萃的主持人及其主创人员正是这样一群展翅高飞的金凤凰。

刘长乐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1998年7月16日

于美国爱德荷州

堂堂溪水出前村

1990年代末期，在港中台的电视圈中，吴小莉卓越的表现，就像一颗闪亮的明星，那么耀眼，那么令人瞩目。

然而，在1989年之前，我刚认识吴小莉的时候，她刚考进台北的中华电视台，在新闻部初任记者，正接受训练与磨练，是新闻界的新兵，尚默默无闻。

何以在短短的10年之间，吴小莉脱颖而出？话说1988年，吴小莉进华视新闻部时，我刚接任新闻部经理，准备一展抱负，挽救久受垢病的华视新闻。在一些“菜鸟”记者中，我一眼就相中了吴小莉，看准她是一个主播

的料子。果然不出我所料，小莉聪明又努力，工作的绩效令人赞赏，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小莉豪爽的个性，乐于助人的态度，在争名夺利的电视圈子真是少见，也加强我要培植她的信心。

一年后，随着华视新闻品质与收视率的起飞，吴小莉在采访报道与播报方面逐渐可以独当一面，颇有大将之风，可是她仍不改清纯本色，对人处事谦和有礼，毫无骄矜之色，真是难得。

其后几年，吴小莉转换舞台，在香港表现得极为出色，为更广大的观众服务，成为大华人电视圈的名人。她当初毅然跳脱是非之地，敢于舍弃小格局的名利，投入新的战场，而卓然有成，显然是出于过人的眼光与决然的勇最后，我引杨万里的诗“杜源铺”，以形容吴小莉奋斗成功的经历：“万山不许一溪奔，烂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黄新生

台湾政治大学广播电视研究所教授

中华电视公司企划室经理

于台北

1998年7月5日

无时无刻不是在职进修

1985年七月底，我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辅导长两任届满，获中大同意休假一年。在此之前，我已应台北辅仁大学校长罗光总主教之邀，8月中到了辅大，担任大众传播系主任。

从1977年起，我在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任教8年，在中大校园度过愉快的时光。初到辅大，急着安排下一学年的课程、师资，忙得不可开交，不禁怀念起惬意的中大生活。大众传播系当时分为语文传播、影像传播、广告公关等三组，其实是3个系，有3套课程和师资，却只有一个系主任。全系学生超过700人，比中大新闻传播系学生多了六、七倍。

我的“休假”比在中大教学时忙得多。系主任面对每天穿梭在“文友楼”的700多学生，简直无从认识起。小莉这时是语文传播组二年级学生。她活跃、爽朗、有礼貌，这是她留给我最初的印象。等到她修了我的“杂志写作”课，更引起我的注意。她们那一小组自定的写作题目是殡仪馆美容师，亲自到殡仪馆看遗体化妆。小莉原来不是娇娇女；这次采访不止是表现了她的胆量，更重要的是记者的敬业，她在学期间整体的表现，可说是绽放了优秀记者的潜力和特质。

小莉毕业后，再见到她时是在中华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一般记者尽了采访职责，不见得每天都能挤进只有20几分钟的晚间新闻，小莉往往一天出镜好几则新闻，我记得她跑当时冷门的消费者新闻时，居然每天也有新闻。她不过才进华视新闻部，冲劲却是锐不可挡。

大约隔了半年，小莉坐上主播台。起先我为这么年轻的学生当主播有点担心。

她很快证明，替她担心是多余的。

她的记者生涯虽不长，却很扎实，加上敬业、进取的活力，以及一贯的笑容和亲和力，吸引了广大观众。年纪轻轻的她坐稳了主播台。

在适当的时候，她总会做最好决定。她转入卫视中文台赴香港任职就是一例，从此扩大了她发挥的空间。我每次在台北或香港见到她，她总是念念不忘念研究所进修的事。我劝她，进修是一辈子的事；当有好机会时，把握住机会更重要。她至今虽然还没有得空到研究所进修，我认为以她的虚心、进取，无时无刻不是在职进修。

小莉不久前从香港来电说她要出书了。我很乐意为她写这篇序。这本书的出版，对有志于电视工作的人以及广大观众都是好消息，她的人生历练虽不长，却留下许许多多足以启发人及值得借镜的地方。

皇甫河旺
台湾世新大学教务长
1998年7月

自序

写的比说的动情

事实上，我是个极为慵懒的人，有选择的话，我会看山看水叹世界，所以除了工作外，对个人的事，我总是漫不经心。

1993年离开台湾时，台湾已有出版社找我出书。那时台湾刚流行出个人传记，几家出版社都提出了企划案，我也兴致勃勃地参与讨论，甚至开始进行录音口述，也许是追求完美的个性，老觉得自己不够丰盛，或是骨干里懒散的性子使然，心想：“又不是做节目非得今天面对观众！”就这样两天捕鱼，三天晒网，要出书的心愿，就一拖再拖。

今年3月明窗出版社的潘耀明总编，透过同事找到了我，谈到了要出一本传记加采访手记的书。多年来被放下的心事，又重新被提起，但这回可不同，潘老总是典型港式作风，做起事来，不办则已，要办就要风风火火，我这个懒惰的人在他的行动力下，终于不能再“晒网”，要开始认真“捕鱼”了。

一直觉得自己说的会比写的动听，加上四处奔波的忙碌，原本打算口述，但一个周末，在朋友家中，拿出稿纸，写第一个我的童年故事后，突然觉得，许多心情，可能是写的比说的动情，这就开始我一格格爬稿纸的日子，向公司请休年假把去年的假期注销，回台北家中或在香港小窝，闭门造车。

真的动笔到完稿，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期间，不算我因工作出差、忙碌的日子，只有年休和周末是我真正的创作日。所以，许多心情，许多故事，肯定有疏漏和不足，一定要说，真的是“仓促付梓，如有疏漏，尚请见谅！”完稿日，突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生命的历程虽不长，但过往累积的东西也并不算太少，担心自己年老记忆衰退，很多事会愈记愈模糊，终于在记忆完全褪色，资料可能都翻查不到前，把它记录下来。这其中没有什么人生大道理，只有一个女孩努力成长的故事。

知道因为自己的忙碌和迟迟交稿，把明窗出版社同仁逼得鸡飞狗跳，但是，我真的衷心感谢曾经催我交稿，为我排版、校稿，不断为这本书付梓

而默默工作的朋友——潘老总、尤飒、翠芬、蒙宪、锦兴、淑群、晓珊、志光以及所有曾敦促过我和在台湾帮我翻查资料的朋友们。

还要感谢凤凰同仁的支持，公司管理阶层不但大力赞成我出书，还不时关心：“书写得如何了？”几位前后期长官、老师的序，为这本书增添光彩，也为我前半段求学、工作历程留下注脚。

最后，我只想说一句话——

谨把此书，献给我挚爱的父母，是你们让我有机会去圆人生的梦。

吴小莉

1998年7月14日

于香港

写在内地版出刊前

有人问我，“怎么想到要出书？”我认真想了想，原因有三个，一个是在这本书的内页，我已开章明义的表白：“谨以此书献给我最挚爱的父母。”移居香港5年，我回家看父母的时间越来越少，思念的心却越来越深，我想他们亦然。我在香港的生活如何？这几年大江南北跑的心情如何？他们无法一一得知。现在，我把它们记录下来。

第二个原因，我在香港版的序中已说过，我真的是怕，“忘性”比“记性”好的我，对许多生命中的故事会渐渐淡忘。

另一个主因，是我对所有观众的一分感恩。因为，除了在屏幕上的交往外，越来越多朋友，在网上，在书信上，给我支持和鼓励，他们对我也有许多好奇和询问。这其中有个人的问题，也有工作上的。抱歉的是，生活如“空中飞人”的我，常常对即时回信，力不从心。我是一个答应别人一件事，就会一直挂在心上的人，对所有观众的来信更是如此。几经拖延，我内地版的书终于要问世了，我突然有种前债终于有机会清偿的轻松感，因为，我多么希望，先以这本书，回覆所有朋友的厚爱。

在写这篇文章前，北京传来消息，说我在香港的书《圆人生的梦》在内地已有盗版。

到广西采访时，一位朋友兴致勃勃地拿了我的“书”，要请我签名。我当场不知是喜是忧，我向这位朋友致上最深的歉意，因为我内地版书的推迟上市，才使他被不法书商蒙骗上当。

但原谅我最终无法在“盗版书”上签名，因为看着原本精美的图片，清晰的文字，都成了叠影，一些被我放入书中朋友的照片影像模糊，我真的有心痛的感觉，我的朋友们何其无辜？花钱买了劣质品的读者更是无辜！

内地版新书的姗姗来迟，是为了它能有更丰富的内容。它有我98年下半年生活工作的所有足迹，有我亲人和挚友对我的话，更有为了出书，专程拍摄的个人彩照。

一直相信，凡经历过的，必留下痕迹，岁末年终，谨把我曾走过的足印，呈给所有的朋友。它虽然并不一定掷地有声，但却是我心中永远回荡的“足音”。

吴小莉

1998年12月18日

于香港
海逸旁

第一章、我的童年

父亲唯一一次期待的女婴

一个风和日丽的秋日，一位中等身材相貌英武的男士在台北和平医院的产房外来回踱步，口中喃喃念着：“母女平安，母女平安！”“哇！”一声，娃娃落地，如他所愿是个女孩，更重要的是母女平安。这个家中第五个女孩，他取名小莉，因为一直希望有个男丁的父亲终于认命，决定不再努力。所以我在家中姊妹莉字辈当中排名最校谁知道5年后，他们不小心又为我添了个妹妹，只好取名莉莉。自此，家中再加上母亲一人，正好是“七仙女”，父亲美其名为女生宿舍“舍监”，实际上却是家中的绝对少数。

至于，为什么说我是父亲唯一一次期待的女婴，原来，一向“重男轻女”（我们六姊妹小时候都这样认为）的父亲，在母亲怀我时，兴致勃勃地跑到台北著名的金龙寺抽签。第一签上写着“六甲生女”，父亲不服气，心想我已经有四个女儿了，当下决定再试试手气；第二签上写了“六甲生女，吉”，不会吧！他想再试试；第三签上写明“六甲生女吉，生男，凶。”这一看，把父亲吓坏了，他立刻改变奢望，每天祈祷只要生个健康的女孩就好。

在我开始懂事后，父亲带着一家大小到寺中还愿，才告诉我这个故事。从此，我头上像戴上光环一般骄傲无比，后来我知道父亲想要男孩，不是因为不喜欢我们这群娘子军，而是因为他只身到台湾，艰苦奋斗了一辈子，希望能在台湾传宗接代。我当时立刻拍胸脯说：“不怕，爹地，长大后，我也找个姓吴的老公，这样，我小孩也姓吴啦，别人分不清楚是他的吴还是我的吴！”（按：我父母都姓吴，不过一个是浙江吴姓，一个是台湾台中吴氏。）“或者，将来我招赘！”我接着说！

虽然是童言童语，但却使父亲乐了半晌。

我虽然是被期待的女婴，却不是个漂亮娃娃。母亲的话是这样说的，“你刚出生时，全身是毛，皮肤红红黑黑的，像只小猴子！”就因为长得没有姊妹白皙漂亮，所以小时候种牛痘（以前在台湾，每个小孩都要打一种预防天花的疫苗，打完之后，常会留下一个颇大的痕迹），我是打在手臂和大腿上，四姊则在母亲刻意要求下，打脚底下，因为四姊长大了要寻中国小姐”。等到我长大了，台湾正好恢复选美，母亲兴趣盎然地问我：“要不要参加？”我毫不犹豫地嘲笑她：“哈哈，后悔了吧，小时候嫌我丑，把我种这么大颗牛痘印，现在去选美，裁判都看得到！”我的答案当然是“不！”只是母亲不知道，这两颗可爱的小痘成了我最好的挡箭牌，作为掩饰对自己身材没有信心的好藉口，而母亲，也再没有提起要我选美的事了。不富裕却十分满足的童年我有位朋友喜爱看相，一天他看着我说，“你五官长得好，但是额头偏窄，小时候家境不好。”我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心中却有些许赞同。

相较于四姊，她的天庭饱满，又圆又高，我的额头既不圆突，也不宽

阔，小时候还为了姊姊有美人尖，我没有而伤心。后来人家告诉我：“瞧，你有许多小须须，那叫胎毛，有胎毛的小孩当然看不到美人尖，你把胎毛剃掉，就看到了呀！”这我才释怀。这位朋友说面相是由上往下走，小时候的家运要看额头，不信的话看看你四姊，她小时候你家环境应该比较好。

我回家请教母亲，母亲笑着说，“对呀，我生你的时候，你父亲 38 岁，刚因为肠胃不好身体不适而提早从军中退伍。他没有社会经验，头几年家里开过杂货店、书店，什么都试过。”（父亲 18 岁从军，退役前一直是职业军人，后来进了浙江同乡会，最后在故宫博物院做公务员，家中生活才安定下来。）或许因为当时太小，或许因为父亲保护得太多，小时候，我从来不觉得生活有什么匮乏。小学时填家境资料，我总是理直气壮，骄傲地填上“家境小康”，只差点没补上“而且幸福美满”。倒是母亲经常用来描述我调皮的童年往事，现在拼凑起来，隐约可以看到父母当年在社会中挣扎，养育我们家众姊妹的辛劳。

妈咪说：“你可鬼灵精怪了，那时候我帮你爸看杂货店你还不太会坐，只能抱，邻居大婶来聊天直夸你乖，因为你就趴在我肩膀上，也不哭闹，也不乱动。但当我转过头一看，原来你已经打开架子上的糖罐，吃糖吃得亦乐乎！”（后来这个杂货店，没有被我吃垮，却也因经营不善而倒店，我早就看出，我那一板一眼又老实的父亲是不适合经商的。）我想，我终于为自己喜欢吃甜食找到藉口了。

为了贴补家用，一向是家庭主妇的母亲，开始趁姊妹们上学时学习织毛衣。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帮母亲捧着十几件织好的毛衣一起去“交货”。因为一手交货，一手交钱，拿回了工钱和下一批成品的毛线材料后，回家途中，我肯定可以要到一些零食吃。

回到家，母亲为了应付我这个小捣蛋，会煮好一锅我最爱吃的绿豆汤，放在冰箱里，我一吵闹，骚扰她织毛衣，她就准许我开冰箱吃甜品。

有一次我一口气把一锅绿豆汤喝完，结果腹泻不止而被送到急诊室，并在加护病房待了一晚，这是我这个健康宝宝生平第一次住院。母亲为此内疚不已，我却完全不记得医院这档子事了。只记得，小小的个子，双手拉着冰箱把手，想用体重开冰箱的情景。

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每个月一次免费的军眷油米配给对家里总是件大事，只要听到“送米车到”，村里的小朋友先是争相走告，然后各自飞奔回家，母亲教我要把公家油瓶里的油尽可能倒在家里的油桶里，因此我就像个小监工，倒转油瓶，看着它一滴不剩了，才肯将油瓶还给送油工人，看着油米满屋，我直觉“民生富裕”呀！另一件让我感到兴奋的事，是早上起床，妈妈给我些零钱，到村外大街上买“早上菜”，即是一些台湾传统配送稀饭的早点，大红豆、面筋等。回家后，大家看着母亲把每个咸鸭蛋平均切一半，一个小孩分半个。挑食我因只爱吃蛋黄，所以老被母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长大，看到满街加工处理过、不见咸白、只有圆润鲜嫩的蛋黄时，我总是垂涎三丈的缘故。但是那滋味，却始终不如小时候和姊妹抢着吃的那半边咸鸭蛋。

多年后，母亲又招认了一件事，“你们知道为什么我都是除夕夜才带你们逛街买新衣吗？”“知道呀！你说过新年要穿新衣戴新帽呀！”我说。“这个也对，但是最重要的，是第二天就过年了，除了折扣打到最低价外，还可以再杀价。”母亲得意他说。

乖乖！这一下又把我儿时的童话故事给打乱了。每年除夕，全家围炉、磕头拜年、领了红包后的年度大事，就是趁午夜钟响中国新年来到前，赶紧上街买新衣，它的神圣程度，就像西洋圣诞节，圣诞老人会在平安夜送乖孩子礼物一样。但是原来我的圣诞老人是会贪便宜的。

而母亲的杀价本领的确一流。多年来，我们母女也培养出“合作默契”，母亲告诫我“即使你很喜欢那套衣服，也绝对不能让店员知道，只要告诉我，我帮你想法子。”母亲的方法是一面问价钱，一面嫌这里裁缝得不好，嫌那里也不太满意。

店员若热心地问：“太太说要多少钱呢？”母亲摸摸布料，立刻从对折到七折开始杀起，如果店员不肯，最多加个几百，然后拉着我头也不回就走，一副你不卖，我去别家了。虽然我老大不情愿，但也总乐意合作，因为母亲猜底价之准使这招屡试不爽。我们总会以满意的价格成交。而我从此也对所有的标价极不信任，认为那是参考价。直到台湾推行商品不二价，母亲开始不爱出门逛街了，因为她说她“英雄无用武之地”。

父母在我儿时勤俭生活的点滴，不但形成我对许多事物的特殊情感和对周遭一切的珍惜，他们更造就了不少的财富。

想想看，在我读大学时，父母手中已有4栋房子（后来陆续卖掉两栋），银行有储蓄，6个女儿除了我和妹妹还在念书外，姊姊们不是已有归宿，就是完成学业，有了稳定的工作。

倘若问我佩服的人是谁，当然排在第一的就是我父母，他们不但没有令我感到生活的艰难，更让我有一个富足而美满的童年，使一直以来的我都坚信，生活是你想要就没有你做不到的，这份对生活的安全感和自信，也成为我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没有篱笆的眷村——一个在眷村长大的女孩别怀疑，照片中的“他”就是我，或许是因没有儿子而萌生的补偿心理，也或许是眷村里男孩多，从小，母亲就把我当男孩养，短发短裤。一直到我上了大学，才有了“自主权”，决定留长发。

眷村顾名思义，是军眷的聚居地，它像个小中国。巷口卖5毛钱一个包子的刘伯伯是山东人，对面马伯伯来自江苏，而我的祖籍是浙江。

眷村是既开放又自成一格的王国，村口有道铁门，可以打开进到村内。各户的院子都没有篱笆墙，早期最多只有竹篱笆，打开窗就看到对门。由于家里都是女孩，对门马家都是男孩，我一出生，马哥哥们是轮流抢着抱。

有一年冬天，我感冒被关在家里，马哥哥在对门猛招手要我出去玩，我在窗口眼巴巴望向窗外，但再回头看看母亲后，还是对马哥哥摇摇头，意思是“我感冒了，妈妈不让我出门。”那时我才三、四岁，什么也记不清，只记得这像极了广告片情节的一幕。

眷村是个大家庭，母亲们到处串门子，小孩子则玩在一块，这里藏不住秘密，有好东西也是大家分享。记得我们家第一次有电视机，可以说是村里，至少是我们这条巷里的大事，一到晚上电视节目的黄金时段，左邻右舍便带板凳、拖小椅于全集中到我家一起看电视，我也高兴得像个主人似的，一会倒茶水，一会送瓜子。

翻开儿时的旧照片，我们家每个小孩肯定有一张和家中电视机合照的相片，你一看就知道，那时“电视机”是家中多大的骄傲只是父母可能没想过，有一天，他们的女儿也会走进了电视机里。

长大后，常听人说眷村的小孩会结党结派，互相斗狠斗强，但那绝不是定论，至少在我们眷村就不是。

和邻近眷村小孩的交往，我只隐约记得有年端午节快到时，我和四姊的同伴从我们住的陆军崇仁新村，跑到隔壁的空军眷村，偷摘包粽的竹叶子。我大小不会爬树，唯有在地上把风，结果主人追来，一伙人撒腿就跑，我这个小跟班被抛在最后，心里还直担心会不会就逮到我一个？现在回想起来，如果眷村小孩真像外传的那么强悍，相信我就不会跑得这么心慌了吧。

但是眷村的小孩真的是很团结，每年元宵节，村里会组织灯笼队。最有本事和最年长的大哥哥获选为“火把手”，每人手拿一只火炬，前后保护我们中间这群男男女女的小萝卜头们，天黑后带领灯笼队上街玩。这时候，你从远处观望就会看到前后两只高高的火炬，中间一排矮矮的小烛光。如果走到黑暗处，或是那些小烛光灭了，就会听到“啊！”的叫声不断。我们嘴上爱嚷嚷，但是心里却踏实得很，因为我们知道村里的大哥哥是不会抛弃我们的。

潜村的童年，让我在台北闹市中拥有类似乡村的田野乐趣。儿时的我，没有性别认同，只有玩伴认同。我与女孩一起就玩扮家家酒；和男孩一起就打弹球、玩纸牌、抓金龟虫、烤地瓜（蕃薯）。最喜欢玩到精疲力竭，灯火阑珊时家长们大喊：“回家吃饭了。”一群朋友才打道回府。吃完饭，洗完澡，如果是夏天，家家户户又搬出凉椅，拿把扇子，在没有围墙的院中，数星星，说故事...说到睡意渐起。

我的姊妹们——姊妹情深

“你是我的姊妹，你是我的 baby，不论相隔多远……喜欢张惠妹的这首歌《姊妹》。喜欢它奔放的张力，更喜欢它的含意。可能因为家里姊妹多，也可能是长大后外面的“姊妹”朋友也多。6个姊妹聚在一起，就是一个“闲人免进”的世界。

母亲结婚早，大姊长我足足 15 岁，结婚时，我还是她的花童，二姊的女儿，我的第一个外甥女只小我 9 岁，这一串连下来，家庭成员的“代沟”，就给冲淡了。所以上达 10 岁，下通 10 岁，都能成为我的“同辈”好友，绝无代沟。姊妹间的年龄差距大，不过三姊和四姊相隔两年，又同一天生日是个例外。

据说，那年，一家人正要为三姊吹生日蛋糕时，母亲突然嚷着要临盆，结果生日也做不成。母亲从医院回家时，家中又多了一个小捣蛋。除此之外，长姊如母，六姊妹都是一个抱着一个长大。

小时候，因看了恐怖片《鸦魔惊魂》，晚上睡不着，我会偷偷爬到四姊床上，要求一起睡，当小妹长大到能被带出门玩时，我做姊姊的骄傲立刻涌现，我把她放到我的小三轮车里，带着她到村里“闯荡江湖”。

即使四姊老大不情愿，但她也摆脱不了我这个“小馒头”（我们家从三姊开始，由莉字辈排名，四姊叫曼莉，小学时绰号“馒头”）。我进小学一年级，四姊念五年级。每天中午，我上学时为她送便当，同学们就会笑着大叫：“大馒头，小馒头送便当来啰！”等到我升上六年级，小妹刚进小学，如果轮到我们班当全校纠察队，每到午休，我这个纠察队长，第一站一定巡察小妹那一班，充当捍卫战士，看看有没有人敢欺负我小妹。

姊姊们出嫁后，每年大年初二回娘家的日子就成了我们家的大事，而我最喜欢这种亲朋满座的热闹。外甥辈自有儿童天堂，姊夫们和父亲把酒高论，姊妹们则聚在一起，谈天说地。

大姊或许是负有长女的责任感，在我儿时的印象中，她总是沉默寡言，默默做事。念书时，她一定想法子塞零用钱给我们这些妹妹。

二姊珍珍是另一个典型，乐天而活跃，特别爱说故事。我想我小时候是完全被她迷住的，我们许多儿时的故事，也是她为我们“揭秘”的，“你知道莉莉小时候最怕什么？”“什么？”众妹妹问。“老鼠和珍珍，只要不乖，说一声珍珍来了，小妹就会跳到椅子上，不敢作怪！”二姊绘声绘影他说。说完，她还做一个常人绝无法做到“上眼皮外翻”的恐怖表情，吓得我们这群小辈，直点头称是。

说到得意处，二姊会翻出以前一张迷死人的黑白照片，讲述她小时候离家出走，被好心的李行导演送回家的故事：“如果我珍珍出道，哪有甄珍（台湾早期非常著名的演员，和二姊名字同音）红的份？”“当然，我还要再瘦一点再高一些就好。

她补充说。这种每年一次相聚说故事的传统随着三姊远嫁哥斯达黎加、我赴港工作，而无法定时聚齐，但每次的聚首，更显珍贵。

今年（1998年）年初，我回台北和家人过年，姊妹们照例是回首往事，不同的是男士们加入，二姊揭发了大姊的恋爱故事，原来木呐的大姊夫和大姊、二姊同一个单位工作时，曾公开称赞大姊比二姊长得漂亮，使二姊耿耿于怀，到处追查是谁说的。想不到，大姊夫此招成功，果然吸引了大姊的注意。四姊和我年龄相近，所以俩人开始互谈恋爱史，大方的四姊夫，只在旁开心地笑。

看着身边印象中永远只停留在36岁、但实际年龄早就不是了的大姊有了白发；而和我一起念书、第一个考上大学、成了家中众姊妹学习榜样的四姊已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对此我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但是一家人的感情没变，只是不断在增添新血，壮大力量。

几个月前，大姊生病住院，在台北的姊妹姊夫轮流守候。姊姊开玩笑说：“好在家中姊妹多”。这个说法，一度打乱我未来只想生两个小朋友的计划，你想想，“人多好办事呀！”朋友们常问，你们家姊妹长得像不像？我都笑着说，“不像，一人一个样。”但事实上，我和妹妹是有些像的，到现在朋友打电话来，还会把声音认错。

在我的青涩年代，妹妹活脱是我儿时的翻版，活泼精灵。到了她的青少年叛逆期，才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我一直归咎于是我和四姊的成绩，以及在她成长时和她分享太多的心事，造成她早熟和压抑。

到了我从事传播工作，积极入世，她却笃信佛教，虔诚出世，自此就愈来愈少人提及我们长得像了。

5月，小妹结婚，看着她难得“粉墨登潮”的结婚照，母亲感慨他说：“你们长得还是挺像的，”而我爱极了小妹那温婉的婚纱照，如果说我有入世的光芒，那么小妹则有一份我所不及的出世的恬静。

随着年龄渐长，我和众姊妹的关系，更进入另一种谈心的阶段。3年多前，在银行做电脑软件设计，工作了10年的四姊突然和我商量，说她想转换工作，做保险业务。

我诧异地看着她，一向含蓄保守的四姊，要放弃安稳的高薪环境，从事一项和她个性完全不合的新工作。

“我就是不想老躲在那里，每天面对着同样的机器，我想走出来。”她坚决他说。

从小求学、求职都十分平稳顺遂的她，第一次那么坚决要走自己的路，对于我这个早就到处走惯的人来说，我知道要她放弃安稳，对已身为母的她，会面对多大的家庭压力。我拍拍她的肩，只告诉她：“我支持你。”之后，几次的谈心，她告诉我，她学会如何向陌生人开口，如何“扫街”，像传福音似地沿街向屋里的人介绍保险是一项生涯和理财的人生规划，她的确有份传福音的虔诚，而我是如此为她的勇气骄傲，因为她做到许多我都做不到的事。同时，我也看到她的转变，一起去健身房，她不再害羞，而是比我还热情面对外人，主动和身边的陌生人谈天说地。

几个月后，她告诉我，她荣升主任，有了自己的办公桌。又有一次她打电话到香港给我，说因为业绩好而应邀向同行演讲。她认为我比较有经验，她问：“要怎么说，说什么好？”再有一次她负责统筹一场晚会，兼任主持，她问我怎么办？我告诉她“ To be

yourself”，同时我托人带去了一套晚装给她应急。她后来传真告诉我：“晚会做得怎么样就不用说了，但是那套晚装，大家都说好看！”放开了心的四姊，在年初的家庭聚会中，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不知道你小时候对我有多大的压力！”我惊讶地看着她，“你不是家中读书的榜样吗？”“你小时又是班长，又是演讲又是朗诵比赛，妈妈老是拿我和你比，说我胆子校”她补充说。

现在，这位我儿时的“大馒头”，已经走出自己的路。四姊的故事，也成了我每次应邀演讲，谈到生涯规划，讲到人生转折时必提的榜样。

传真机又传来四姊的字迹：“暑假全家出游，有空参加吗？”三姊远在美国，四姊成了家庭活动的组织者。给她回电话时，我说很快回台北，但要闭门写书。“哇！我想爸妈是很为你骄傲的！”她诚心他说。我想，我的姊妹们又何尝不是！

“你是我的姊妹，你是我的 baby，当我能够飞，飞越了云霄，我一定要你看到……”耳边又传来《姊妹》这首歌。

我的父母——夫唱妇随

“少时夫妻，老来伴。”这句话印证在我父母身上，再真切不过了。虽然他们斗嘴从年轻斗到老，但是彼此依恋之深在日常言行间表露无遗，父亲回家刚进门一定先用他充满浙江味的口音大叫“秋锦呀！”（母亲的名字），他要知道母亲在哪！而母亲出门，也老是嚷着要回家，而那个家就是有父亲在的地方。我移居香港多年，母亲终于到香港看看我的香巢，原来说定住 5 天，但只做了 3 天“台湾女佣”，把我的巢内外打扫好，就吵着要回家，因为台北还有个“老的”要照顾（母亲对父亲的台语昵称）。但父亲总用蹩脚的闽南话反驳：“有多老！”“我对你妈多好呀！”父亲说。

“你妈可聪明了，晚上上了床，肚子饿，不明说反问我：‘振法（父亲名），你饿不饿？’‘不饿！你饿啦？’‘有一点。’”“我二话不说，起身更衣到巷口帮你妈切她最喜欢的猪头皮配面吃。”父亲说。

母亲得意地补充说：“吃完了，再把毛巾送到床前，给我抹嘴。”“你爸对我是不错，工作完回家，他会主动帮做家务，扫地擦地倒垃圾肯定是他的活。”这段对话，激起我小时对父亲的崇敬之心，父亲更成为我选择另一半的基本标准，“至少要像我爸对我妈这样好！”父亲是1949年到台湾的浙江大兵，母亲是早几代祖先从闽甬移民台中的台湾姑娘。

那年，父亲扎营台中，母亲家中经营冰店，她年轻时帮忙做生意，更是有名的“冰店西施”。

父母的这段恋爱故事就从吃冰开始，但是恋情真正有突破，是父亲孝顺的品德收服了外婆。从此，母亲这位千金小姐，就随父亲东奔西跑，最后来到了台北。

“你妈刚开始根本不会煮饭，还是我用军中的那一套手艺下厨！”父亲说。

“但是我学得很快，现在帮你请一桌客人都没问题。”母亲反驳。

这点我可作证，现在母亲不但会包饺子、做馒头包子这些北方菜式，而且“佛跳墙”、“臭豆腐”、“狮子头”这些南方菜，也都直逼饭店大厨，有时她还会试做“炒花枝”、“蚵仔煎”这些台湾小吃。我们这些小朋友，早就不肯吃父亲的“改良式浙江菜”了。

母亲的努力除了在做称职的家庭主妇外，也表现在她学习台北的生活上，因为抗日战争正是母亲的求学期，她的基础教育是用日语，所以她的日语比台语好，台语又比国语好。小时，我常看她闲时拿着报纸，一个字一个字努力地认，认不清的就问我们，现在的母亲早就能看懂整篇报道，还能和父亲讨论国家大事，更因为我在香港，她的敏感度还触及台湾以外。

“妈咪，我在深圳，要专访董建华。”我给母亲打电话。

“喔！我知道，他刚当选特首嘛！”母亲说。

“妈！我现在在英国。”“喔！我知道，朱镕基外访欧洲。”“妈妈，我明天要去北京。”“什么事呀？”“北大一百年校庆。”“喔！我知道，李远哲也要去！”她什么都知道。以前电视是沟通我们母女的媒介，现在电话也是。她随着我的移动，捕捉世界发生的大事。

和父母的关系，是我愈长大，他们愈显小，感觉他们是个“老小孩”，需要哄。

因为我长住香港，每次回家，就成了家中大事，父亲赶着买我爱吃的梨子，排骨汤的原料，母亲下厨炒年糕，而我，则会放慢在外面的一切脚步，陪他们吃吃饭，围炉聊聊天。

母亲爱听我东奔西跑的故事，父亲则是我的财务大臣，和我聊聊股票的情况，处理我台北的信件。如果我非得出门不可，我会在早出晚归时，都来个热情拥抱。

刚毅保守的父亲，原本并不自在，但现在，你如果不给他一个kiss，Say“Good Bye”，他可能还会不习惯呢！妹妹就感慨他说：“要学学小姊（小妹对我的称呼），懂得怎样对爸妈撒娇！”于是，母亲生病不肯吃药，小妹会打电话向我求救，我立刻挂电话到台北兴师问罪：“妈咪，怎么不吃药？”母亲也会半夜打电话来说：“心里有点事睡不着，想跟你说说！”如果说，我们小时是父母心中的一块肉，那么现在，我的父母是我不论到哪里心中最牵挂的人！

父亲与女儿们

“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这是父亲儿时最常拿来教训我们的话。原因是家中女孩多，一群女子在家中，就不甚“规矩”了。夏天，台北天气热，姊妹们常是一件长衫套头穿下后，就别无“长物”，我们轻松自若地在家中走来走去，倒是保守的父亲，坐立难安，看着“衣冠不全”的女儿们直呼：“没有规矩！没有规矩！”夏天到我家拜访，只要父亲在，应声开门的一定是他，因为门铃一响，但见家中一群女子往房里逃窜，穿外裤，披外套，整装去也，只有永远穿戴整齐的父亲可以立即见客。

原本对父亲的“大惊小怪”并不在意，因为从小如此。一直到我长大，和初中老师聊天时，才知道我儿时，父亲受了多大委曲。初中老师家中几乎都是男孩，他抱怨，新嫂子入门后，在家中极不自由，因为一向在家中袒胸露背惯了的兄弟们，即使天气再热，都不能再“袒程相见”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当家中姊妹个个贪图舒服，不肯穿着整齐时，父亲为什么永远衣冠端正。

9月，回了趟台北，少见地看到父亲赤膊着臂膀，他直呼：“热！”我则哈哈大笑，忍耐了50年，他终于“自由”了。随着小妹出嫁，我远住香港，家中又出现“男女平等”机会。白天，四姊的一双儿女是家中访客，父亲负责带小外甥，母亲陪外甥女，彼此“势均力敌”。已退休在家的父亲，对小外甥只愿腻着他，感觉颇为得意。小外甥不肯上幼稚园，父亲就拿分报纸，陪他到学校，“伴公子念书”，午睡时间到了，小外甥嚷嚷，要公公陪着睡。父亲也就名正言顺地告诉母亲：“我睡午觉去了！”看来，父亲终于一偿带带小男孩的心愿。

总觉得父亲是越老越豁达，越老越可爱，过去来家中做客的朋友，见到父亲，第一印象，总被父亲粗眉大眼。

似乎不苟言笑的外貌给震住，毕恭毕敬地听父亲训话后，再转头偷偷问我们：“你爸爸是不是说……”哈，原来父亲的浙江国语，不是人人听得懂的，再加上父亲的威严，使初访者更加紧张。

但对我来说，长期受父亲口音熏陶，使我现在闯荡大江南北，什么江西、湖北、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基本难不倒我。

至于父亲在工作中严谨、古板，不轻易流露感情的个性，则在我们这群没大没小的孩子们捣蛋下被破坏无遗。

“小莉，洗澡了，八点档连续剧要开演了！”“爸爸，洗快点，已经唱主题曲了！”说这段话时，我已上小学，但每晚，仍坚持“要爸爸帮我洗澡！”父亲既骄傲（因为我不找母亲，要找他）又要表现庄重地说：“羞羞羞！这么大了，还要爸爸洗澡！”童言无忌地我手舞足蹈着回答：“我以后出嫁了，还要你帮我洗澡呢！”父亲听后狂笑，心中却为这分父女感情欣慰不已。

随着女儿们长大，和家中环境好转，父亲脸上刚毅的线条，逐渐软化，幽默感也不时流露。

进入青春期，姊妹们各个说要减肥，只肯吃菜，拒绝吃饭，这对早年当兵，习惯每餐必须吃到米饭才算吃饱的父亲，简直是“大不赦”的罪过。

看着我们刚添上米饭，就“几可见底”的饭碗，他会解嘲他说：“哎呀！你们吃这么‘多呀！’我都要养不起你们了！”吴家有女初长成后，父亲的担忧更多。虽然不是灰姑娘的故事，每过午夜12点，钟声响起前得赶回家，否则一切会变回原形，但是聪明的父亲，使用苦肉计，每晚10点半过后，

就在家门口等人，明着说是怕楼梯间太暗，单身女孩上楼危险，真正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女儿早回家，也要看看有没有人送女儿回家，又是谁送回家。于是晚上到了一定的时间，吴家门口，会出现这样的景象，朋友送我回家的车刚停妥，就看见家门前已停了一辆车，四姊刚到家，后方又有一部车驶近，想来是妹妹回来了。

这个苦肉计，会一直用到父亲放心把女儿们交到另一名男士手中为止。

父亲，和浙江老家，对儿时的我来说都充满神话色彩。

父亲是家中长子，很早要负担家务，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在家乡教书的故事……孝顺的他，如何拉着已出家做尼姑的姑婆的手，送她最后一程，再勇敢地通知其他亲人——姑婆去世的消息。

长大后，有时友人会客气他说：“喔！你是浙江人，难怪，浙江出美女！”我总把这些话归功于父亲。

因为年轻时就离开家乡，在外闯荡，父亲除了练就了好体魄外，还有许多“土法”治疗术。“爸爸，我长针眼！（眼脸上因感染发炎形成一粒小脓肿）”我说。

父亲二话不说，拿起条红线：“来！我帮你治！”父亲会煞有其事地先检查一下，是哪一只眼发炎，如果是右眼，就在左手食指上绑上红线，一面绑，一面做出将眼中小脓肿摘下来的动作，嘴里一面念念有词，大意是“把针眼摘下来，绑在红绳中，打个死结，结死它”，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屏住呼吸，深怕打扰父亲施展魔法。不知，是否真的有效，总之，两三天后，针眼也的确消失了。

父亲还是“口水治疗法”的忠实信奉者。“爸爸，我被蚊子咬！”妹妹哭着说。

父亲立刻用唾液涂在被叮咬处，妹妹也慢慢不再因为咬得发痒而乱抓伤口。

但是，等我们长大了，开始信仰科学疗法，就不再找父亲“土法炼钢”了，因为嫌唾液不卫生，对“红线疗法”也找不出理论依据。

直到有一次，我在香港，因长期戴隐形眼镜，眼睛又发炎，长起了“针眼”，曾下乡做过“行脚大夫”的北京同事，热心他说：“我试试在你的手指上帮你绑绑线吧！”多么熟悉的一段话，时光仿佛倒转至儿时，我哭丧着脸，要父亲对我的“针眼”施咒语的日子。我惊讶地反问：“真的有效吗？”同事一本正经他说：“这是‘本草纲目’上记载的，叫‘指经扬目’，就是手指上的这些筋穴可以清眼扬目，所以要绑得稍为紧些，刺激到这些经穴。”我的天呀，儿时对父亲的崇仰之心，又重拾了回来，虽然不一定要有红线，不一定要念咒语，但它真的是有凭有据，只是流传下来，父亲可能也不知道它真正的原理，倒是，自己添加用来哄小孩的“魔咒”，成为我儿时的“吴氏童话”。

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心疼父亲，不只因为我不论长相，个性都像他，更因为我不能弥补他在台湾没有儿子的遗憾。父亲有段时间喜欢集邮，我刚好在台湾跑新闻时，和台湾邮政总局熟捻，每逢新邮票发行，我总有好几套纪念品，什么大全张、小全张、首日封，一应俱全，不懂得整理邮票的我，一股脑全移交给父亲，他也乐得为自己的集邮品添新货。

一次我回台湾休假，父女俩促膝聊天，他搬出过去的集邮品，如数家珍地告诉我：“这是十二生肖纪念邮票！”“那是你带回来的环保邮票……”

合起集邮本，他说：“将来这些都留给你孩子，我先帮你保管！”我想，我是家中，少数会耐心听他谈谈浙江老家，聊聊年轻时往事的人，虽然个性像男孩，也会和他辩论天下大事，但我终究不是男孩，永远无法和他有属于男人的 Men s talk。

倒是，长大后，父亲从来没有对女儿成群抱怨过，因为 5 个女儿嫁人后，他已有“两个半”儿子，等到我也“归队”出阁时，他会有 3 个儿子，和完整的 6 个女儿。

我的母亲

俗话说：“选媳妇先看丈母娘，”因为做女儿一旦为人妻，为人母之后，和丈母娘的行为模式可能会八九不离十。

我一直不愿认可这句话，因为在我家，一向是严母慈父，母亲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换句话说，就是扮黑脸。

儿时的我，认为母亲太过唠叨，脾气又坏，说什么我也不愿以后长大了像母亲。

但当年龄渐长，却发现“Like mother Like daughter！”有其母必有其女，有些事，不论好坏，你都得照单全收，因为那是母女天性。例如我的职业病，对人的好奇心，和许多事都勇于尝试的胆量，原来都是遗传。

台湾每年七、八月份，是台风季节，有时一个夏天，三四个台风过境不足为奇。小时住的眷村就在河堤边，台风一来，常是呼风唤雨，水位暴涨，母亲为了想亲眼看看台风过后，河水的威力，也想视察河堤关闸后，河水是否真的不会危及我们住的眷村，竟然带着几个小孩，穿上雨衣，上河堤看大水，儿时的我们，可乐了，因为可以外出玩，又下雨，十分刺激，尤其上了河堤，常是手牵手，用每个人小小的体重，顶着风雨，硬是爬上大堤，这是每次台风来，学校放假不用上课时，我们最期待的冒险行动，当时像完成重要任务般得意，现在想来，这种事，大概只有我那“吴大胆”的母亲才能率众做得出来。

平静的眷村生活，如果有什么“新闻”，母亲一定会把它弄得一清二楚。村外，杂货店旁的小屋里，有人自杀，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母亲信不过，即使她心中也很害怕，但她都会“亲自”去看一看，回来，再把第一手消息告诉我们。

青少年期，总觉得，母亲不了解我们的心，但是她却是左右舍，最好的“辅导老师”，隔壁的王妈妈，对门的马妈妈，最爱到我们家“串门子”！因为母亲嘴巴紧，从不道人是非，成为最好的听众，长大后，我才发现，倾听也是一种美德，而这种美德，也让我成为朋友间，最好的聆听者和心理医生。

“小莉，公司到现在还没把我的合约谈清楚，怎么办？”一位刚到香港工作的朋友半夜 12 点还打电话来诉苦。“现在，是公司比较需要你，还是你比较需要公司？”我问。“公司忙得一塌糊涂，现阶段，他们非常需要我！”他说。“好了，那现在是卖方市场，你的劳动力比较有价值。就照你心中愿望，把你认为合理的合约条列下来，再去和他们谈，态度要温和但坚决，并且订下一个期限，免得夜长梦多。”我继续说。

电话那头，朋友停了半晌说：“小莉，平时觉得你是个开心的傻大个儿，

不知道，遇到事，你还挺有条理的！”“行啦！现在必须你自己做功课，把困扰你的条款写下来，就安心睡觉吧！”经过两个小时长谈，朋友终于安心地放下了电话。我突然想起台北夏天的午后，母亲和邻居妈妈们在畅谈长短后，各自满意地回家准备晚饭的情景。朋友有难时，我对朋友的耐心，可能也是母亲的“身教”吧！母亲对我的影响，是从小开始，而且潜移默化的。

每个深冬的夜晚，我会等候母亲坐到床前，用毛毡，把我从腰间来回捆绑好几圈，母亲说是因为怕夜里我踢被子，有了裹腰毡，即使我甩了被也不至于着凉，于是我天经地义地认为，每个小孩都有条裹腰被，它让我充满安全感。

长大后，我才明白，那分安全感不只是来自那条缠腰被而是来自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

我也特别喜欢，身上衣服掉了钮扣，母亲拿起针线为我缝补时，嘴里喃喃他说着像是唱歌似的闽南顺口溜：“穿着缝，穿着网，谁人对小莉做贼仔，嘴生虫”。

它的大意是，穿上母亲缝补的这件衣服，即使大人不在身边也不会有小偷敢偷我的东西，不然这个小偷嘴里会长虫。虽然明知不可能有如此神奇功效，但我特别爱跟着母亲哼着：“穿着缝，穿着网……”到了香港，有了独立持家的机会，家中卫浴设备，紧急医药箱的摆放，和台北家中如出一辙，对我来说是一派自然，直到朋友到家中作客，弄不清楚浴室里怎么会有三种毛巾，需要我解释说，“一条大毛巾是沐浴后抹身用，一条小毛巾是洗脸后擦脸用，另一条是抹干脚的抹脚布。”她恍然大悟。而我才明白，我受母亲影响之深，相信未来我持家时，我的家，也会是个小小的“吴氏样板”家庭。

“妈咪！蛋炒饭怎么煮？还有西兰花怎么知道它熟了没？”我从香港打电话回台北，问母亲如何烹调午餐。

母亲一面嚷嚷嫌国际电话贵，一面不厌其烦地讲解了一遍做法。从此“小莉煮了一道最贵的清炒西兰花，因为她打长途电话问妈妈食谱。”的笑话，在姊妹间传开，四姊特地买了本食谱让我带回香港，现在回台北，母亲终于把我叫的跟前说：“进厨房来看看我煮菜吧！”母亲开始后悔，在我求学时，一心一意要我念好书，叫我“君子远庖厨”。

她原本想几位姊妹出嫁后，偶尔回娘家请教一番，或是就近打电话询问一下，姊妹们也慢慢学会了做菜。只没想到，我这没出嫁的女儿，就已经独立出门在外，还是要坐飞机一个小时，到海的另一边，她照顾不到的地方。可惜的是，母亲和四姊的“烹饪速成班”，并未成功，到现在，我仍只会做“满蛋全席——炒蛋，煎荷包蛋，蛋花汤……”或许是家庭主妇的关系，母亲全副的精力都放在我们这六姊妹的身上。大小事不分巨细她都有意见，四姊长我4岁成了我的榜样，我刚进大学，是母亲眼中可以稍为放松管制的时期，而四姊刚入社会，母亲担心她吃亏上当，即使她从来没在外打过工，但是，打工准则和细节倒了解不少，就连四姊每天穿什么衣服上班，母亲照例会造型顾问一番，已经长大成人的四姊当然满腹牢骚，于是每天早上总是上演一幕，四妹满脸怒意地冲出家门，母亲在后仍叨叨不断地追着说话的场景。

我自我警惕，千万别让这“序幕”在我身上重演，但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电视，成了公众人物后，母亲有了更多意见。我假日穿件短裤便装想到住家附近买本书，母亲会念着：“一点都不注意形象，别人看到了怎么

办？”穿件颜色较素的衣服上电视，母亲会三不五时指着别人红色的外套说：“你看那个颜色，多喜气！”那时，四姊要出嫁了，小妹还在念书，我成了母亲“关注”的重点目标。

一直到她发觉我的眼光有时比她还好，说的事比她还有道理时，她开始从说话者成了聆听者。尤其到了香港，有时带了些最新的服饰回家，古板的父亲会直呼“不好！不好！”倒是母亲很能接受新事物，鼓动他说：“这个好，现在流行！”母亲也最爱说：“来，坐下来，和我聊聊天！”过去，因为母亲严格的家教，我绝对不可能和她讨论有关男孩的事，现在，对周围的男性朋友品头论足却成了母女俩促膝谈话的题材。日前，妹妹举行婚宴，母亲来电询问：“有没有可能回台湾参加活动？不过如果忙，不回来也没有关系！”母亲故作潇洒地说。“我一定回来，周末的时间应该没事！”我说。母亲满意地挂了电话。

在么妹喜宴举行前一周，母亲又来电话：“你下周要回台湾了吧？”母亲嘴里不说，但心里是多么期待我回台北的日子。我开始明白，在我忙于工作，回家的次数和时间愈来愈少的现在，母亲对我的思念，而我对她，又何尝不是？或许，亲情的牵挂光靠电话联系是不够的，或许下周末我在香港没事，是该回家看看陪陪母亲了。

第二章、求学时代

启蒙——一个爱发问的孩子

和所有刚上学的孩子一样，小学生第一天课，所有小朋友都在教室内上课，家长则是在教室外上课，一双双张望的眼看到屋外，爸爸妈妈还在，才能安心听老师说话。

但是很快地我发觉，课堂内比课堂外好玩，老师比同学有趣。对于老师的提问，我总是勇于回答，答对了固然高兴，答错了小小的心灵似乎也没什么受创。有一次老师问，母亲的拿手菜是什么，我毫不犹豫他说：“青椒炒牛肉！”因为我爱吃。

倒是母亲至今仍耿耿于怀：“怎么说这么家常的菜，我拿手的还多着呢！”除了勇于答问，我还爱发问，心中有任何疑问，绝对无法留到隔日，我一定举手问个明白（回想起来，原来儿时已有现在的职业病）。

一次，老师讲解基因和血型的关系，当老师说到什么样血型的父母会生什么样血型的孩子时，我听了很疑惑，举手就问：“错了，老师，我爸妈都是O型，但是姊姊的血型却是A型。”老师说：“那你爸妈一定有一个血型验错了。”我回家偷偷和父亲说起这件事（因为担心会不会揭穿姊姊不是我1们家小孩的秘密！）想不到，爸爸斩钉截铁他说：“怎么会错呢，一定是你老师弄错了！”我心中松了一口气，因为姊姊还是我的姊姊，但是这门基因课的疑惑，当时还是“无解”。一直到10年后，父亲在医院检查时才发现，他的血型真的是A型。年轻时，军中验血草率，他就糊里糊涂，当了50多年O型血的人。好险，父亲其间并没有大病，不然肯定会输错血。而我们更

嘲笑他，多年来以为自己是O型，所以脾气大，择善固执，都说是“天性”。

爱看侦探历险类小说

小学时，还有一爱，那就是爱看书。

小学五、六年级，我就把我们家附近市立图书馆的青少年读物全部读完，因年纪太小没有身份证借书，我就用姊姊的名字和号码。

夏日的午后，台北眷村家里，我总是除了吃饭，就是埋首亚森罗萍（法国作家笔下的怪盗）和福尔摩斯（英国作家笔下的名侦探）的世界，而儿时对我最好的奖励就是买书。

父亲的一位朋友——我的乾叔叔喜欢摄影，小时候的我肥肥胖胖，古灵精怪的样儿是他最好的模样，但是吴叔叔要带我出门，必须先声明：“叔叔带你去买书，再去拍照！”我马上兴高采烈跟着出门，而回家时至少能带回两本书，当时只珍惜书，现在则更珍惜吴叔叔帮我用镜头记录下的所有成长历程——照片。

喜爱读书，和我小学的启蒙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小学三年级，我便开始参加拼音比赛（台湾用注音符号而非罗马或是汉语拼音），国语字典成为我最好的朋友。

五、六年级的级任导师主修中文，所以做班长的我每早自修时间，便受师命负责抄《三字经》、《唐诗》、《宋词》、《诗经》给同学们背诵。期中、期末考，如果你六科成绩都得满分，廖老师会带你上《国语日报》社，这是我最快乐的事，看着整齐的书架和满满的书，我老觉得无比丰足，同时，我也透过争取好成绩，将这些书，一本本搬回家。直至现在，台北家中还有一排排我儿时的战利品，如《淘气的科学家》、《丛林历险记》、《柳林中的风声》。这些书丰盛了我儿时的想象空间，使我觉得世界之大，世间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事和值得去的地方。我对母亲说要把一些书留给我的孩子，因为我幸运，碰到这样好的启蒙老师。语言文字似乎和我脱离不了关系，但是为什么会参加演讲朗诵比赛已经无法考究。我只依稀记得，眷村里有个小院子，每到比赛的日子，清晨五、六点钟，我总是在院子里大声背诵讲词，邻居的阿叔、阿婶都会心地对母亲说：“你们家小莉，又要去参加比赛啦！”小时候演讲，父母无法教我国语的正确发音。因为父亲是浙江国语，母亲是台湾国语。但我家总是外省人家，从小说普通话，所以国语就自然天成。父母亲是我的军师，父亲文笔好，负责写稿润稿，母亲就带我南征北战（因为班际赛完，要代表学校参加校际赛）。我不是天生就爱上讲台的，每次参加校际赛，心底也会紧张害怕，但是没上过台的母亲却经验老道地教我：“不用怕，你说话时就把台下的人都当成木头、西瓜。”不知母亲的话是不是有道理，但每到紧要关，这招倒真是管用。比赛参加多了，有时和母亲走在路上，会被校内同学指指点点。初时，我不自在，母亲却坦然他说：“如果你以后更有名了，这种情况会更多！”看来做星妈是每个母亲的天性，不需要调适。

其实我对儿时的战绩，并没有大多骄傲，倒是几年前，在台北街头，我碰到小学隔壁班的一位男生，以前我们俩老是在演讲比赛上竞技，但每次比赛他总是差我一点点，我获第一名，他得第二名，我对朋友介绍，说他是我小学同学，他竟然回答说：“对，她就是小时候让我永远得不到第一名的人。”语毕，3人哄堂大笑，如今已是留学美国、拥有法律博士头衔的他，

最耿耿于怀的，竟然是儿时那一场场无法雪耻的演讲比赛。

少年时代的挫折与抉择

从“小馒头”到“大当头”

小时的我，备受老师宠爱，在同学的眼中也是领导者。小学五、六年级，台湾一部电视剧《保镖》红遍大江南北，剧中有大当家二当家和三当家，老师笑着将班上3个成绩最好的女生，命名为大当头、二当头和三当头，我当班长，自然是大当头。有了御令，加上天生疾恶如仇，班上男生都得让我三分。有一次午休时间，男生欺负柔弱的警卫股长（我们班是女生当家，清一色女性干部警卫股长，专门管秩序），他们不肯睡午觉，全部躲进男生厕所，并挑衅他说：“有胆进来捉呀！”我知道后，头也不回，直冲男生厕所，大喝一声：“你们给我出来！”这使我创下小学六年级就进过 Men, s room。

少年时代的挫折与抉择

一位和我合作过的意大利制作人，曾惊讶地看着我说：‘I’ve never met someone who has so mature mind and figure but character is like a happy

child.’ 我是他认识的第一个中国女孩，他大概以为所有的中国女士，都是成人又有童心的综合体。

我想，我是幸运的，我对生命的好奇心和成长的过程，都没有被压抑，一切任由我自由发挥。

进入初中的我，仍然名列前茅，更因为五音尚全，我一进校就被选为合唱班成员，并担任指挥。从此既要练唱，代表学校参加合唱比赛，又要在全校成绩排名时争取在前，因为合唱班一直是好班中的好班。

台湾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从初中开始，以成绩分班，所谓“前段班”好班，会以参加联招、考高中为目标。“后段班”就是俗称“放牛班”，会以职业专科学校或是直接就业为下一步。

记得我被班上推出竞选学生会会长，由于是全校同学投票，所以必须到每班去拉票，当我和助选团的同学走入“后段班”的教室时，仿佛走入了另一个世界。坐在桌上。站在窗沿边的同学，以一双双好奇不羁的眼睛像是看明星，看另一个星球来的人。我知道，我的生活令他们羡慕，但我却突然发觉，原来学校里，还有很多我不认识、但是认识我的朋友。而我深信，彼此是平等的，因为我们同样年少，同样有梦。我轻弹吉他，为他们唱了一首《睡莲》，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美丽花朵。

结果，我高票当选“没考上第一志愿学校生活的顺遂”，愈发凸显我高中联考的失利。当时台北高中有3所名女校，排名分别是“北一女高”、“北二女高”也就是“中山女高”和“景美女高”（当年附中还未招女生）。

以学校成绩排名，老师和我自己都充满信心，毫无疑问地以为我会考进第一志愿填写的学校，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永远记得那个人生中难忘的画面。

联考放榜，母亲陪我看榜，结果第一女中的放榜牌上找不到我的名字，名字在第二女高。母亲没发一言，默默陪我回家。

那时是盛夏，放榜后，当天我坐在地板上看书，看什么书我已记不清，

坐了一下午。母亲害怕我的沉默，她告诉我，如果真的不想念，可以重考。直到黄昏，母亲喊我吃饭，我从地上站起来坚决地告诉妈妈：“我去念。”那年我 15 岁，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学会走出人生第一次最大的挫折。

从此家里有了绿衣黑裙（四姊读北一女中的制服），和我的白衣黑裙（中山女中制服）。

枫楼三载丰收多

我并不晓得，那个盛夏午后的抉择，对我今后的人生有如此大的影响。当时只是想到，“一定要上第一志愿吗？那是为了老师父母的期望，还是自己，中山女高不也是个学校吗，不肯屈就，还不是为了非要第一的虚荣！”放下虚荣，我进了枫楼，中山女高已有百年历史的大楼（楼旁种满枫树，因此得名；也因为夏天多风，又名风楼，通常高三学生才能在风楼上课。每年的大学联考，高三生经常是念书念到痴痴癫癫的，故又别名“疯楼”）。我觉得一来可省下重考一年的宝贵光阴，二来也造就了我丰盛的青春岁月。十六、八岁是人生最叛逆的时期。我在枫楼里，结交到一群挚交好友，3 个女孩子互相支持，分享心事，一起做梦，觉得人生之乐，乐在 3 人共翱翔。

18 岁开始，我们相约每年 3 人生日时要再聚首，互送礼物。一个和一般人一般高的大狗熊，是我获得的第一份礼物，至今仍然保存在台北家中。

读到高中后，除了念书，我在课外活动中仍然很活跃。高一时因为我成绩优秀，被选入乐队。后又因为个子高（高中时已有 168 公分）排在第一排，学吹伸缩喇叭，并担任分队长。

每天升旗时还要指挥全校和乐队演奏唱歌，更代表学校参加阅兵，穿上短裙、长靴，与一排吹伸缩喇叭（Trump）的伙伴走在一起，各个的个头都“高人一等”，够吓人的了。

看着四姊日益加深的眼镜度数，原本活泼的她，变得愈来愈内向沉默（或许是全省精英聚集的北一女高，给她大多念书的压力）。我反而更庆幸穿上了白衣黑裙，作为“鸡首”，有了游刃有余的空间，继续我不受压抑的发展，让我能 study hard, play harder。

爱打抱不平，立志做记者

在“枫楼”的高中时期，我已经立定未来的志愿。

小时候嗓门大，印象深刻的是，小学五年级在全校作课间操时喊口令，完全可以不用麦克风或扩音器，当时很得意于自己的肺活量。但长大后回学校一看，原来是校园太小，不过口令的音量能贯穿一楼至六楼，也不能小看。嗓门大兼爱打抱不平，买戏票时如果有人插队，别人会忍气吞声，但我会大步向前要求对方守规矩。

因为我觉得任何事都应站在公平的起点上，要如何竞争，就应各凭自己的本事，这就是现代法制社会的可爱之处。

或许是 LA Law（美国一部著名影集，讲述洛杉矶法律界故事）看太多，也可能是听了大多记者是无冕皇帝的故事，高中时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记者或律师，因为可以伸张正义。至于到底要做哪一行，就交给大学联考，让老天为我决定吧！

所以联考填报志愿，我只有两个原则：第一，父亲规定家中女孩未出嫁前不能外宿，所以台北以外学校不能眩第二，是把大众传播新闻系、法律系排名放前。

联考的结果是，我考上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这就决定了我走向传播之路。进入“辅大”传播系，学做新闻尖兵辅仁大学虽然是台湾私立学校（当时还是私校之首），但是大众传播系出了多位优秀传播人，像前华视主播李艳秋，现任中视主播沈春华等，使得它的成绩排名颇高，也就是考试成绩要求相当高分才可入读。

在我事业几次的转折都成功后，常有人问我的人生规划，我笑着说：“没有。”“我从没想过，会到香港。”“没想过会从电视记者朝一个全方位的电视人走。”我唯一有过的规划，就是我的志向定得早。进入大学后，又迅速决定我的媒体。做记者，有文字、有声音，是做电视、电台、报纸，还是杂志？当时我想，若真能申张正义，就必须入 super power 的媒具有绝大的影响力，所以我选择做电视记者者。大学时代，除了寒暑假到《华视》社教部、《联合报》采访组、《生涯》杂志社外，也到过《幼狮》电台实习，大众传播系里更提供了编采合一的小环境。为了办好系上刊物《传播者》（它是对辅仁大学所在地台北县新庄地区正式发行的一份刊物，编采、广告业务全由学生自理，盈亏自负），我曾担任了一学期主编、一学期总编辑，做记者采访就更不在话下。这个学校的小环境，提高了日后我面对社会大环境的适应能力。

我们开始把课堂上所学五个 W 一个 H (why ,who ,where ,when ; what & how) 放在新闻的第一段，也就是导言里，以金字塔模式在第二段才展开新闻故事。

我也曾试过，为了采访一所小学的校长，在校长室外徘徊了 30 分钟，不敢敲那扇门，因为觉得自己是学校刊物记者（虽然它以地区报纸的方式来办），校长哪有空理你。

但最终在责任所逼下，我还是踏进了校长室，终于也做到了访问。

为了回忆大学的学习，我刻意回了趟台，找出过去的作品（幸好大学时有剪报的习惯），看到了第一篇写着“【本刊记者吴小莉特稿】”下的文章，它的标题是《近百二老谈养生，勤字一诀最重要》。这标题是我下的，连排版字体也是我出的，因为我兼主编。剪报中的采访手记写到：“第一次发现新庄面积之大，路之复杂，为了访问新庄最高寿（99 岁）的老人王逢亨，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足足走了 4 个多小时，走过了吃饭时间也不知饿，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一定要找到他！’”最后，找到了老人，我对他的描述是，“因深居公寓顶楼，又少街坊好友，老人生活范畴多在自家屋中，‘走路’、睡觉、整理自己东西是他的生活内容，从客厅‘走路’到厨房是他不变的行程，他自己规定每天要走 440 回，每 10 回才可稍作休息。浓厚乡音下，听不清近百年的岁月中属于他的故事，或许在他不断‘走路’的步履下，生命中的悲喜早已磨去，全心所盼，是未来更长的延续。”这是我 12 年前学生时代的第一个报道。报道本意是采访长寿秘诀，但字里行间仍可看出心软的我，在采访后，对老人生活的心酸感受。

另一篇采访手记写到：“‘新庄国携是所年龄很大的学校，它像一座宝藏，还有许多的事值得报道。’”“五顾茅庐，访训导主任不遇，好不容易见到面，相谈甚欢。”“访指导老师郑光庆，发觉每个人都是本好书，二访山胞学童，快乐营结交了一群好朋友，搜集所有资料。满心欢喜离开时，却发生小车祸，撞伤了小腿，疼了好几个星期，结论是记者虽有成就感，但切莫得意

忘形。”在采访完学校辅导老师后，我写到：“深切体会到访问者与采访者之间的互动，不知是谁说的，不只要从采访那儿得到讯息，也要能给受访者一些资讯。”当时台湾一本著名刊物《天下》杂志总编辑殷允亢曾 1 为我们上采访写作课，他告诉学生，访问之前要做足所有工作，熟悉你的受访者。于是受命访问台湾名作家朱秀娟时，几个同学四处搜罗朱秀娟的作品集回家研读，结果了解到：“朱秀娟不喜欢访问者轻装随便”。于是我们一群人赶紧回家换下牛仔裤，选出最好的裙装上阵，果然宾主尽欢。

在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我担任了《传播者》的，总编辑，我在报刊实务中是这样写着：“三期总编，一世经验，心烦稿件、编务之余，还要管广告，甚至贴广告版，盯发行，押送报纸，盯编辑，盯完稿，贴报眉，三期下来，只觉得像个打杂的小妹。但是当离开《传播者》远些时，才发觉对它深刻的感情。毕竟，再过三期，我就会脱离它，到那时，想再为它写写稿，画画版，也都没这份机会。”现在何尝不是，看着当年绞尽脑汁为文章所下标题：“两兔傍地走安能弃我雌，为妻为母为司机，黄美玉兼刚家庭工作。”“几番风雨故人归，访旅日职棒投手庄胜雄”，都仿如隔日。严格说起来，我的记者生涯早从大三就开始启蒙。

我们班正确的全名是大众传播系语言文字组，所以只要和语言文字有关的，如影音都在学习范围，举凡摄影实务、剧本写作、甚至话剧演出，也都有分参与。

毕业前，系主任皇甫河旺要求班上分小组，创作一篇深度报道。我们 5 人一组选的题目是>，5 人当中，3 个女孩，2 名男士。

男士负责照相，女士负责访谈，文章由我主笔，这是我第一篇报道文学式的作品。

但是为求临场气氛，5 个人壮胆进入殡仪馆，深入美容师的工作环境，这是当时仍是学生的我们难以忘记的经验，系主任给我们的评语是“选择社会上较边缘的题目，比较勇敢。”到了大四，同学们开始人心惶惶，是毕业就是失业？还是继续念书？许多人准备考托福（留学美国的考试）。我的父母因为战乱学历不高，人都说绍兴出师爷，家在绍兴新昌的父亲常说，“要不是因为打仗，我的 ABC 也不会只念到 D。”所以从小我们家做人的理念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父母告诉我，有钱可以让我出国，他们也坚信，家中还没有人出国念书，而我有能力照顾自己，但是我说：“我想先闯一闯！工作两年，有了自己的积蓄再去念。”我不想再用家里的钱，因为家中还有小妹，父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因为想把学校所学用到实际中，有了实务经验，才知道未来想念什么。所以我留了下来，这一留就到了现在。而至今，再去念念书，一直是不曾忘记的梦。

第三章、踏上传播之路

过五关入“华视”

“爸爸没什么背景，帮不了你什么忙！”父亲说。

1988年9月我参加华视招考电视记者活动，并顺利通过笔试和试镜（screentest），最后要进入五关面试——新闻部采访主任、经理、主任秘书、副总经理、总经理等5层关卡。由三、四百人应征，淘汰到最后剩下不到10人，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父亲感慨地对我说了上面这段话。少年的我，意气风发地拍拍父亲肩膀安慰他说：“没关系，我自己来。”当时，台湾只有3家电视台（不像现在，加上有线电视，已有上百个频道）。

它们分别是台湾省政府所属的“台视”、中国国民党的“中视”、教育部和国防部合股的“华视”。

以前要进入电视台，一定要有家庭背景，党政关系良好或是由内部安插。一直到1987年前后，台湾“解严”，开放大陆探亲，开放党禁、报禁。报禁一开，百家争鸣，电视台也承受很大压力，担心流失观众，更怕漏新闻，所以决定招考新血，电视台的窄门才有了对外开放的时机。

而我幸运地赶上前几波的开放潮，使我这个没背景的女孩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当年电视台工作是高薪、风光的金饭碗，加上难得开放门户，所以整个考试过程耗时两、三个月。7月份得知招聘的消息，首先要寄履历和照片，人事部从上千人的来信中筛选几百人寄出回函，通知考生可以参加笔试，考试内容中英文测验、时事常识、作文、新闻写作（中视还加考三民主义）。考试场面壮观，像联招似的须向学校租借场地，分好几班同时进行。

一个月过后，如果收到回函，就可以到电视台参加screen Test——试镜。试镜内容包括在镜头前自我介绍、播报新闻、即席答问（后面几届，还考即席中英文翻译）。

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女孩，哪懂得化妆、造型呢？轮到试镜时，我一早就赶到美容院，请美容师帮忙。不知道只懂得化新娘妆的美容师，是不是也把我装扮得很喜气，总之，经过几个月常常翻看信箱的日子，我又等到了五关面试通知。

五关面试后，还剩下7个人，两个是刚毕业的新人，包括我在内。经过3个月试用，又刷下了2人，而我就正式成为华视新闻部一员。

我是“华视”记者

“我是华视记者，吴小莉，想和部长约个时间做专访，谈谈……”如我所愿，我进入了一个Superpower的媒体，只是我没想到这样的强势媒体，也使我快速成长。工作半年，老师告诉我，我比进入其他领域的同业成长快很多（同班同学进入电视圈，只有2人，我进华视，姜玲进中视）。我也同时感受到自己的蜕变，我已不再是徘徊在受访者门口不敢敲门的学生，而是顶着“民众知的权利”光环的电视记者。

做记者，每天像是个二、三分钟节目的制作人，从题材的发掘、受访者和事件现场的联络，到了现场后故事的铺排，画面的呈现和受访者的互动访谈，再到资料收集。

回到公司，写稿、过音、串连访问、初级剪接，我都一手包办。我好奇心强，且工作力旺盛，一天常同时做两三条新闻，结果害得我的摄像搭档既赞叹我的敬业精神，又埋怨我让他工作太多。

也因为这份工作，使我从父母眼中的小孩，转眼成为能独当一面的成

人。母亲唯一的要求是要我学会开车，自己开车上下班，避免搭乘的士的危险（我最终在她坚持陪我坐的士上班，再慢慢搭公车回家的苦肉计下，学会了开车）。同时也因为我的社交层面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因此被认定是见多识广，逐渐成为家中大事的咨询对象。

华视记者的生涯，给我最好的训练是，我几乎认定，没有采访任务是完成不了的。这种坚定的使命感，曾使我凭一个电话号码，便找到了受访者的住所，而且完成了我的新闻故事。

也因为台湾，做记者，尤其是电视记者的地位崇高（现在频道众多，市场和人员素质比较参差，但当年3家电视台可是金字招牌）。倘若心存有疑问时，常一个电话打到委员办公室寻求解答，再不索性杀到部长办公室直接问部长。李登辉出巡时，我也试过追到他身边，大声提问，结果他兴致高昂，高谈阔论起来，身旁侍卫也不便拦阻。加上每个部门的主跑记者都是同行或同仁，任何问题，一个电话，就能调动整体资源。这种海阔天空任你纵横的满足，的确实现了当初遇有不公即能伸张，遇有不解即能解惑的理想。

但做记者并非只有光鲜亮丽的一面，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不说，为了守候一条新闻、一个访问，在门外、在风雨中苦等三、四个小时绝不出奇。同行中的情谊也都是在这样的守候中建立的。大家等闷了，便拿起访问用的麦克风大唱卡拉OK，而我最喜欢用台湾名歌手潘越云的这首歌，描述当时的心情：“痴痴地等，你让我痴痴地等民众每一次“知的权利”，都是媒体同业用生命光阴换来的珍贵过程。

阳光下的第一次

我不是一进华视就懂得如何做华视记者的。为期两周的“新兵训练”，教我们如何在编辑室里社会化。两个刚毕业的女生立刻扮起大人，剪短了头发，穿起短裙和高跟鞋。训练后我们进入采访组，做实战作业。有幸的是带我们这群新兵的，是辅大的学姊、当年的企划组组长、还曾任华视新闻部外电组组长梁蕾。

梁蕾是资深记者，新闻sense（新闻感）非常强。我们这些新兵刚上线，没有主跑路线（怕我们漏新闻），能不能出机跑新闻，能不能上新闻，就要各凭本事。

每个人都为此战战兢兢，刚进华视前半年，沉重的压力，令我的体重直落四公斤。

偶然得知阳光基金会（台湾一个颜面伤残者民间组织）想成立阳光社区，让烫伤面孔的小朋友聚居，但却引起当地社区居民的反对，唯恐家中孩子看到颜面伤残儿童会害怕。这类新闻在电视台绝非主流，但我却觉得很有人情味，可以做专访。

征得梁姊同意后，我争取出机采访。那是我第一次出机，和我同行的是一位资格很老的摄影记者（因为资浅者早就被派出门，只有资深者留守家中，等到我们这些新手找到资料可以出门时，就只有动用老牌的）。那个画面可以想见，“笨鸟配老鸟”，我这只笨鸟哪调派得动连资深文字记者都认为比较难“搞掂”的partner合作者（在电视台，通常是文字主导新闻走向，摄影记者负责画面拍摄，华视早期摄影记者还负责剪接，一条新闻成形虽然由文字统筹，但是电视是影音媒体，没有了影像一切均白费，文字和摄影的

紧密合作和友好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

结果这个阳光下的第一次，因为还不懂要拍什么画面，做新闻时才发觉影片不足，所以没法上电视，只成为作品收集。

第一条成功在电视上播出的新闻，是我听说台湾经济部有一个降税措施，当我把这个线索告诉当时的采访组长李继孔时，组长说：“这就是新闻了。”刚巧跑财经线的记者去做别的采访，我就有机会完成这条新闻，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在电视新闻中出现，是既紧张又害怕。事后觉得，电视上的声音怎么这么尖锐和生硬，这就是我第一个电视作品。

揭开“洪门”的神秘面纱

“小莉，有件事和你商量。”朋友从台北打电话来。“什么事，这么严肃！”我说。

“最近碰到一个恶霸公司拖欠尾款不付账，我一位朋友听了气不过，说要召集他洪门的弟兄连署抗议，帮我讨回公道。”她紧张地说。

我听了大笑，这位颇富正义感的朋友，大概仍以为洪门是古时候的黑社会帮派，一听到“洪门弟兄”心里就想：“不好吧！做生意，还要动用帮派力量。”“别担心，洪门是源自清朝的一个民间组织，10年前我就采访过他们，不是什么黑社会帮派，况且他只是帮你召集朋友连署抗议，又不是动刀动枪，这些洪门弟兄，很多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分子，他只是帮你壮声势而已！”朋友听了我的解释才稍微释怀。采访洪门，是10年前，还是华视新人时。

随着时代转移，洪门早就不再负有像“反清复明”的结社意义，但是在台湾仍有许多成员，由于平时低调，所以洪门一直被蒙上神秘的面纱。

1988年，洪门计划登记为正式社团组织，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透过报社朋友帮忙，联络上一位洪门分会大哥，他愿意让我们拍摄洪门入会的仪式，这是第一次洪门中人和洪门分会在台湾电视上亮相。不过采访过程仍然很迂回。

我们遵守规定，在一个地点会合，采访车再跟随一辆“指路车”，到达位于台北县一个较偏远的住宅区。

洪门分会和台湾民间庙堂有些类似，拜奉象征忠义的关公，负责人身著武术装扮的轻装，腰系红带，入会仪式并无特殊，洪门弟兄笑着说：“洪门本来就不特殊，我们不是帮会，只是清朝留传下来的一个义气组织。大家意气相投，聚在一起，互相帮助，我们现在早已没有像反清复明那样宏大的目标，也没有结党结派的目的。”在场的洪门弟兄说：“海外也有很多洪门子弟，因为华人到了海外更需要团结，”他甚至偷偷告诉我，如果你到华人社区，吃饭时，将食指半曲，双手平放在桌上；或是和别人握手时，半曲食指，对方若是洪门弟子，就会知道你也是洪门中人，彼此心照不宣。但是一旦你需要求救时，洪门弟兄就会互相支援。

他们说：“在台湾有很多洪门子弟，各行各业都有，包括演艺界的许多人。”据说也有政治人物参与，只是都没有公开活动而已。

还是新闻新鲜人的我听得津津有味又半信半疑。当晚的华视新闻就出现了一则名为“揭开洪门神秘面纱”的故事，由洪门中人现身说法，因为洪门的故事第一次在电视上出现，播出后的反应不错，我的采访组长也颇为高

兴。

那次采访，我和一些洪门弟兄成了好友，洪门大哥还笑说：“哎呀！收你做十三妹好了！”我当场回敬：“好呀！但是我要先试试你教我的洪门势到底灵不灵！”不过此后，每次和别人握手，我老是忘要试用“半曲食指”的秘语。所以至今，没找到一个散落各地的洪门人，而我当然也做不成十三妹啦。

渔港一幕谍战片

“开枪啦！开枪啦！”一位观众上气不接下气地打电话到华视新闻部，接电话的正巧是我。他继续说：，昨天深夜，有偷渡客想坐渔船闯关上岸，海岸防卫队开枪，有人受伤啦！”我问：“你在哪里？”“澳底！基隆澳底！”说完，“叭”地一声电话就断了。

1988年底到1989年初，正是偷渡客利用渔船偷渡到台湾的高峰期。当时盛传，每到夜黑风高，海面起雾时，台湾基隆花莲和高雄的外海就会有万船齐发的场面，许多渔船抢滩登陆。因为从没有媒体拍到，所以无法得知真伪，但是，在岸上查获偷渡客时有所闻。这回热心观众提供的线索，也不知其真实性。还是新手的我，赶快上报采访组长。组长对我们这批新人不错，尤其是我，平时总是笑容满面，无忧无虑，年纪又小，继孔大哥（当时采访组长）把我当小辈一样疼，又因为个子高，他老叫我“傻大个儿”。“今天就到澳底玩一玩，看看基隆外海，如果现场没有什么事，中午就吃吃海鲜算了。”他说。

于是我们一组人（台湾电视采访通常3人一组，分别是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和一名司机兼助理）赶到位于台北北面的基隆澳底渔港。到达时已近中午，渔民已经出海，但是岸边出奇安静。好不容易发现有人，赶快开口问：“借问一下，昨晚是不是有偷渡客被捉受伤？”村民像难以启齿，连忙摇手：“咩哉样！咩哉样！”（台语，不知道的意思），然后逃也似地离开。我们心中开始怀疑，但是逗留10分钟，仍一无所获。终于有村民遥指靠近海边的一栋民房说：“在那里啦！”“是不是有人被枪打伤？”我问。“有呀！海防开枪警告不要上来，就不小心打到啦！送到医院去了，其他的就在那里了。”村民说。

我们赶紧往目标屋前进，这时看到一群人被眼罩蒙住了眼（可能怕偷渡客看到台湾海岸线），手则绑在前方，拉住前一个人的衣服，一个接一个被带上大巴士，将被送往专门收留偷渡客的靖庐拘留。

那时台湾老百姓没有见过偷渡客是怎么被押送的，而我们拍到独家画面。但不久就被负责押送的宪兵发现，过来喝问：“你们干嘛？”那时台湾刚“解严”，海岸防卫刚由警备统部交到警方手中，宪兵的权力比较大，而且是一切照上级指示办理。

我们担心“秀才遇到兵”会有理说不清。我的摄影记者是老资格的廷勇大哥，他向我使个眼色，表示“我来处理”，他镇定地回答说：“我们在拍渔港。”宪兵问：“你们拍到什么，把带子给我，”我们说：“什么给你，新闻自由呀！”宪兵说：“你们不能走。”“我们把摄像机带回车上，我跟你到你们办公室，你打电话请示一下好了。”廷勇大哥说完，再跟我使了个眼色。

我们都知道要保护这卷录像带，我和助理往采访车上走，一个宪兵跟着我们，距离七、八步，助理悄悄跟我说：“假如他们真要硬来，没收带子

就糟了。”我说：“你把带子给我，我去找间民房上洗手间，然后放在民房里。”助理阿良机灵地把一卷空白带子放进摄像机，随便对着海边拍些镜头，以防这些大兵如果真格抢走了带子，也不会怀疑我们调过包。

然后，我把先前拍摄的带子放到我的手提包里，跟大兵说要上洗手间，他果然继续跟着我，看着我进一间民房借用厕所。我把带子放在洗手间的夹板上，也不敢和主人多说什么，只道声谢便离开。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怕赶不及回公司做晚间新闻，打电话回办公室求救，让公司交涉放人。稍后公司交涉成功，宪兵让我们走，我再回到那民房的厕所拿回那盒录影带。整个过程就像谍战片一样。

晚上新闻播出后，我们都深受震荡，因为这样赤裸裸地见到偷渡客被捕之后的待遇。我在偷渡客鱼贯走上巴士时，同时留住了现场渔民的现场声（nature sound）：“就是这样呀！昨天夜里还听到有人叫得很凄惨！”事后，有关单位曾经来电关切，但这就是电视，一个影音俱全，无可抵赖的媒体。在这之后，就再没听闻有偷渡客受到类似对待的情形。

当时我人行才四、五个月，这是我第一个独家，而更重要的是它满足了我爱看侦探小说的侦探欲，让我觉得原来做记者也可以做得如此刺激！

第一次上主播台

“电视记者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待遇高。以台视为例，每年年终奖金有十几二十个月月薪。”讲台下一片哗然。讲话的是前台视主播，台湾资深电视新闻人李四端。我大三时，他在辅大教“电视新闻”这门课。这段高薪的开场白已经吸引所有学生包括我在内的注意。

“社会上每个人都会认为你很不错。”他继续说：“但是每个人都来摸你的头，说你棒，说你乖，久而久之，你很容易满足现况，如果不警觉，渐渐会成为一只大肥猫。”台下一阵哄然大笑。一来是因为老师具象的描绘，二来是同学们看到老师日益发福的身段，有所联想。一直到我自己也从事这份工作，才深刻体会李四端当年的“有感而发”。

进华视半年，对做电视新闻的技巧已完全掌握，反而对每天例行式的出机、赶新闻、上新闻、陀螺似忙碌的生活有些茫然。

我再回到校园，找当年和学生感情很好的杨志弘老师讨教（杨老师现为铭传传播管理研究所所长）。

杨老师疑惑地看着我：“你的工作人人羡慕，有什么不满意？”“没错，我每天接触很多人，很多新鲜的事，但是每天 input（输入）立刻 output（输出做新闻），我觉得自己像个电脑荧幕，关了机就 nothing left，没有东西留下来，已经空了。”我说。

老师笑着看我：“不错，有人做了一辈子电视，也不觉得自己不足，你才做半年，就发现了问题，”这使我突然想起李四端老师的“肥猫理论”。但是，要怎么办？“读书，对你有兴趣的问题深入研究，还有别忘了，你做的是电视，如果不出镜，你永远是 45 秒钟新闻，那只拿麦克风的手。”杨老师说。

我开始再念书，同时努力让采访对象不只因为我代表的强势媒体而尊敬我，更因为我报道的表现而乐意继续和我做朋友。

“小莉，今天晚上有什么好东西？”前华视资深主播、也是辅仁大学学

姊李艳秋，每晚上新闻前常问我，因为我会做些很有趣或是画面感、现场感很强的新闻。

李涛（台湾 TVBS 无线卫星台总经理、也是李艳秋先生）更笑着跟艳秋姊说：“我这个‘秀’王离开华视后，就由小莉接任‘秀’后了。”（李涛在做记者时期，也是以擅于运用现场感做 stand up 现场报道著称。）当时华视新闻部经理黄新生更是常对杨志弘老师说：“你为我们训练了一个好手！”没多久，黄经理突然走到我跟前：“小莉，如果让你播新闻，敢不敢？”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敢呀！”我心想：“有什么好怕的！”黄经理满意他说：“好！下星期开始，每天早上先试播 5 分钟晨间新闻，”答应之后，我才发觉手忙脚乱。我没有化妆品，也不会化妆，还要找适合的衣服。热心的导播开始教我化妆，甚至把自己私藏的化妆品捐了出来。

1998 年 4 月，进华视第七个月，我第一次上主播台。第一天播完新闻，导播问：“紧不紧张？”我说：“还来不及紧张，5 分钟新闻，刚坐上去，在亢奋状态，等到开始要紧张时，就准备下来了。”就这样每天来不及紧张，训练了几个月，黄经理有一天又走到我跟前：“小莉，准备好播午间新闻了吗？”我直率他说：“没问题！”但这回可不是五分钟新闻，而是 30 分钟的现场直播，尤其中午新闻截稿时间紧，所有稿件是最乱，消息最新却也最急的，常在播这条新闻时，下一条新闻才来，或是开播前 3 分钟，头条才到，播报难度事实上比晚间新闻还高。

第一天，编辑台照顾我这个主播台上的新手，要求所有记者提早截稿，让我能较从容上常后来他们发现我能“接招”，也就慢慢恢复常态，曾经有一次我才采访完一条新闻，正在编片子时，黄经理突然要我救急，因为当天轮值午间新闻主播的同事身体不适，勉强上场担心现场出问题。我看看手表，只有 20 分钟，新闻就要开播，我用了 10 分钟化妆、梳头，5 分钟顺稿子，5 分钟上现场准备。

五、四、三、二、一， Cue，“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华视新闻……”新闻开播了，我依然微笑自信地和观众分享发生的大事，但是每到进新闻片时，我却是争取时间去了解下一条新闻内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谢谢您收看华视新闻，我是吴小莉，我们明天再会，”30 分钟下来，我像打完仗一样疲惫，但是让观众看不出幕后工作的紧张和紧急，我心中却有很大的成就感，这也是现场节目对我永远的魅力所在。

“华视”精心栽培的主播

华视新闻部尽心培养吴小莉

由于主播李艳秋休假，华视晚间新闻一连 5 天由新记者吴小莉主播。为了提携属下，经理黄新生更一改过往习惯，逢人便夸赞吴小莉在播报台上的自信与稳剑为了让演出尽善尽美，华视新闻部的同仁特别在播报前将所有的新闻带都过好音，以减轻吴小莉的负担，此等照顾据悉是吴小莉平日不错的人缘所至。

而制作人刘奇伟更酝酿了一脑袋的笑话，准备在每晚她准备上场前的时间，来转移吴小莉的压力。为了塑造一名主播人才，华视有关人员的心情可是战战兢兢，如临大敌，希望每次挥棒，都能将爱将打入观众的心坎里，

吴小莉就是这等待多时的第一棒。

（摘自 1989 年台湾《联合报》）这是 1989 年台湾《联合报》上的一篇文章报道，当时我进电视圈才快一年，一路从播报晨间、午间新闻走到 Main News 晚间新闻。现在回头想想，所有的磨练，真的都是新闻部领导有计划的一步培养，在周围同事的关怀照顾下，隔绝了外在一切不利影响，让我有机会从隔壁邻家青涩的小女孩，成长为自信稳健的女主播。

眉清目秀常展微笑

“小莉长得眉清目秀，无论是何时何地总是以微笑待人。记得她刚上新闻主播台时，以一口标准的国语为大家分晓天下事，好像是隔壁家青涩小女孩在说故事，然经过岁月的磨练及小莉自我不断的提升，她稳健的台风，已经俨然有‘女强人’的风格。”（摘自台湾新生报《现代美女风华录》1991 年 3 月 7 日）从外界质疑：“华视怎么让新人播晚间新闻？”到的士司机见到我搭车赶去做新闻，坚持不收车钱：他说“因为你们每天奔波跑新闻让老百姓知道天下大事，太伟大了，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一天新闻部收到一箱署名给我的大包裹，里面装着满满的录像带，都是我播报新闻的模样。有心的观众还将它分日期、分时段，并且经过剪辑，剪掉了所有新闻片段只留下我的播报，他说要留给我作纪念。这可乐了我最忠实的观众母亲，她说：“我还没办法这么专业，这么忠实守着电视机，保留这些资料呢！”而我这张脸，也开始成为华视新闻的通行证。一次采访一个秘密新闻，因不能开采访车，而开了辆黑轿车。在路上超速行驶，被警察拦了下来，司机助理赶紧摇下我这面的车窗：“小莉，赶快让他们看到你！”我伸出头去灿烂一笑：“对不起，赶新闻！”热心的交通警察赶快挥挥手叫我们先走，还示意后面的车，慢行让路，深怕我们赶不上新闻播出。由于在华视新闻部快速窜起，我也成为平面媒体热衷采访的对象。

“电视记者常予人高不可攀的隔阂感，人际关系往往也只限于采访需求。但华视记者吴小莉，却不愿如此受限，她希望在电视记者生涯中，能得到人生最大的资产——友谊。所以吴小莉常以小卡片来传达她的问候和关怀，给采访对象一份惊喜。”吴小莉的‘卡片传情’，在电视记者中非常少见。她的亲切和诚心，也为她赢得‘甜姐儿’的封号，“吴小莉的好脾气、好人缘，使她拥有成熟的人际关系和工作表现，这也是她进入华视一年多，就能坐上主播台快速窜升的原因和条件。”（摘自台湾《联合晚报》1990 年 8 月 28 日）为什么选择栽培我，是我现在开始回想的问题。我想；第一是时机，那时台湾新闻圈欠缺新生代主播接班，所以，我们这群“新血”一进新闻部，事实上已经是在玻璃屋内接受观察。而所谓的好人缘好脾气，可能因为我只懂得埋头做事，在工作上有进取心，却没有攻击性。当时我最大的乐趣，已经不是今天能不能上新闻，而是能上几条新闻？那条新闻好不好看，有没有做到独家？我一直记得艳秋姊在我们“新生训练”时说的那段话：一个好主播，一定要先是个好记者。因为他在第一线跑过，才知道第一线工作者的甘苦，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这样才会是个 Ancor（主播），而不只是个 Speaker（播音员）。

这也是为什么在做主播 10 年后的今天，当大事发生时，我仍乐意到现场去看看。因为这样，才能感受大事的存在。而也或许因为我选择先做好记

者，没有一步登天想做主播的野心，才使我很快地不只是电视新闻里那只拿着麦克风的手，在踏上主播之路时，更为迅速而顺畅吧！

我的摄像伙伴

“小莉，明天开始你主跑交通线，和贾老哥一组。”交通线是公认“很肥”的路线，掌管陆海空、电信、邮局、捷运、高铁等各个有钱单位。别的不说，航空公司每年出国考察，都少不了媒体的名额。

这么肥的缺，怎么轮得到我这个新兵？后来考究，原来交通线的资深记者转调别的部门，他和交通线的摄像记者贾冠庆（华视资历数一数二的资深摄影师，现任华视新闻部采访组副组长）商量：“选小莉这个傻大个，没什么心计，好带！”因此，我就被钦点接班啦！

但这又是新手配老鸟，加上贾老哥是公认的铁面公子，生起气来，拍桌子骂人时有所闻。许多人跑来安慰我，连当时的企划组组长梁蕾也担心我“罩不妆，跑来给我打气：“没关系，贾老哥脾气不好，但是人是好人，你自己小心顺着他一点就好！”弄得我更加恐慌。

最后，我发现，贾老哥是“刀子口，豆腐心”，看到小朋友每天努力做新闻，他只会从旁提点，教我不少电视记者出门的基本动作和“画面也可以说故事”的概念。

有一次到板桥拍摄一个防洪工程的新闻。回程路上，突然看到一栋大楼外墙的楼梯间，人龙从九楼排到了一楼的壮观场面。他二话不说，扛起摄像机就拍。拍完后，他说咱们去看看。原来九楼有一个证券公司，当时台湾股市刚飙升，许多人上午都放下正业，翘班跑证券行买股票。

就这样，在贾老哥对画面的敏感下，我们又带回了一条新闻。

这个当初被他钦点的小孩，虽然尊师敬老，符合他“好带”的要求，但是却非常“多产”，通常当别的摄像师剪辑完成一条新闻，可以休息时，贾老哥却在帮我剪第二条新闻，而我还在创作第三条新闻。每晚赶两三条新闻是常事，有时赶急了，他会埋怨“别那么认真，你不能像别人一样，只做一条新闻呀？”说归说，毕竟是老新闻人，贾老哥身上的新闻细胞，还是被我这个因为刚人行，正兴致勃勃投入的新手给感染。每次看到“吴小莉、贾冠庆的报道”字样频繁在电视上出现，他还是十分骄傲。

一位摄像同仁就对我说：“贾老哥只和两个人合作愉快，一个是李艳秋，一个就是你了，”同事更笑着谢谢我：“小莉，多亏你让贾老哥这么高兴，他已经很久没有向我们发脾气了。”后来，贾老哥升任采访组副组长，我不再有机会和他一起跑新闻，我也逐渐从笨鸟变为老手，肩负提携新摄像的任务。但是我永远记得，一次火车意外，当场撞死路人，我们到达现场时，罹难者仍挂在栅栏上，贾老哥立刻叫我摘掉眼镜，去旁边查问相关资料，不要靠近现场，他去拍画面就好。这就是我的搭档，一位亦兄亦友，引我入电视摄像殿堂的老师，我也永远怀念：“这是华视新闻，贾冠庆、吴小莉在各地报道”的那段岁月。

第四章、“华视”采播手记

我对华视有极深的感情，不只因为它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因为那里有我许多挚友，更因为它是成长茁壮的地方，为今日的我奠定基础，练好基本功，让我可以行走江湖。

我进华视时，新闻部正锐意进取，李艳秋、梁蕾陆续从海外在职进修归来，新闻部在经理黄新生、采访组长李继孔领军下，企图以关心老百姓切身生活的民生新闻突围。艳秋姊、梁姊和我，同是辅大前后期学姊妹，我们成为播、编、采铁三角。顿时，辅大帮声名大噪。那时的华视新闻，也曾拼到收视稳坐第二、直逼第一的局面（当时“民视”未开播，台湾只有3家无线电视台，“华视”开播较晚，一直以戏剧综艺为主力，到后期才开始重视新闻）。

这段华视新闻的黄金岁月，正好是我初入电视圈的时期，使我一直觉得做电视是可以如此有目标，如此意气风发。

交通这条线

“小莉是部长终结者！”朋友开玩笑说。“对呀！不到3年已经有两个部长被换掉了。”我说。和我对话的，是跑交通线的记者同行，时间是1992年。

台湾中山高速公路拓宽工程又爆发关说舞弊案（就是靠人情压力或实质利益，游说他人达到目的），由于台湾工程，是分段公开招标，让工程单位竞标，所以每个路段，都有编导，传出关说弊案的路段，被称为十八标，所以通标为十八标案。

传说有立委，而且是颇高层级的政治人物介入关说。在我们这群记者穷追猛打之下，当时交通部长证实有立委关说，但又不肯指名道姓，最后只好黯然下台，远赴英国，任驻外官员。这是我跑交通新闻后，第二位部长离职，而所谓的舞弊案，如果没有我们这群媒体死盯着不放，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就化无”，搓“汤圆”，（台湾政坛术语，就是合纵连横，为某些特定目的进行游说）就给搓掉了。

偏偏交通部长又是挺难做的官，不幸有个空难，或意外的火车出轨，得理不饶人的民意代表都可能要求交通部负行政责任，辞职下台（像1998年初华航桃园机场空难。又换走了一个交通部长）。

交通部是个“肥部”，手下掌管大小工程动辄上亿台币的预算，关说围标等舞弊案传闻不断。

老交通记者打趣说：“历任部长就数连战的官运最好，他在交通部长任内，没发生过交通大意外，安安稳稳做完任期，升官去也！”媒体常和官员打交道，事实上，彼此间早已建立了朋友般的情谊，同行都是“对事不对人”。十八标案，媒体苦苦寻找的只是个真相，但部长碍于和高层的默契，几次想说出真相撇清关系，却都临时缩口，弄得舆论开始鼓噪，已到摊牌的时候。

交通部通知媒体部长有事宣布，当时台湾电视新闻现场直播还不普遍。SNG（卫星现场转播车）大多仍用于转播职业棒球比赛，3家电视台只好在交通部架设微波，打算现场转播交通部长的一场记者会。

部长刚和执政党高层开完会，所有媒体都等候他出现，因为我们知道，

扰攘台湾社会多月的工程弊案不是在今天有个突破性的答案，就是部长可能辞职下台。

我当时在交通部记者会现场做转播，因为部长和高层的会议延迟，我只得在特别报道开播后做了近 10 分钟的独白。所幸我一路追踪这条新闻，来龙去脉清楚，像说故事一样，我告诉观众事件的起因、演变和仍存在的疑点。

部长终于出现，他只说了一段告白，没有接受提问就默然离开。一如媒体同业所料，执政党成功地搓了汤圆，但是下汤被煮的是交通部长，他选择了保留关说的秘密，离开交通部，留下了我至今仍然想知道的疑问：“究竟是哪位重量级的立委、政治人物，让一个政务官不敢说实话？又或是执政高层到底给了什么样的承诺，让一个破关说者宁愿辞官，扛下责任？”作为朋友，我仍关心他的动向。

1998 年年初，传闻他将被调回台湾，但是最终没有成功。这时电视新闻传来：“台湾传出中正机场到台北的捷运工程关说弊案，中华工程公司代表指控，在立法院长关说下，原本各项排名均在后的长生集团，竟然在最后关头，排名窜前，夺得工程……”。

唉，我不禁叹了一口气，开始责怪自己当年是不是不够努力，没能捉到关说的“大老虎”，让台湾这种关说“传闻”，在 6 年后仍然不断重演？我只是不知道，远在英国的前部长听到这则新闻，心里又是否别有一番滋味！或许，有一天，等他退休了，我会再去问问，“到底是谁？这个至今让我仍然牵挂的疑惑。

采访空难

“在台湾，做记者最大的梦魇，就是有一天呼机突然响起，告诉你，飞机又出事了……”。

这是华航桃园机场空难后，我在凤凰卫视主持《轰天浩劫华航空难大纪实》特别节目时，有感而发，说出的一段话。

台湾的飞航安全一直令人担忧，在台湾 4 年 9 个月的记者生涯中，我就曾采访过 5 次大大小小的空难。我真的很怕听到空难的消息，因为它不是机师忘了放起落架、只好用机腹降落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乌龙事件，就是几十到几百人集体罹难的悲剧。而每一次，都让我刻骨铭心……1989 年 10 月 26 日，傍晚将近 7 点，我刚忙完晚间新闻，突然传来华航客机在花莲撞山的消息，我的新闻神经突然绷紧。我立刻和民航局、航空公司、交通部、甚至花莲塔台确认消息，查询可能的撞山位置，然后整个新闻部动员起来。我立刻发新闻，将最新消息告诉观众；采访组长指示另一组文字记者，带着两个摄像师，直奔火车站，搭车前往花莲。

一路上他们唯一的耽搁，是路途中买了几件适合爬山的牛仔裤和球鞋（新闻部总部通常在台北，花莲在台湾东北方向）。因为飞机已经停飞花莲机场，而飞机撞山确实位置还没确认，山区都是荒芜树林，没有人行道，人烟罕至。

当时已经天黑，所有救援工作被迫停止，当地搜救人员打算天一亮就由山地青年带路砍树上山，找寻生还者。

陆路这组同仁，就是赶在天亮前，到达花莲和搜救人员会合一起上山

救人。我留在总部，一面发最新消息，一面联络台湾空军救难部队海鸥部队直升机，计划第二天一早我和摄影记者登上海鸥部队直升机在空中协助搜寻。

我继续和在华航、民航局各个点上的同仁联系。当我完成 11 点多夜间收播新闻，部署好第二天新闻战的计划，已到凌晨一点多。

我回到家时已夜深人静，父母习惯了我为 而忙碌，早已入睡。我匆匆梳洗上床休息。我知道还有场硬仗要打，但心里记挂的是飞机上的乘客是否仍有人存活，如果有，在寒冷荒芜的山区，他们是否能渡过？在祈祷中我疲惫入睡……清晨 3 点多，刺耳的闹钟声吵醒了我，窗外漆黑，但我知道 4 点多东方就可能露出鱼肚白，救人不能延迟。我起身换装，担心父母以为我没回家而挂念，我只好摇醒睡梦中的父亲：“爸爸！我回过家，现在又要出门了，我有开车，不用担心！”我驱车直奔松山机场和摄影记者会合，准备妥当，我们登上海鸥部队直升机时，天已泛白，将近 5 点钟了。

十几分钟后，我们抵达失事现场的山区，从空中鸟瞰，一片树海，山下救难人员已开始砍树上山，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从空中 locate（确认）坠机位置，告诉陆路救难人员正确的方向，直升机在狭隘的山谷中来回盘旋，寻找目标。

我因睡眠不足，加上直升机为了找人，一会左转、一会右拐，一会高空、一会低飞，我一会儿要帮助搜寻，一会要抓着我的摄像师，以免他太专心拍摄跌了下去。没进食的我这时忍不住晕机，作呕。飞机上只有我一位女士，空军飞行官同情地看看我说：“躺下来休息会比较好，找到了我叫你！”我脸色全白，但是坚决摇摇头：“我要帮忙找！”直升机又搜寻了 5 分钟，“找到了，找到了！”在一片焦黑，像是被烈火烧秃的山地上，散落了一大片飞机残骸，我的心顿时往下一沉，因为可以看到的残骸中，最完整的也不过是华航机尾的那一个标志，金属已如此残破，何况是脆弱的人？“没有希望了！”飞行官说。

我拿起了麦克风，在摄像师拍摄影像的同时，用我的声音记录下我看到的一切，我们第一个确认了失事的位置，通知陆上所有救援单位，海鸥部队继续贴近失事地点周围环绕几圈，确定没有从空中立刻救援的必要后，决定回航！

到达台北机场，飞行员扶着摇摇晃晃的我下飞机，他尊敬他说：“我没有看过一个人，前一秒钟还对着呕吐袋作呕不止，后一秒钟就能没事一佯的拿着麦克风，对着镜头侃侃而说！”我只能牵动嘴角，以不太好看的笑容回报他的赞美，因为平衡感极差的我，还在“降落中”！

出了机场，采访车已在等候，我立刻飙车回总部。同事着急问我，“情况如何？”我知道他们可能关心新闻和画面如何？但我只关心“人”如何？“希望渺茫！”

我说。

我稍做整理，这则新闻快报就以最快的速度登上荧幕，这是班机出事后，观众第一次看到失事现场而我呈现的故事，也是我第一眼看到飞机残骸那一刻所录下的真实感受。事后证实，机上 54 人全数罹难，肇事原因是机师起飞后，原应转向离开机场，却误转方向撞山。

这是我第一次采访空难，许多细节要翻看过去的剪报才能回忆。但是，在直升机上，找到飞机残骸的那一刹那，心情由极度震撼，到预测那个环境

是 No body could make it 无人可能生还的绝望，我不会忘记！

“海鸥部队救难人员从空中鸟瞰，藉由唯一一片完整残骸——机翼上航空公司的徽号，终于判定失事位置这是我当年在新闻中说的一段对白，或许已成历史，但华航徽号躺在焦黑土地上的那个画面，却在我记忆深处，至今难忘。

突发新闻

1991年4月28日傍晚，位于台北市民生东路南京东路口的麦当劳，传出一声巨响，爆炸的火焰从旁边男厕内冲出。麦当劳被歹徒恐吓放置炸弹，警方据报后，立刻疏散人群，派出防爆小组人员进行搜索。大批媒体赶到（包括我在内），最后在男厕天花板夹板内，找到疑似自制炸弹的物品。

因防爆人员无法预估炸弹威力，只研判出是水银平衡式炸弹，必须小心保持平衡，拆卸引爆装置。一名拆弹人员穿上防爆衣和面罩，爬上木梯，准备进行拆卸工作，所有人员退到安全区内。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突然轰的一声，炸弹爆炸了。退到对面街道的我们，都能清楚看到冲出的火焰，现场一阵混乱。警方冲入现场救人，救护人员扛着担架抢入，将负责拆卸炸弹的防爆小组人员紧急送医。爆炸现场玻璃门窗散落一地，防爆小组成员拿着刚刚穿在拆弹人员身上的防爆衣和钢盔难过地走出来，防爆衣已经破烂。

正当警方仍在民生东路麦当劳清理善后，歹徒突然又来电话：“基隆路、松隆路口，电线杆下还有炸弹！”台湾社会鲜有炸弹案发生，即使有大多也是虚惊一常但是刚才的那一个自制炸弹威力惊人，据警方研判是行家所为。我们知道这回是来真的了，大批人马便涌至松隆路一带。警方一面疏散车流入潮，封锁街道；一面用仪器进行搜索，最后在歹徒所说的电线杆下，找到了一张恐吓纸条。在场媒体记者当场哗然，“歹徒太嚣张，不但危害无辜百姓，还自恃聪明，玩弄警方！”这时医院传来消息，拆弹人员近距离拆卸炸弹，爆炸当时，他因为首当其冲，送医后已经不幸死亡。

新闻播出后，台湾舆情义愤填膺，但是像警匪片似的，歹徒仍在暗处欣赏自己的杰作。林森北路麦当劳店没多久又接报有炸弹，店家没有即时疏散顾客，结果炸弹在厕所内爆炸，所幸规模较小，除了门窗受损，没有人受伤。麦当劳高层被指责罔顾顾客生命，而恐吓案还波及其它速食连锁店，店家决定暂停营业。

警方则全力搜寻具有爆破经验或训练的退役特勤人员，筛选可疑名单。最后经过12天的追踪，靠着歹徒的勒索电话，锁定可疑人物，终于捉到企图恐吓取财的两名歹徒新闻背后的故事“市长，幼稚园罹难者家属抗议市府善后缓慢，要求市府官员为事件负责下台，您的看法呢？”我问。“事件还在调查中！”市长回答。“已经调查一年了，还没有结果吗？”我追问。“还在调查，怎么可以乱说！”市长气急败坏地伸出大手，从我背后用力推开我，然后在随从人员护送下乘车离去。我转身问摄影记者，全程拍下来了吗？摄影记者点头，我吩咐收队回公司。

我心中并没有因为市长的不礼貌而不悦，反而感慨很多，短短30秒，竟然让一位平时温文儒雅的政务官“原形毕露”。我打算在我的新闻中，不加任何评论全程照用。这个故事发生在五年多前，前一年的此时，台北市一间幼稚园娃娃车，因为车辆突然起火燃烧，当场烧死23位师生。其中一位

幼稚园老师因为忙着救学生，最后被发现抱着学生死在车内。

学童安全在台湾社会引起很大回响，为了纪念这位老师，市政府在台北新生公园建立了她的塑像，邀请当时的市长参加揭幕仪式，罹难者家属因不满一年来市府仍没对事件做出交代，在现场拉起白布条抗议。

在市长致完词准备离去时，我快步一走，拦在市长车前，开始问问题。所有媒体也一拥而上，因此就出现上面这段对话。

回到公司写稿，当时的采访组长关注了一下：“总经理办公室打电话来问，早上是不是有人抗议？”我担心的事果然发生，显然市长事后发现自己态度不对，企图来关说圆场一下。“对呀！”我说。“市长办公室打电话来解释，说抗议的事根本和市长没有关系，可不可以不用！”组长说。“好呀！我少用家属抗议，但是，我会用市长的访问。”我回答。我当然明白市长办公室“关心”的是什麼，我也料准他们不敢明说，他们担心的是对媒体态度不礼貌。

进剪辑房做后期制作，当时的新闻部经理赵怡也来关心了，显然市长办公室是真的很担心，正在看着摄像剪辑的我转头说，我会少用家属抗议，但这段访谈我会全程采“已经调查一年了，还没有结果吗？”“还在调查，怎么可以乱说！”……之后，我把声音留白，画面则是市长大手推人，关上车门。在市长座车扬长而去时，我的旁白声起：“市长在媒中追问下匆匆离去，至于火烧娃娃车的肇事原因，则仍然没有解答。”经理看完，停了半晌说：“你用吧！”转身离去。

新闻播出后，同业们万分愤慨，高雄记者站的同仁打电话来支持。这则新闻在电视上出现了两次，另外两家电视台也用了这段一问一答。第二天报纸民意论坛中，有读者投书这样写到：一个政务官的修养，对政务的负责态度，在现代大众媒体下，无所遁形……。”

新闻这条路

晚上近 7 点，乘 3 分钟晚间新闻就要直播了，一位主播抱着大批新闻稿往主播台上冲，嘴里喃喃自语：“真是入错行！”听到的同仁总是哄堂大笑。因为我们都明白，这是什麼样的“心里话”。新闻的快速，时间的压迫，在即将开播前，都到了临界点。主播往台上冲，头条新闻可能还在剪接房里，Insert 填补上最后 5 秒钟画面。

我们常说，新闻开播前 5 分钟，最好不要在新闻部走廊和往直播室的楼梯间行走，否则被赶新闻、跑带子的同仁撞伤，恕不负责。

华视就曾有同仁，赶送带子而不小心摔伤了腿，要包上石膏好几个月。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爱看由荷莉·杭特主演的《焦点新闻》这部电影，戏里面描绘一条新闻在赶开播前的紧张，和终于 make it 的成就感。我诚实他说，它是真的，而且它每天可能都在发生。

一天中午，我刚播完新闻，台东外海传出飞外岛的小飞机出事坠海，有人失踪，有人获救。当时华视没有驻台东记者，距肇事地点最近的是高雄记者，但高雄飞台东客机少，开车车程又要 2 个小时，当时已近一点，赶晚间 7 点新闻，肯定赶不上。最后我们决定由台北南下，我带着摄影记者搭乘一点多的客机飞台东，到达现场已两点多。

我的任务是在 2 个小时内完成所有采访，并搭乘 5 点飞台北的飞机返

航，否则晚间新闻的头条就泡汤了。

台东的采访现场任务颇多，既要到民航单位查询失事详情，又要到获救者所在医院，还要到外海失事现场和追踪搜救人员行动。我们在当地并没有后援，我和摄像记者最后决定，新闻需要现场感，人力不足的点必须舍弃。

首先，我们包车直奔医院，必须找到生还的乘客和机师，由他们口述，将新闻故事还原。

幸运地，我们是第一个冲入医院的媒体，刚好撞见正在移入病房的机师和生还者。机师告诉我们，飞机失事迫降的原因；生还者情绪激动地述说，乘客如何打破玻璃，逃出飞机，游出海面……。我只适度提问，将当事人劫后余生的激情全数保留。当我们做完采访打算离开时，友台的同业赶到了，我知道他们至少有两组人在台东活动，而我的观众只能靠我们这组人了。

现在要抢的新闻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时间。离回程只剩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决定下一个点必须到失事的海边看看搜救情况。回程搭飞机时，才顺道在机场附近向民航单位查问最后资料。在飞机关闭前5分钟，我们赶上台东飞台北的班机。

摄影机里带回了当事人的第一手访问，失事现场的情况和官方说法。但我们的工作还没结束，要如何在6点钟飞机抵达台北后，能完成后期制作赶上7点钟的头条新闻？这是另一个和时间的竞赛。

我在飞机上写稿，就记忆所及，选出我要的访问内容，请摄影记者先在飞机上用耳机听出来，找到 Time code（时间点）。一下飞机，公司采访车已在等候，我们跳上车子一面向公司飞奔而去，我一面在密闭车厢内录妥新闻旁白（voice over）。6点40分到达公司，采访组长看到我，举起双手高兴他说：“头条回来啰！”我头也不回直奔剪辑房，并回答说，“还不知道赶不赶得上？”补上我的 voice over，剪入访问，最后 insert 剪辑画面，我和摄像记者身后站了组长和副理一排人，我嘴里喃喃“阿汉阿汉，加油！”此时心里浮现《焦点新闻》里新闻制作人荷莉·杭特在陪剪辑师剪最后一个画面时，手拍着桌子，不断鼓励剪辑师，“Bob, Bob! Bob……”的画面。

“Done!”我取出完成的带子直冲导播室，当我把带子交到制作组同仁手上，全身松软地往回走时，刚巧听到华视新闻的片头响起，30秒后，这则新闻在电视上顺利播出，观众可能不以为意，但是参与其事的人，却深刻明白个中滋味，因为“我们赶上头条了！”曾经为跑了一条独家而沾沾自喜，曾经因为今天的新闻播得不完美而懊悔不已。一位同仁说了这样一段话：“小莉，这就是新闻世界，你随时可以扳回一城，也随时可以痛失城池，但是 every day is a new day，每一天你都可以重新来过。”这让我想起《飘》这部小说的女主角郝思嘉在故事的结尾时说的一句话：“Anyway,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这也是我在新闻世界中学习到，至今仍奉行不悖的人生哲学。有人问，“新闻迷人之处在哪？”“在它的不可知，在你回首来时路时，发现今日新闻成为明日历史时，你竟然都有份参与。”我想，我现在会这样回答。

自从记忆力不好，为了写下过往印象较深的采访，我请友人代查台湾麦当劳爆炸案是何时发生？友人问：“做什么？”我说：“我在现场呀！看到拆弹人员当场被炸弹炸烂的衣物……”这位女性友人听我说完这段故事，仍有些惊愕他说：“唉！你经历过的事还真不少！”

眼看波斯湾起战火，又见彼方战事停

1990年波斯湾战争爆发，华视派到波斯湾的记者被扣留，失去联络好几天。好不容易有了消息，要他兼程回台湾，一到台北我请他上主播台和他做现场对谈。这一代中国人命好，没有大战乱，做战地记者更少，那次访谈，极有临场感。

另一天，电视上正播放着最后一条新闻，心里想着待会只要温柔地和观众说晚安就可以收工了。这时，耳机传来导播急促的声音：“小莉，有最新消息，现在送稿子下来！”现场导播给我做手势，还有20秒回主播台。楼梯间传来急急的脚步声，我正思考，如果20秒回现场后，稿子还没到手，我该先说些什么应急？

偏偏快回现场了，我的麦克风已经打开，不能开口问，到底是什么新闻，这么紧急，只要知道是什么事，都可以先拖拖时间圆圆场，5、4、3、2、1、回现抄...一张潦草的字迹刚好递到我的台前，“观众朋友，我们收到最新消息，伊拉克总统海珊（萨达姆·侯赛因）已经在几分钟前宣布投降，如果消息证实，波斯湾战争将正式宣告结束，这就是今天华视晚间新闻，我是吴小莉，祝您有个好梦，晚安！”

第五章、从台北到香港

吴小莉进军香江加入“卫视”

“华视前新闻主播吴小莉昨日告别台北的新闻生活，飞到香港为十一日中午卫视中文台新节目‘台湾财经眺望’亮相，她在饯行记者会上以‘世界观’、‘国际观’自期，希望在两岸三地关系日趋密切之际掌握先机。”（摘自台湾《中央日报》1994年7月8日）“甘国亮表示，首次见到吴小莉，对她极具亲和力的态度，自信沉稳的表现及专业素养印象深刻……”“卫视中文台昨（七）日举行酒会，欢迎前华视新闻主播吴小莉正式加盟卫视，中文台台长甘国亮在会中赞许吴小莉是一个具亲和力、自信、独立的女孩。”（摘自台湾《自立早报》1994年7月8日）吴小莉赴卫视甘国亮来台欢迎昨午搭机赴港迎接工作新挑战“昨天下午搭机离台，前往卫视发展的前华视主播吴小莉，昨（七）日举行行前记者会，中文台台长甘国亮，并亲自来台欢迎吴小莉的加入。

吴小莉说，知道此行所面临的是个新的环境，会有新的挑战需克服，但也未尝不是个新的转机。”“由华视新闻部转往卫视发展的吴小莉，是在卫视主动联系之下，到香港中文台，与相关主管会面，由于吴小莉具有新闻从业背景，而且台风稳健，人又长得甜美，本身对于转往卫视发展的兴趣也相当浓厚，因此，便谈定了前往卫视的发展计划。

在昨天卫视为壮其行色所举行的记者会中，吴小莉坦言，到卫视之后是个全新的工作环境，势必得适应一段时间；而且其新主持的财经报道节目，在中文台也算不上‘主流’节目，做新节目的压力与辛苦，自己都有心理准备，但为了扩展自己的视野与发展空间，她愿意接受这份挑战。”（摘自台湾

《大成报》1994年7月8日)

正式奔向卫视中文台怀抱

吴小莉动作归零，心情有点恐慌

“卫视中文台昨天在台北凯悦饭店为吴小莉举办了一场欢迎会，但是吴小莉却是怀着‘嫁作人妇’的心情，向参加宴会的新闻界好友‘道别’。吴小莉说，此次赴港加盟卫视，离开亲友独自过活，面临的是新环境、新生活、新工作，心里确实有点‘恐慌’。”

“吴小莉又说，不过对于她即将面临的新生活，她已经调整好她的‘归零’动作，纵使前面有很多阻碍，愈是冒险的工作，愈能感受到成功的满足。”（摘自台湾《中国时报》1994年7月8日）1993年7月7日，我带着一个黑色的小行囊，来到了台北凯悦饭店，参加卫视中文台为我举办的欢迎会，也可以说是我告别台北朋友的惜别会。除了电视圈的好友来相送外，台北当时叫得出名字的报纸、杂志几乎到齐，小小的会场挤满了五六十人。

事隔5年，我本来已经忘了那时的感受，但是在翻看新闻剪报后，当时背着小行囊走天下，既勇敢心里又没底的：“壮士”心情又回到我的脑海。这是我人生极大的转折，现在回想，也不知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离开华视高薪闪亮的金饭碗，放弃台湾熟悉的生活环境、亲人和朋友，只身到一个语言不通（当时我完全不懂广东话），人生地不熟的工作环境，而我也明明知道，新开播的卫视不论设备、人力、物力绝又，没有老牌的“华视”好，但我还是决定搏一搏。

这个决定，跌破许多人的眼镜，因为我是3家电视台第一个跨足新兴媒体的现任主播，被台湾新闻界称为“中生代主播离家出走”。

卫视招手吴小莉率先跳槽

“在面临诸多‘外患’压迫的紧张情势下，三台不仅不再居以往垄断事业的强势地位，观众群被瓜分尽管已是三台相当关注的问题，防止中生代接班人才因而逐日流失的因应之道，更是刻不容缓，倘若不赶紧改进人事制度上的缺失，吴小莉跳槽事件，还会不断上演。”“吴小莉事件是个警讯，正警告着三台，‘外患’除欲瓜分他们的市场外，也正着手准备啃蚀他们的‘根’。毕竟未来的空间广阔，可任由满怀理想的电视人优游其间，而不再受三台摆布、掌控。”（摘自台湾《大成报》1994年6月24日）台说说话：“今天以前的我，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和在场的媒体朋友一样，是来参加记者会的，今天，转换角色，我站在台上接受采访还有些不习惯……”抱着腴腆、期待的心情，我回答了所有媒体的疑问，为什么抛开台湾电视新闻从业人员的高薪到香港去。

属于中国人的地盘好大

1992年，卫视刚进入台湾市场，积极和各方交往。作为境外媒体，寻找台湾“熟悉”的亚洲新面孔，是打入当地市场最快的方法。在这个因缘下，

卫视高层和我做了第一次接触。当时没有具体合作计划，我也是基于职业习惯的好奇心，想了解卫星电视这种新兴媒体。

大家一起时聊电视，聊市场，相谈甚欢。往后几次都是以结交了香港朋友、提供台湾电视市场资讯的心情进行往来。

1993年5月，卫视正式向我提出邀请，希望我从7月份开始到卫视主持财经类专题节目《台湾财经眺望》。朋友归朋友，但真要进行合作，就得进行“长考”了。

我说：“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考虑！”当时的我在华视工作已经4年多，每日新闻的例行和琐碎让我的成就感渐失，就像新闻部的学姊梁姊（前华视外电组组长）在跑了8年新闻后说的：“我一定要从采访第一线上退下来转换转换，因为我一出门就知道今天会碰到什么人，这个人会说什么话，我可以出门前就把稿写好，只要回来把访问往里头放就成了。”当一切可以变得routine（例行）时，工作就失去挑战和乐趣。我刚开始思考做些有深度的专题，因为这样才可以累积，并且告诉自己是时候再去念念书，充充电了。所以，卫视接触我时，我其实正在进修考托福，计划赴美念书。卫视的邀请打乱了我的计划，却提供了另一项选择。

我首先和家人商量，想不到，平时最舍不得孩子离家的母亲竟然第一个赞成，因为她说：“反正我在电视上看得到你！”比较于我去美国念书的山长水远，坐飞机只要一个小时的香港已经是很近的地方，而且她的条件是“不怕，都在我的‘可视’范围。”自此，母亲开始研究卫视节目，我还没决定去不去，她就对卫视“批评指教”！“了解行情呀！”她说。父亲则比较实际，他一向赞成妻以夫为贵，女孩能做事就好，不要太能干。“工作很重要，但是在香港你人生地不熟，所有关系和朋友都要重新建立，我担心会耽误你自己组织家庭！”他说。

父亲果然聪明，知道我的个性完全像他，一旦投入工作，就是没眠没夜，昏天暗地，对自己的生活细节常常无法照顾，更何况到了他两老都鞭长莫及的香港。

眼看他想尽快把6个女儿都嫁掉，了却他肩负女儿幸福重任的愿望，因为我的考虑远行，而又不知何时才能实现时，当然，他要先提点提点我。但最终拍板，还是得靠自己。就在我思考犹豫时，华视派我赴大陆采访，和台湾民航界代表到上海参加“两岸通航研讨会”。

之后，我还转赴内陆成都，到训练机师的成都航空学校参观。一向喜欢飞机的我，当然欣然应允。那是我第一次到大陆，而这趟“上海——成都”之行，也改变了我后来5年的命运。

第一次到上海，住在扬子江饭店，研讨会也在那附近召开。首先，上海给我的印象是每天傍晚要由开会的郊区（至少我当时概念是），赶到在市区的旧上海电视台传送卫星。将新闻送回台湾是件最苦的差事，因为南京东西路的塞车状况非我能想象，当时最大的成就就是找到一个灵光的“的士”司机，任他往大街旁的小巷钻、住家的后门过，经过没有路灯、黑黝黝的小路，哟！他就是能在截稿前把你送到！

我们在“上海”的最后一天才有空当，一伙台湾来的“刘姥姥”在南京东西路上，硬是要步行走上10里，想找寻当年十里洋场的风貌。静安寺的小吃、外滩建筑群的万国博览会、和平饭店里的爵士乐，都使我乐而忘返。

在上海友人陪同下，我们沿木梯爬上二楼，参观了当年和平饭店开个

窗还会轧轧作响的客房，最后我们的结论是，老和平饭店还是让我们来怀怀旧就好，如果真要住在那，可能会“姑娘怕怕！”带着上海的繁华印象，这个台湾航空团搭乘西南航空班机转往成都，由于团员不是航空专家，就是航空公司负责人，所以机师知道有同行在，立刻将飞机转成“自动驾驶”，离开驾驶舱到乘客区和这群台湾来的朋友聊天，我看着“无人驾驶”的飞机在几万尺的高空翱翔，心里有些发慌，老想帮忙“结束话题”，大家可以各就各位；机师看出我的忧虑，笑着说：“这一带地形比较空旷，不过马上进入山区，我得失陪回座了！”没多久，飞机进入四川盆地周围山峦，只见机身突然向右大幅度倾斜，我望向窗外，整片地表几乎和我平行，可以清楚看到山川纵横的烙樱没多久，机身开始向左倾斜，显然机师在造福左面的乘客，舱内响起掌声，我们猜想，这位帅气的机师，是想为同行表演一手！

但是这对我的震撼却是：从沿海到内陆，属于中国人的地盘，好大！而我也终于明白，幼时喜爱苏轼：“大块假我以文章”的气魄是从何而来。

相对于上海，成都显然宁静纯朴得多。在饭店洗手间，因为没有一元零钱，我把皮包里仅有的10元散钞，交到卫生间守门的嬷嬷手中，她看看手中的钱，竟然拉着我的手，诚恳地不断说谢：“小姐，您真是活菩萨！”我有些羞愧，为自己过去的浪费和不知惜福航空学校的采访，极为成功。校长骄傲他说：“大陆的民航机师多是从这里训练出来的。”在航校，实际飞行非常重要，选在成都，就是因为机师只要能飞过四川附近险恶的山岭，以后飞民航机就轻易得多。

航校有自己的训练机，飞行训练分初级和高级；高级班要翻山越岭，到达云南等其它基地；初级班，就在航校机场练习起降。

我和摄影记者获准“免费”搭乘训练机到成都上空鸟瞰一圈。说免费优惠可不夸张，因为虽然是学员练习起降，航空学校为贴补校用，还开放给没机会坐飞机的民众试乘，每人收少许费用。我就看到一家大小排队坐飞机，他们当做是假日旅游的重点项目。摄影记者问我：“他们知不知道，这可是新手驾机，一点都不好玩的？”“嘘！我们也要上飞机拍摄的，别乱说！”我心虚地回应。所幸，上了飞机，看到刚接受我访问的教练正坐在驾驶座旁，心中顿时安心不少。

飞机安全降落，全体乘客鼓掌，我们也完成专题的拍摄，航校校长热情的问：“吴小姐，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电视上那个卫视台看到这个节目？”对四川的朋友来说，凡是说普通话的境外媒体可能都是一样的。我笑着回答：“好呀！我下次在上面做节目给你看好了！”大家都满意地笑了，而我心中，却已做出了决定。

多年后，和我一起出差成都的台湾报社朋友再遇到我时说：“原来你当时在成都说的话，不是开玩笑！”

喷水池理论

回到台湾，我心中已经决定接受卫视邀请。因为我突然发现，在儿时地理课本中读到的三川五岳里，有这么多和我说同样语言的中国人，属于中国人的世界好大，我可以做更多好看的节目，给亚洲更多的中国人看，当然包括我在台湾的父母亲（卫视当年涵盖范围包括大中华的大陆、香港、台湾，北到俄罗斯，更远南到印尼、马来西亚，西到中东，东到日本）。

开始口头向公司好友询问意见，林副理知道我要走，只说：“如果你要去公共电视，我不赞成；如果你要去念书，我也反对，我也念到硕士，那又怎么样？但是你说，你要到卫视、到香港去看看，我就不会拦着你！”停了半晌，她补充说：“不过，香港有‘九七’的问题，怎么办？”我为林副理站在我立场想问题的知心而感动，我笑着回答：“我就是想去看九七，这是百年碰不到一次的事，做为社会工作者，如果只在九七年才到香港报道事件，就无法深刻了解香港社会的改变，我还有4年的时间去看看香港，了解香港人。我相信，我看到的九七会比较真实！”她不再坚持，只说：“那里如果不好，你就回来！”不再是领导后，我们反而成了忘年之交的好友，因为我一向不太爱接近领导，担心被人说逢迎拍马。但是退远一些，我反而把她当母亲一样尊敬。她知道我想念台湾的蚵仔面线，便把家中珍藏的即食蚵仓面贡献出来，并告诉我：“买点大肠，蚵仔加面煮，味道像极了路边摊的蚵仔面线。”香港回归时，她率领华视大队人马到香港。大家碰面一起吃饭，她关心的不是我的工作，她从来不用担心我的工作，只象家人般询问我的终身大事，我总是调皮地反问：“礼金多存凡年，给我的红包是不是就更厚些？”华视同仁为我办的惜别会上，我走到当时的采访组副组长匡敏师父那儿——我们都简称他师父，因为他是资深的摄影记者。他除了是新进摄像同仁工作上的师父外，每个人更必须经过和匡敏师父学喝酒的洗礼，什么深水炸弹（绍兴加高粱）、表面张力（酒满到表面张力的平衡状），必须一一试过，才能过关，我是唯一不受教的，因为我真的不懂喝酒，他也就从来是“小莉喝茶！”别人喝酒。师父只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到了香港，我们就照顾不到你了，自己要小心！”刚到香港工作，一次师父到香港和商界朋友聚会，硬是要找到我参加，我知道他不只为了人多好热闹，他是担心我刚到香港没有朋友，他想尽力去延续照顾这位小朋友的力量：“这位大哥，人不错，有问题可以找他，就说是师父说的！”一直到几年后，他看到我这个小朋友自己生存的不错，师父再到香港玩，我就不一定会被知会了。

和所有关心我的朋友一样，大家都支持我的决定，却不一定看好，就连我自己也没有把握。或许人在思考时都像个哲学家吧！一天，我和朋友相约在华视大楼的喷水池前等候，在等待的过程中，我第一次有机会细细品味喷水池的水是怎么样往上走的，于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这个水柱永远不会停在原处，因为没有下一个力量把它往上推，它就会 drop 往下掉。

“留在原地，就是退步。”我这样告诉自己：“必须往前走。”即使我知道此去可能喷得更高，也可能就此失去它的支柱，散落成一滩水滴，但我愿意把机会交给自我做过最坏的打算是，如果到香港真的“水土不服”，那我就照原订规划去美国念书，别以为我是个只为理想的浪漫主义者，其实，我也很理性的，为此我曾和美国的老师联系过，“有海外实务经验的学生，学校更乐意收。”老师这样答复，这给了我大胆的决定，留了个退路。

飞向亚洲后会有期

第二天，我就向华视正式递出辞呈，心里唯一挂念的是怎么向照顾我的领导交待。当时一位副采访组长找我谈话：“如果我有能力，我会想尽办法把你留下来！”真的感谢华视给我的一切，那是我成长茁壮的地方，我永远不忘。向当年的张总经理辞别时，总经理给了我一个红包，表示对我这个

华视员工近 5 年工作的谢意，离别前他说：“有空回娘家看看！”后来我返台，有机会去看望他，他不忘说：“香港比较湿，把这个带去，插电就可以用，很方便！”原来是个小型除湿器。

吴小莉转型卫视频道后会有期

（摘自 1993 年 6 月 30 日《中国时报》）吴小莉今最后一次播报华视新闻，随即赴香港卫视主持财经节目（摘自 1993 年 6 月 30 日《大成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就是今天的华视新闻，我是吴小莉，我们后会有期。”1993 年 6 月 30 日我完成在华视新闻中最后一次的播报，因为当天平面媒体的报道，许多朋友好奇，我会如何和观众“道别”。但对我来说，我不是离开，只是转换跑道，我没有道别，只强调“后会有期”。新闻播完后，一位老妈妈声音的观众打电话来：“你为什么要走？是不是华视欺负你？”说着说着还听得到对方似乎哽咽，吸着鼻子的声音，我安慰她：“我没有要离开你们，以后你还是可以在卫视里看到我！”“怎么看得到这个频道，我不知道？”她说。“问问你孩子，他们一定知道！”我说。

“好，我问他们看看！”几经劝慰，她终于抱着有机会在电视上看得到我的希望，安心挂了电话。而我当时的心情是，虽然我人要离开台湾了，但是心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台湾的观众，所以我没有诀别的难过，只有背起行囊闯天下的期待。

庆祝欢迎会后，我真的拿着黑色小行囊，跟当时卫视中文台台长甘国亮飞到了香港，我这个被甘国亮称为像是台湾嫁过来的女儿，除了自己外，是什么“嫁妆”也没带，“反正香港什么都有得买，旧衣服刚好贡献给众家姊妹们，我乐得到香港采购新装！”我这样对母亲说。

因为当时的香港，对我来说，仍只是每半年会来抢购一次衣物的“购物天堂”。直到我被甘国亮送进了饭店，打开了行李，我才意识到，这次不是来玩 5 天就可以“回家”的了。

香港新生活

卫视体谅我，初到香港是个无壳蜗牛没有栖身之所，所以先安排我住进酒店（饭店）两个星期，以方便我找房子。所以，前两周我仍有些来此度假的错觉。直到在中环半山附近找到了自己的小窝，才在同事帮忙下搬到了新居。但是，我没有“安居”乐业的感觉，反而有要自己一个人在香港自力更生的醒悟。想不到，小时候父母说女儿出嫁前不准离家住的规定，不但被我打破，还离家 500 里，一住住到了隔海的香港。离开了姊妹成群热闹的家，我才知道，原来寂寞这个名词是真有其事。在香港第一个落脚地，美其名说是家，不如说是几面墙，真的是家徒四壁。

屋主是新任业主，没有经验，碰上一个更没经验的租客——我，所以情况是房子刚装修得漂漂亮亮，但是家具，电器一应俱全“无”。

我搬去的第一天，得先买个床垫，不然就得睡地板，虽然是 7 月大热天，但要传到母亲耳里，可不让她心酸难眠才怪。上班第一件事是拖着同事帮忙买床垫，这是我的第一件家具，严格说起来是半件，因为床还在订做中，朋友给我忠告：“先去买个收音机，晚上家里有点声音陪你，不然，电

视，电话都没有，你会害怕！”就这样，当晚我躺在客厅地板的“床垫”上听着收音机里我完全听不懂的广东话，望向窗外些许的夜空，度过我在新居的第一夜。从来不失眠的我，那夜竟然有点 sleep-less in Hong Kong。当时想，在香港繁灯如星的高楼大厦里，一定有不少像我一样寂寞的外地客，有着香港未眠之夜。

因为我的电话还在申请，每晚睡前想和家里通电话都得到楼下 7-Eleven 便利店打 IDD 国际电话。母亲问：“过得好不好？”好强的我当然不会说：“我现在还睡地板呢！”我会说：“好呀！同事对我很好，帮我搬家、买家俱，还有下个星期新节目就上档了！”我当然也不承认每晚打电话，是因为想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想知道家里情况怎么样？”一周后，我的电视装好了，电话也上线了，精心挑选的 sofa bed 沙发床也送到（香港房屋间格小，各种居家设计以体积小多功能著称。像 sofa bed 收起来是沙发，撑开来就是张舒服的床，我还是在香港学到的）。两周后，我特别订制的床也完成（我不喜欢单人床，嫌小，但卧室又摆不下双人床，做不成单身女郎双人床的美梦，只好订做个 2/3 大小的双人床，满足我这个高个子的需求，不至于一翻身就跌下床底。）亲身布置的家开始有点成型，我的 homesick(思乡病)才稍微减轻，因为觉得自己真的是一家之主了。

来到香港给我的冲击，不只是语言、文化上，还有生活环境上。在香港是我独居时代的开始，通过 5 年的磨练，我现在非常享受家中一切都在自己掌握中的感觉。但初来乍到，最不能适应的是居住环境的挤迫和昂贵。第一次从香港回台北的家，母亲疑惑地看着我不断在家中客厅、餐厅走来走去，她心想：“完了，这孩子没在香港学坏，但是怎么傻了？”她大声问，想把我吓醒：“小莉，你在干什么？”“我在量距离。”我说：“妈咪，你知道吗？我香港的家，就只有台北家客厅到餐厅这么大，现在有空间我要多在家里走走。”说完，继续跨我的正步。

说到租金昂贵，我刚到香港时，适逢香港房价高峰期，价格平均是台北的 3 倍。在香港租一间。‘一人居斗室’的费用，在台北可以一家三口住得舒舒服服。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铜罗湾 soGo 百货公司旁的大马路，不论何时都像是台北电影院散场时的人潮一样。一来，香港真是地小人稠；二来，香港居屋小，闲时家里是待不住的，不如一家人逛街饮茶，享用多点公共空间。香港语言文化对我的冲击，表现在我生活上的挫折。

“这里有没有电灯泡，”我问，因家里灯泡坏了。我到杂货店买灯泡，店主是位老先生，我讲英文他不懂，广东话我又不会说（5 年前普通话在香港是一点也不普通，一般市民大部分是“听不明！”），沮丧的我，只好回家拿旧灯泡，才成功换到一个新灯泡（当然是有付钱）。在路上招的士，老见到司机驾车经过我身边不停，心里犯沮丧：“难道，连司机都看出我是外地人，欺生，不肯载我？”等了 20 分钟，终于有个好心的路人：小姐，这里是黄线区，的士不能停车，要到前面的士站去！”虽然不完全明白他的好意，但看他指指黄线，又指指前方，大概猜中他的意思，赶紧道谢往前走，果然看见有人排队等车。从此我爱上香港这种排队文化（在台湾的士是随处可招，没有禁区可言，除了机尝火车站特定地点外也没有的士轮候站）。大家先来后到，这种排队文化，在轮候公厕时也通用（对不起，知道谈论厕所文化极不雅，但这却是香港的一项美德）。

在台湾轮候公厕，是每个厕池门外都自成一列，这不仅造成厕内拥挤，

何时能如厕也要碰运气，因为每列的进展不同。但是香港却是只成一列，所有厕池都在轮候范围，绝对公平，先来先到。这种排队文化已经约定成规，谁不遵守，都会引起公愤。

有次我从广州回香港，到达红勘火车站搭的士准备过海到港岛，前面一位乘客不了解的士排队的顺序，上了第二辆的士，前一部的士司机马上下车，“指教”这位司机同行：“有没有搞错呀！乘客可能刚到香港，不知道行情，你开车多久了，不知道有先来后到的规矩吗？”后排司机知道理亏，嘴里虽然嘟嘟囔囔，但还是尽快把车给开走了。我上了第一部的士，司机一路仍在抱怨：“不守规矩！”我绝对支持这种据理力争。因为一个日常生活的排队习惯也反映出香港社会一切公平竞争的珍贵文化，这和台湾甚至大陆讲究人情世故可能有所不同，但却值得维护和珍惜。

如果问我刚到香港时有没有闹过笑话或是觉得委屈？我会说，“有！当然有！”初时，我常听人说：“唔该！”（广东话就是不好意思，或是谢谢你的意思；）心想，“嗯！这个词好用，赶快学起来”。例如别人帮你拿东西，你可以说句“唔该！”就是谢谢的意思，如果你想请别人让路，你也可以说：“唔该，唔该！”就好像英文的“Excuse me！（不好意思，借过！）”有一次，我不小心踩了人，我顺口一说：“唔该！唔该！”心里想表达的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但却给人白了一眼，朋友听了我的故事大笑：“你这样说，好像是唔该！谢谢你让我踩，换了是我，也会给你白眼，没有骂你就不错！”到后来我终于分清楚，踩了人要说：“唔（不）好意思！”收人礼物，是“多谢！”，接受别人帮忙才是“唔该！”还有一次下大雨，我在非禁区招的士，等了许久终于有一辆空车停下，这时，一个大胖子冲进车里，司机忍不住说：“先生，小姐先的啦！”大胖子：“不要罗嗦！快点开车！司机只好开车，把我委屈地留在路边，我心想：“这是什么地方呀！怎么人这么不讲理！”那时刚在香港定居不到一个月，属心灵最脆弱期，连搭车都遭打击，朋友安慰说：“香港是这样的，生活压力大，大家都没有耐心，但是这样没礼貌的人绝对是少数！”曾经出现过这样荒谬的镜头，我和一群香港朋友吃饭，一桌子中国人却只能说英文，我和香港朋友都有些感慨，我难过的是还不能入境问俗，不会说广东话。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香港朋友，则自我调侃：“香港现在是中英文都不好，每个人都会些英文，但是到国外和外国人比较说英文，却仍是‘外文’，说自己是中国人，中文又很杂，普通话也说不好！”当场我们一群人立定志向，下次大家聚会不再用“外文”，我说广东话，他们说普通话。那是5年前的事，至于成效，似乎“麻麻地”（广东话不怎么样的意思！）但是至少，一群香港同事开会时，不必要为我说普通话。特区政府成立后，特首董建华解释首份施政报告的电视论坛，财政司长曾荫权的财政预算案电视问答会，我也可以即席将广东话口译成中文，好为凤凰卫视说普通话的观众服务。

我坐上计程车和司机做少量聊天，他开始有些难以察觉，我到底是不是本地人？当然说多了，还是会泄底。

不知是不是习惯了香港的生活，还是自己也开始“香港化”，总之，我再没有遇到让自己觉得委屈的恶霸。进了电梯我也像所有香港人一样，会按一下关门键，让电梯快点移动。一位英国来的朋友笑我：“只有住在香港的人才这么着急，所有电梯设计都是会自动关门的，你不需要急着按键帮它关门！”我也开始为香港人的急速作风辩护，“没办法，香港所有交通工具都

有班次的，坐船有时间表，搭不上这班巴士，下一班又要排队等待。这班火车没赶上，就是迟 20 分钟，香港人的生活有大多的 dead line，时间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有了假期，香港年轻一代一定想法子离开这弹丸之地到外地度假。香港回归后，北上中国内地，也成了香港人扩展生活的另一片空间。

到了香港半年，我对香港的感情才终于又是“见山是山，见水又是水了！”

第六章、第一次在亚洲卫星频道亮相

“卫视”展新姿

“亚洲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小莉……”1993 年 7 月中，我第一次在亚洲的卫星频道亮相，台湾媒体朋友最大的反应是，怎么造型全变了？香港上班的第一天，编导看到我第一句话不是说节目内容而是：“小莉，我下午约好发型) 师先带你剪头发。于是我从半长直发变成新潮的“羽毛剪”，第二步是约好造型师，逛街买衣服“我希望你从头到尾的造型都不同！”编导 Candy 说。

candy 是我初到香港时的战友，不知是不是公司的好意特地派了个女编导，可以兼作保姆。

8 月份香港台风打八号风球，我住在山上，18 楼 C 座楼又高，屋外飒飒风声煞是吓人。Candy 怕我在香港第一次遇到打风一个人不敢睡，特别住在我家陪我，并成了客厅沙发床的第一位客人。工作之余，因担心我闷，Candy 把她读书时一群好友介绍给我，我从此学会打壁球。刚来香港时，台湾的朋友问，“香港的步伐这么快，有没有适应不良？”“没有！”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与我过去每天和时间赛跑的新闻工作相比，每周一次的深度报道，使我有机会放慢步伐，思考更多问题。而我也终于摆脱听到传呼机响，就神经紧张的日子！”一篇当时台湾的报道，提醒了我几乎已经遗忘的当年情怀：“从华视到卫视，她一直关心自己的土地，吴小莉，以国际观眺望台湾财经。”（摘自台湾《电视周刊》）“八月三号吴小莉为了‘台湾财经经眺望’节目，回到台湾采访，也顺便向关心她的朋友说明在香港的适应情形。”“因‘羽毛剪’的新发型而有另一番气象的吴小莉，一出现在作华视记者时的‘老地盘’——交通部，引来一阵惊艳的欢迎声。以卫视主持人的新身份，第一次回来采访，她一面忙不迭地递出新名片，一面和老友寒暄，同时报告近况。

回到熟悉的环境中，原就开朗活泼的吴小莉，更像只快乐的小鸟，叽叽喳喳他说个没完，在香港兼作吴小莉同事与‘保姆’的编导，都说小莉回台北之后活跃多了。”“问她异地的新生活是否习惯？原本皮肤不错的吴小莉，顽皮地指着满脸青春痘说：‘除了水土不服，一切都很好。’到香港的一个月，她不但立即投入工作，也忙着打点新居，希望能尽快安定下来，根本无暇休闲。‘我不但还没有享受到 Shopping 乐趣，连香港最著名的美食都没吃到，每天都吃公司订的外卖。’吴小莉遗憾他说。”“个性独立、适应力强的吴小莉，与中文台的同事相处得极为融洽，‘大家都会说普通话，没有语言的障碍，’由于和工作人员年龄相近，彼此间的沟通更是好得没话说。最

叫吴小莉佩服之处是，香港仔工作态度的认真与严谨；光是为了她个人化妆造型，专业的造型师推开其它的工作，全程跟完节目，与台湾的造型师赶场轧期大异其趣。”“最叫幕前工作者伤脑筋的服装问题，人生地不熟的吴小莉又如何解决呢，‘向公司申请置装费、自己上街打点！’和以前作华视主播时，有厂商会主动提供相比，会不会较麻烦？吴小莉促狭的说：‘怎么会？以前虽然不用为每天亮相的服装搭配伤脑筋，但总是人家的嘛！现在，买回来就是自己的啦！’一方面要靠自己费神打理，一方面又有‘军师’提供意见，小莉对自己的造型愈来愈有心得：‘不同于以往偏向柔性的女性化装扮，现在比较强调理性、干练的专业造型。’”“曾在华视打了四年新闻战，吴小莉颇为满意现在的工作，因为排除了每天漏新闻的压力，比以往有更大的空间作整体的深度报道。吴小莉不讳言，过去身为第一线的采访记者，为了每天有‘新闻’，难免失之于微观；而现在，每星期播出一次的‘台湾财经眺望’，使她有更为充裕的时间，针对重大的新闻焦点，以就事论事的宏观角度来作深度报道。同时，亲身参与幕后的企划工作，更使得自主性、发挥空间都更为广阔，是相当过瘾的挑战。”从主播到主持，从电视到广播，朝全方位媒体人迈进初到香港，另一个让我感受深刻的是商业运作的快速和不可预测。1993年下半年，澳籍美国人莫多克买下了原是香港富商李嘉诚父子的卫视，一夜之间我们换了老板。

一年不到，原在我身边的两位亲密战友，为谋更大发展决定辞职，其中一位告诉我：“小莉，如果你在一个公司待了两年没有升职，加薪幅度不满意，就该考虑走！”两年一个循环，把离职原因“数字化”，这都超乎我的想象。记得我离开台湾电视圈时，一些资深电视人曾讨论过电视人的周期说，在台湾，电视这一行因为步伐太快，从业人员很快有被掏空的感觉。一般是四到五年第一个周期，电视人因为工作的成就感和自身进步等因素，静极思动。如果过了这个周期会安定一段时间，到8至10年，又曾有另一个周期。而我，在第一个周期时就选择离开，提出5年一周期的这位电视人，也终于在她工作15年后，离开那份工作。

在台湾，同事离职会开大型惜别会，因为情况少见，在香港，看到熟悉的同事要走，重感情的我原本有些难过。但后来发现周围的同仁来来去去，即使不在一起工作，仍是朋友，就开始把这种人才横向流动当做是势力的扩散，如果有缘，它曰“风还巢”也时有所见，在香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1994年初，我第二次到上海，第一次和中国内地电视台——新成立的东方电视台合作主持春节晚会。那时卫视初试北上，香港同事正开始学普通话，我反而成为最好的翻译。晚会有3名主持，我是唯一一个代表卫视的“外地人”，但是香港同事看完节目后说：“你怎么比其他人还像当地的‘地头’？”就在我对香港新生活、新工作游刃有余，开始觉得没有什么挑战时，好友Shadow问我：“有没有兴趣主持广播？”言文字一直是我喜欢的媒介。就这样，两名女子在香港电台《普通话通天下》节目中聊起了女儿心。我们自制一个访问各行各业明星人物的环节《星星蜜语》。

“看满天的星星好美喔！”“我觉得它们既遥远又孤独，不知道它们在想些什么？”“别出声，听星星正在说话呢！”这是《星星蜜语》环节的片头语。广播看不到面部表情，完全要靠声音情感来拓展想象空间，而我爱极了这个开场白。

像两个年幼的女孩，夜晚数着星星，有梦、有理想，这的确是我和

Shadow 两人夜里促膝长谈的即席创作。虽然不是小女孩，所幸，我们仍然有梦。

用普通话在空中和香港的朋友聊天，对我来说很不可思议。放下电视主持精准的语言内容和文稿，收起电视中一板一眼专业化的声音，放纵自己语音里原有的温柔，用很生活化的方法和听众聊天，接听听众的 Call in 电话。这种互动虽然看不到，却更直接且更有想象空间。

“今天的话题是搭的士，你有什么经验要告诉空中的朋友？”“你是中五学生呀！普通话说得不错啊！”没有荧幕的隔阂，反而觉得离听众很近。一位听众知道我们这几位主持都是孤家寡人，单身在外，特别送些吃的补品来；有的听众知道我在香港水土不服长痘子，就送些自己工厂的保养品、护肤品样品给我试用。难怪，大众传播学里说电视是冷媒体，广播是热媒体。每周两晚，我一定乐意到港台报到。

电台虽然没有电视的强力，但是那种做回自己，To be adreamer in the air 的魅力，相信做过广播的人都会明白。

“电脑号快车”开到新西兰“小莉，一个澳洲制作人，想找位说国语的主持人做电脑节目。我觉得你挺适合，就把你的电话给她了！”朋友来电留言。

没多久，Heather 这位澳洲监制果然和我联络。

Heather 说一个英文版叫 Big Byte。专谈电脑运用新发展的节目要做中文版，所以她专程从澳洲飞到香港，找中文主持人，但是找了两个星期，仍没有适合人选，希望和我见见面！在面谈试镜后，Heather 非常高兴问我接拍的意愿，我说必须和公司商量。Heather 听说我所在的公司是卫视，笑着道：“中文版 Big Biye 首先就是在卫视播放，绕了一圈，我满意的主持人原来就在卫视，我去说！”就这样，我接下了另一个节目《电脑号快车》，开始我如空中飞人般的生活。

4 个月内飞 6 次新西兰（纽西兰），期间 10 天在炎夏的香港，10 天在寒冬新西兰渡过，4 个月，真是“居无定所”。香港的小窝更是一半冬衣，一半是夏衣，大大的行李箱不曾真正收起来过。那时最熟悉的香港公共场所大概就是启德机场，比如机场邮局在什么地方，要补充忘了带出门的旅行用品怎么办，哪一个机场餐厅最美味？我都如数家珍，现在启德机场已经拆迁，我这个老顾客怀旧的程度可能不比空中服务员差！

每次单程十几个小时的飞行，虽然辛苦，却也拓展我的视野。到了南半球的另一端，新西兰人骄傲地说：“新西兰是人类到达南极前，陆地的最后一站。”而我搭飞机也搭出心得。由于旅程长，我选择傍晚起飞的航班，看着艳霞下的香港，由深黄转为淡橘，凌驾在白云之上，心中常会响起电影《日瓦哥医生》的主题曲，想象日瓦哥在严冬的俄罗斯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看见窗外辽阔天地，白雪皑皑“飘雪了”，一个再自然不过的自然景观，也能令这位诗人般的主角，由心底绽放笑容。这一幕常记我心，让我感动，这就是童心，就是诗心，我贴身向窗外，在夕阳柔和的照射下，欣赏如白云。如山峦的云朵，我的心一样恬然。

飞行中，是我少数能静下心来思考的时刻。人是需要静下心的，所以那 4 个月的忙碌只在形体，不在心里。旅程的空当，我阅读近 10 本书、10 部空中电影（长途飞行都会放一些刚下档的电影院线片），弥补我近半年没有时间进戏院的遗憾。

我深信磁场说，人是需要转换磁场的，我又酷爱旅游，喜欢了解陌生的地方，这种南北磁场转换，既有机会读万卷书（虽然只有 10 本）又有行万里路的充实，加上新西兰清新的空气，美味的羊乳和冰淇淋，那时成了我工作以来身心最“健康”的时期（这种健康，是可以“具象”的，因为体形最圆，心情最恬静）。

不信，有图为证。一张台湾杂志帮我拍的黑白照，忠实反应我当时的心情。背着一个小皮包走天涯，回眸的一笑，是现在的我可能再也捕捉不到的神韵。但是我知道它真实存在过，因为我正在香港这个国际化的窗口，实现我走向世界的梦想。

当时台湾媒体，对我的专访，或许也应证了我那时的生活状况。

国际性资讯节目制作人，看上她的知性气质，向卫视台借将——【记者粘嫦钰 / 台北报道章从台湾飞入香港卫视刚满一年的吴小莉，日前又接下一个国际性节目“电脑号快车”的主持工作，这是一个在纽、澳实地拍摄的资讯性节目，目前已预销到英美等地，吴小莉的东方特质在这个节目中凸显无遗。

澳洲电视台制作人是看了吴小莉在卫视主持“经济传真”，认为她的知性气质很适合“电脑号快车”，才向卫视台借将，卫视一直以吴小莉忙不过来为由，为她婉拒这项邀约，没想到对方坚持非要吴小莉不可，只好让她成为空中飞人，南北半球跑个不停。

这几个月来两地的长途飞行固然累人，但录影的顺利和国际性内容走向，对吴小莉而言，是全新的尝试，她说：“以前做记者，现在主持节目，而且服务范围愈来愈广，这种感觉很不一样，可以这样说吧，用奔波苦换取成就感，很值得。”吴小莉私下透露，她只身在外，像只流浪的鸟儿，难免会有倦勤，但辛苦付出，渐渐地得到回报，她相信只要有企图心，台湾电视人的国际脚步，将会一步步更踏实。（摘自）“搭人“电脑号快车”南北半球两地跑 吴小莉忙着工作浑身是劲”记者王介中 / 专访卫视中文台主持人吴小莉最近成了名副其实的空中飞人，不但往来台湾，香港和大陆制作她的“经济传真”节目，每隔两个星期还要远赴纽西兰录“电脑号快车”，问她对风光明媚的纽西兰印象如何，她说：“很安静，感觉上绵羊比人还多”。

“电脑号快车”是由电脑公司 Intel 赞助，卫视和澳洲电视制作公司合作的科技节目，分别拍了中、英文版本，吴小莉就是担任中文版的主持人，说是主持人，却有点演员的性质，吴小莉说，为了节目生动有趣，让“妇孺皆懂”，她尝试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一会儿成了写恐怖小说的小说家，一会儿又是一个不爱干净的小女孩，在打电脑时将电脑弄得乱七八糟，一会儿又穿着睡衣，抱着小猪存钱筒做噩梦”。吴小莉说，这些经验让她体会到当演员的辛苦，也模模糊糊了解到什么叫做“戏瘾”。

“Quiet, now, we are recording.” Lisa, 新西兰电视台所属艾佛隆摄影场，也是南半球最大摄影厂的 FI00r, Manager 现导播。录影时，主控室里导播权力最大，但在录影室内，Lisa 最大。每次在她宏量嗓音大喊一声：“安静，我们要录影了！”全场十几二十人全部肃静，而我每次都要忍住爆笑，镇定地等候 Lisa 手势，然后开始：“欢迎收看电脑号快车，今天我们要进入虚拟实境的奥妙世界，还要了解新加坡怎么用电脑改变了小学生的生活……”和来自澳洲、新西兰、意大利的制作小组合作，有极新鲜的感受。大家沟通用英文，主持用中文，语音频道得转得快。制作小组专业分工细，

打灯的绝不去动摄像机。

由于并非单纯主持，我当中还要情境扮演：一会是 80 岁老太婆；一会在陆上学踩滑板；一会把电脑全拆光，学做电脑专家。所以道具组、化妆、造型、服装都得专人盯场，节目赞助商英特尔（Intel）公司的专家更是全场 standby 待命，务必把我“速成”为电脑 Master（电脑专家）。

由于英文版主持人来自澳洲，因地缘之便早就开拍。

为了赶上英文版的进度，我是早上 7 点多出门，9 点完成化妆，一直录影到傍晚六、七点钟。期间，只要把我喂饱，我就乖乖听从吩咐，任劳任怨。意大利制作人 GP，惊讶于一个中国女孩单枪匹马，拎着个大行李，自己跨越半个地球到新西兰的独立。我则笑他还停留在中国女子“裹着小脚，在家相夫教子的年代。”不过，说实话，我是十分合作的，除了吃腻了飞机餐，到了新西兰，我会嚷着要“Chicken corn soup”（鸡蓉玉米汤）；录影太累，我会问“哪里可以找到中国按摩师？”外，一切是入乡问俗。因为我一直抱持着从台湾到香港，千万别丢台湾人脸，现在与国际制作组合作，更别丢中国人面子的信念。所以，我和制作小组合作愉快，GP 更是疼我如女儿。

节目中有主持人骑哈雷摩托车说故事的桥段（情节）。我皮衣、皮裤，打扮帅气地往哈雷上坐。GP 看出我男孩个性和对哈雷的兴致，午餐休息，他坚持叫摩托车的主人载我逛逛惠灵顿（艾佛隆摄影厂在新西兰首府惠灵顿），冬天的惠灵顿别有一番景致，那里蓝天白云，污染少，天离你很近，星星似乎也特别大，就像唾手可得。静谧的空气，暖暖的冬阳，我想新西兰会是个退休度假的好地方。

只有工作，没有休闲，这绝不是老外的生活原则。GP 加快录影进度，为的是让我能够好好看看新西兰，GP 需要做节目后期，他就用心良苦地介绍了一位年龄和我相仿的澳洲女孩给我认识。也给我们弄来一部车，一些钱，GP 说：“放心，新西兰很安全！”两个女孩就翻山越岭，开了一整天车到了惠灵顿南方的一个农村，在那里“Farmstay”学过一天农村生活。那是一个专门给我们这种都市乡巴佬住的度假屋，里面一应俱全，还准备了晚餐材料，可以自己下厨，度假屋之大，足够一家四口共祝两个女孩霸占四张床，我们煮好晚餐，围炉畅谈，谈到夜深入静，屋外虫声鸣，两人异口同声说：“以后结婚生子，再到此一游。”这才满意入睡。

第二天，不是被中国农村印象中的鸡鸣吵醒，而是被“咩咩……”绵羊的叫声闹醒。一时我忘了身是客，拨开窗帘一看，小羊正在阳光下吃草，“好个新西兰！”

“我心想。“这些羊为什么能在这么陡的山坡上吃草？”问。

“Because they have special shoes！”（因为它们有特殊的鞋）GP 答。全车人笑得乐不可支，这一天又是一次开工完毕，趁回香港前，一伙人要去沙滩骑马。虽然我从小爱马，小时眷村旁就有个骑马场，但那时年纪大小，只能喂马吃青草。现在一听要让马在沙滩上临海风而跑，哇，岂不酷毙了。但别高兴，GP 说第一次骑马要有万全准备，每个人得在臀部涂上薄荷油，并且穿上厚裤子，免得磨得臀部犯疼。

将马牵出栅栏，沿着马路，骑向沙滩，教练说：“You must be boss Let him know you are boss！”原来马会欺生，知道你不识马性，它就索性停下来沿路吃草。所以你一定要果断地牵住马头，轻踢马肚，让它知道，得听你的。

我努力装得很强壮，但是我的马还是低头吃了几次草。终于到海边，沙滩上一对白马快跑而过，我爱透了马跑起来的英姿。不过，如果是自己坐在马上，可就另当别论。教练说：“试试‘小跑步’踢马肚！”我的马就在左右同伴小跑步的怂恿下也跑了起来。初时，我心中挺乐：“我终于也骑马快跑啦！”们是当马儿愈跑愈快时，我就开始心慌了，似乎马鞍也坐不稳，脚也夹不准，在差点要翻下马背前，我赶紧故作镇定他说：“Enough!Enough!”够了够了，赶快停下来，为了不让自己的“处女秀”太难看。尽管臀部已经隐隐作疼，我还是坚持把马儿骑回家，只是，我到现在还怀疑：“如果当时不及时喊停，我到底会不会从马上摔下来？”新西兰和澳洲一样是户外活动的天堂，高空弹跳、空中跳伞驾驶滑翔机，对于这些空中活动，除了高空弹跳外，我都兴致勃勃。

GP 和我在完成路上小型赛车（当地称为 Gofd car）的比赛后，又让我在驾驶员陪同下，尝试驾驶无动力滑翔机。

在此我要特别声明，是我坐前座，驾驶员在后座。当小飞机把我们带起后，就抛开绳索让滑翔机顺风飞行，这时驾驶员是放手让我操作的，也就是我可以在空中自由选择飞行的方向。“滑翔机可以飞多远？”问。

驾驶员说：“如果顺风，可以一路开滑翔机回到亚洲，你可以省下机票钱！”嘻嘻！我笑笑心里想：“我不认真，你也千万别认真，我还是搭飞机比开飞机回香港好。”黄昏中的惠灵顿非常美丽尤其在滑翔机上从“半高”的空中鸟瞰，我告诉自己，将来我还会再回来。

安全降落当然是驾驶员的操作，我还获得一份，‘开过滑翔机’的证书，至今安然保存。“不过我真的有引导飞机方向吗，还是顺风而行而已？”我仍弄不清。

“冬天到新西兰，不滑雪算白来了。”艾佛隆摄影场负责人说。

“明天去吧！反正第一季 26 集全录完了，Sa11v（我的英文名）如果不小心摔了腿，也不怕不连戏！”GP 开玩笑说。

“好狠！”我虽然反驳，但第二天清晨仍兴高采烈地四点钟起床，和场长一家人开 4 个钟头车到惠灵顿附近著名滑雪胜地法高帕帕。

到了山顶，我报名上初学班，跟着教练在最平稳坡地上练下滑、刹车、爬坡上山。体力不佳的我，一下于就投降，讹称要去看看朋友滑雪而半途溜课。场长儿子杰瑞米技术一流，看着他从高坡喇地一声不见踪影，心里好生羡慕。本来我打算回头找教练重头来过，但是发现待在山上一上午，已经听到 4 次救护车声响，杰瑞米说：“有三个人摔断腿！”我决定还是坐在一旁，晒晒太阳——对别人的技术纯欣赏就好！这就是我的新西兰之行，名副其实的工作娱乐兼顾。

所以我在填写新西兰入境表“目的栏”时，不知何时开始已经自动从 business 改为 business and pleasure（公干兼休闲）。

《电脑号快车》的录影工作全部杀青，新西兰电视台邀请当地政府官员和卫视高层举行祝捷会。中英文版主持人都出席。我在致词时，对着那群一起工作 4 个月的伙伴给予最大的肯定。

我说：“记得，我每完成一段录影，喇地一声一群人便一拥而上，拆道具的拆道具，摆放电脑台的摆放台子，调校灯光也同步进行，等到一切就绪，我往巨大无比的摄影场里一站，三机一动，又是一段故事的完成，”我把《电脑号快车》26 集都留了一份拷贝。这不是因为我在故事里，而是因为有一

群专业而敬业的人，曾经以电脑的科技，结合电视的创意，制作出如此浅显易懂，却又提供最尖端先进知识的节目。（据说，这个节目，目前还在内地一些电视台陆续播放着）“Quiet, now we are recording”，Lisa 嘹亮的声音仿佛仍在身边，电脑号快车又在我心中慢慢驶过。

年轻的经理

“吴小莉迎向事业新丰年”

“卫视中文台主持人吴小莉最近回台过新年，人逢喜事精神爽，升级当‘经理’的她频频受称赞‘变年轻、漂亮了’。

“年纪轻轻就当上卫视掌管经济节目的经理，工作的顺遂令她不少朋友羡慕。

吴小莉说，其实她花了两星期考虑该不该接这个职务，她犹豫的态度让亲友觉得不可思议。”“吴小莉解释，她最害怕处理公事文件，过去当记者、主持人都是制作实务，要她坐在办公桌，专心开会、看文件，对她而言是件头疼事。别人庆贺她高升她却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接受考验。”（摘自台湾《联合晚报》1995年1月1日）这是1995年元月1日，我升任卫视中文台财经节目经理当天，台湾《联合晚报》的一份报导，现在看来，仍可在某种程度表达我那时的心理状态，我对“升官”的兴致的确没有“做个好节目”这个诱惑大，但当时卫视高层说：“Sall，人你有没有想过，1996年的你想做什么？10年后的你又是什么模样？”一位朋友说许多人在工作上会遇到老师，英文叫Mentor，我想这位高层就是one of mentors。在他的提携和指导下，我开始学习走媒体管理这条路。

1995年8月，我刚在台湾日月潭忙完和《中国时报》合作一个名为（水沙连，中秋节特别节目）的主持工作，回到香港。刚回到香江的小窝，就接到当时中文台台长甘国亮的电话，询问我暂调回台湾，建立台湾中文台的意愿。那时我到香港已两年，生活起居早已适应，趁工作之便回台湾的机会也不少，思乡已不为苦，也不是我决定工作去向的主因。倒是回台湾筹建台湾中文台整个制作组这份挑战，却让我明知“前路苦，却向前路行”。

当时，卫视筹划在1996年3月，让一个本土化的中文台在台湾重新登常4月底，台湾以外的凤凰卫视启播，正式实行分途广播。筹组台湾中文台制作组，必须既了解台湾，又明白香港卫视运作。已经是财经节目经理的我，就顺理成章被视为调任为台湾制作部经理的最佳人眩八月底，我打电话告诉妈咪：“我要回台湾了……”我回家，是母亲嘴里不说，但是心里最为高兴的事，不过在台湾做制作经理的10个月，从媒体人到管理人，却是我职业生涯中极为辛劳，也收获极多的媒体管理经验。

“吴小莉升官返台成为卫视中文台制作经理，从香港调回台湾。”“吴小莉升官了！她已从香港卫视中文台的财经节目经理调升制作经理，并回到台湾上班，昨天是她上班的第一天，神采奕奕的她表示，未来将以节目本土化及自制节目为主要发展重点。”“两年前，吴小莉从一位不会讲广东话到现在成为卫视中文台驻台主管，她说，这段过程很艰辛，未来，也可能会因任务的关系再调到其他地方去，但在台湾至少会待上三个月以（摘自1995年8月31日台湾《联合报》）“吴小莉：这回赌对了！”

转赴卫视发展成就蒸蒸日上”“由于卫视对台湾的部分愈来愈重视，离台二年的吴小莉回来了！担任卫视中文台首位的驻台节目制作经理。对于台湾三台第一个新闻主播转赴卫星电视发展的吴小莉来说，她总算认为自己这回赌对了。”（摘自1995年8月31日台湾《自由时报》）“荣升中文台台湾地区节目最高负责人吴小莉“卫’来一片光明”“吴小莉‘回娘家’了，昨天一下飞机就直接到卫视中文台在台分公司领取新名片，职称栏上印着‘制作经理’，这代表着她是卫视中文台在台湾地区节目最高负责人，新工作有新的挑战。”（摘自1995年8月31日台湾《民生报》）在媒体的报道下，衣锦还乡的我面对的却是一个极为竞争的台湾有线电视环境，近100个频道，手下由10个制作人员扩充到20多人的制作小组，但节目的量，却是从每周两次的《妙论大卖撤到《今日看台湾》和《今夜看台湾》两个每周5天的带状节目，和稍后筹备的《三人温暖》，每天的名人访谈。

1996年3月适逢台湾领导人大选，本土化的台湾台当然不能漏掉这场重头戏。

为了拿捏尺度，卫视高层最放心的仍是由我担纲主持。我们推出10集特别节目，除了专访林洋港、陈履安、彭明敏几位候选人，还制作4集候选人个人特辑，另外6集邀请赵少康、周玉寇等名嘴一起舌战各候选人或其幕僚团。

就这样，我既要兼顾原有的幕前工作，又要向香港总部争取支援，还要安抚手下，带领20多位小朋友打战，筹备新节目。

有次到香港开完会后，我心情疲惫，异常沮丧，最后在坐上飞机一个多小时回台北的航程中，我谢绝空中小姐的任何服务，只静静地望着夜空，然后拿出笔记本，振笔疾书，我快速写下回到办公室要做的事，要交待小朋友办的事，制作组的问题和可能解决的方法。我又运用了初中时，面对挫折的方法——静思，找出解决和改善现况的步骤；然后“Find the way out”。知道自己仍有出路后，我心中豁然开朗，暂时放下心中所有牵挂，我又可以好山好水，享受一下我的空中旅程。

“小莉，你回台湾作名人，参加公关活动的时间都不够，哪有时间陪我们聊天！”一位我手下的小朋友埋怨说。

这群20多岁的新新人类，是台湾新生代，既能干却又最多情绪的一群，做主管就不只要带他们工作，还得管理他们的情绪，才能使工作有效地进行。

而她的埋怨也不无道理，我难得被调回台湾，经理兼主持人的身分，使我成为公司里面对记者媒体回答节目内容、未来大计和参加对外活动的最好公关，加上演讲和媒体采访不断，小朋友有情绪问题得抢空当和我聊聊。

有次台湾生产力中心邀请我为中小企业主谈谈：“新新人类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因为这些企业不是消费者是新新人类，就是员工是新人类，这都让这群上一代伤了脑筋。这场演讲，让我有机会把我这个新人类和这群新新人类下属之间合作的经验溶入了这场讲座。

这场演讲的一开始，我提到以年龄分界，1960年到1970年间出生的新人类，和1970年以后出世，现在在社会第一线工作的新新人类（新新人类是台湾对新生世代的通称，这些在绝对安逸环境下出生长大的一群，自成为一种文化和价值观体系。）在许多观念上已有不同，但我和新新人类们则是既能相通又有不同。

在我领导的这群新新人类中，我明显看到这一代中国孩子，对自己的

未来，成功的目标和要求有明确的设定，生涯规划可能比我们这一代还早，同时给自己寻求成功的期限更短，所以也更没耐性。不是希望人生惬意，能够“事少、钱多，离家近，老婆漂亮，孩子乖”，就是力争向上，谁也不服谁。带领这群新人类，是既要维持他们彼此的适度良性竞争，又要保持工作环境的和谐。这是在我做好节目向市场竞争“攘外”的同时，还要学习。“安内”，的另一项课题。这也是我在接任行政主管时，没有预料的。当时我觉得不胜其烦，现在想来，这种经验也未尝不是人生的另一项收获。

制作经理这个媒体管理人的角色，也使我跳脱单纯的主持人地位而退居第二线，以媒体宏观的角度去观察和审视我置身的电子媒体。

台湾的媒体大战

“今年的毕业班有多少人？”“18个”“好，我全要了，一毕业就到九仓来上班！”这里是香港观塘唯一一所训练摄影师的学校，说话的是香港九仓有线电视新闻部的总监，时间在1993年我刚到香港的那一年，香港第一家有线电视成立，打破了香港长久以来TVB（无线）、ATV（亚视）两家无线电视台在当地垄断的局面，提供了STAR TV（卫星电视公司）以外，另一种电视频道的选择。

香港的律法严谨，Cable TV的设立必须经严格审核，原本第一家cable由包括李嘉诚、九仓包玉刚家族等几个财团共同集资筹设，但是李嘉诚突然在：1991年宣布，放弃走地面的cable决定上卫星，独资成立了STAR TV，这样一来，Cable还是得接收卫星的节目，几个财团顿时觉得无趣，“不玩了！”结果由九仓集团独资申请，整个延后了香港cable TV开放的时间两年。

香港cable一成立，雄心勃勃地推出六、七个24小时播放的自制频道，又引进外来频道，现在提供香港观众20多个频道，加上当地4个无线频道和STAR TV的4个频道，及其地一些卫星频道，香港观众对电视的选择仍然是少于台湾观众，但是这场由卫星、cable TV点燃的电子媒体大战，在台港两地可是一样炙热。

由于亚太区的经济发展受到全球瞩目，想进入亚太区掌握资讯的传播业就成为一项利器，也是兵家争夺之地。

除了STAR TV、TVBs、CtN以香港为基地，ABN（AsiaBusiness Network）和MTV以新加坡为亚洲总部外，CNN、NBC等国际频道也都进驻亚洲，而且进行亚洲化的工作（例王NBC针对亚洲成立CNBC）。他们的最终目标当然都在中国大陆，但是大陆未开放前，台湾就是华人市场的最佳试点。电子媒体的多样化，不但台湾观众看得眼花缭乱，电子媒体的专业人才，更进行了大搬风。

1993年当我离开华视，进入STAR TV，在电子媒体圈引起不少震荡，因为当时的电视跳槽风，少之又少，现在，三年不到，人才的横向流动已不再是鲜事，香港那种到学校去“包”人才的情况，更是一点也不夸张。这个情形在台湾亦然，有朋友笑着说：“现在台湾大专、广电科系的毕业生，不是怕找不到工作，而是不知道投效到哪个‘头家’（老板）比较好！”尤其在过去一年各行各业不景气声中，电子媒体却维持高度发展，从业人员成了高薪行业，而这样的远景，预估还可以维持两三年。

单是今年，市场上至少还会新成立或引进5个新频道，但是各频道的

“抢人风”，也造成了这个市场 personnel 人事的混乱，拉抬行情的结果，造成一些“低手高报”，资历不足者，担任超过他能力的 title 和工作，这种情形，容易造成两个结果，一个是降低了节目品质，一个是将高手的行情再往上抬，增加更多制作成本、或是浮动的人事，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是，这是在这个行业景气时的荣景，一旦繁华过尽，我担心的是，太多被快速三级跳的人才，会面临高不成低不就的窘境。

以上这段文字是 1996 年初台湾女性杂志以《台北、香港吴小莉的双成记》为栏目，向我邀的稿。当时我就身处的工作环境有感而发，时至今日，港台的媒体环境早有新变化，香港有线电视频道的增加和开放不再有独家权，CNBC 已经与 ABN 合并，sSTAR sports 和 ESPN 的结盟，TVB 推出泛亚洲广播中文卫星频道……，这就是电视媒体，一个永远在变化、无可预料的行业。

一场媒体管理工作，让我置身媒体大战中，使我有更深的领悟和实战经验，过往被我认为琐碎枯燥的行政上作，更让我有机会学习管理自己的生活，学习管理人，并且学习对上、和顶头上司，对下、和员工，各个不同世代甚至不同国籍（卫视高层多为老外）的人沟通，这或许不是我大学时学的“大众传播”，但却是社会大学中很重要的“小众传播”原理。

第七章、“凤凰”起飞

再回香港

1996 年 3 月 31 日凤凰卫视正式启播。除台湾外，原卫视中文台涵盖范围都纳入凤凰旗下。凤凰卫视和台湾卫视中文台正式分途广播。4 月中，公司高层想：“小莉完成台湾台开播的阶段性任务，是不是该回香港了？”所以，甘国亮从香港打电话到台北，“小莉，台湾台已经顺利成立，凤凰台也开播了，有没有兴趣回香港来？”我又面临抉择，“是留在台湾做制作经理？还是再赴香江完成我未完的梦？”我问自己：“当初想看九七，想做更多节目给更多中国人看的理想是否还在？”答案是肯定的。

为了向总部汇报台湾制作部情况，我出差香港，和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也是我现在直属上司王纪言（因为王台长曾为中国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所以我们都尊称他为院长）会面。院长是标准北方大汉，一见面就率直他说：“赶快回来吧！凤凰卫视开播，好些人说怎么就看不到过去卫视一些优秀的主持人？”就这样，我决定再度告别爹娘，负笈香港。而这个决定，又开启我传播生涯中另一个辉煌阶段。因为在台北制作部我手中仍有 3 个节目在制作中，《名人三温暖》企划案也在酝酿，制作部不能一日无人接替行政工作，我必须进行交接。

同样是 7 月，我又在卫视台北同仁的借别会后再赴香港，只是这回不再是人生地不熟。有经验的我在香港岛找了一间家俱俱全的小套房，省却我重新安顿的时间和再睡地板的危机。再回香港，公司有了很多转变，套句凤凰卫视行政总裁刘长乐在第一次凤凰节目研讨会和经理级同仁开会时所说

的：“很多人可能注意到，过去几个月，有一些高个子在八楼走来走去，其中以一个大个子为首，几个月来，大家的衬衫牌子变了，领带也不同了……”这是个很形象的描绘。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像我一样说普通话的人愈来愈多，原本公司会议由广为采用的广东话、英文，现已成为普通话的天下。国语人的语言和思考逻辑较为相似，所以我与同事彼此没有障碍，一位天津同事说：“我父亲有一次路经香港到台湾，他到了香港，觉得像到了外国，进了台湾，觉得像回国似的。”也由于我和香港同事相处已有默契，初期我还兼任京港文化磨合的翻译官。

“凤凰是东西文化合璧，太极中阴阳的融合，内地来的同事要尽快把过去不规范的做法改变，向香港的规范化靠拢……。”刘老板继续说。

在香港，我不是第一次经历改朝换代，尤其在经过行政工作的洗礼后，我明白做媒体打战不但需要有决策的魄力，更要有了解自己和市场的眼光。这次，我隐约感到不同，因为这只金色的凤凰，不但了解自己要主攻的战场，它似乎也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弱势，摆脱犹豫不决的忧虑，它展现风风火火的行动力，使我更乐于投入其中，随凤凰起飞。

专访董建华——追踪候任行政长官的第一天 1996年12月11日，对香港人来说是个别具意义的一天。SAR 香港特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官，经过激烈竞争，这一天就要诞生。凤凰卫视和其它香港媒体一样全程转播。原订我将在棚内做现场直播，前一天，高层突然和我商量，希望我能做到新任特首的专访，于是临危授命。11日我转换任务，到会展中心筹委会投票现常投票过程中，董建华一路领先，等到票数过半，董建华笃定当选后，现场各种小道消息不断：“候任特首会到现场向委员谢票！”

“我四处流窜打探消息，直到会场宣布投票结果，委员都散场了，董建华才出现，并召开了临时记者会。300多位中外媒体架起了层层摄像机和脚架，我们这组机器因为不负担转播责任，加上内外场跑，捕捉和追访委员，所以只抢到最旁边的位置，我站在摄像机旁最前的位置。董建华首先发表当选感言，然后开放媒体发问，现场顿时响起一片抢问声，不过都是以广东话一问一答。我知道董建华中、英文，广东话都很流利，心想，应该为凤凰卫视说普通话的观众服务一下。这时董建华说：“最后两个问题！”我心中一急，提气继续大声提问，我用普通话发问的大嗓门终于吸引到他的注意：“董先生，请您用普通话向亚洲区的观众说明，未来5年您将如何兑现您的承诺，不负今天高票当选的所托？”董建华果然以普通话答问，这也提醒他，香港是个语言多元化的都市，最后他附加一个问题：“Last question, English!”开放一个英文问答的机会。或许是我用普通话发问的关系，我对董建华的提问，当晚也成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中惟一采用的答案。

从会场回到公司，我受到英雄式的欢呼。我不明究竟，同事解释给我听，“整个记者会，就听到你尽责地不断提问的声音，终于轮到你发问时，我们看到电视转播镜头一转就看见你站在第一排，拿着凤凰的麦克风，不急不徐地在问问题，你是惟一一个我们（观众）看得见，到底是谁在发问的媒人！”但任务还未完成，我最想做的是新特首的专访。经过公司的奔波和协调，高层下达指令：“小莉，今晚随董建华到深圳，明天香港特区筹委会开会前，看能不能做到专访。”连夜和一群同事北上，北京摄影队大批人马也赶到深圳会合，同事们连夜想访题，公关经理多多继续和董建华办公室协调，最后敲定第二天清早7点到董建华下榻处会合；再小心地跟随董建华办公室

人员到采访地点等候。因为要避开其他没有约定的媒体，董建华办公室只准许香港4家电视台：无线、亚视、有线和凤凰卫视每家专访15分钟。

和媒体打交道，董建华并非第一次，虽然过往低调，但他知道自己已在舞台焦点下，必须给香港媒体一个交待。经过竞选的劳累和不停的赶路，董建华仍耐心回答每个媒体可能部分重复的问题，除了最后因为赶筹委会开会而稍为心不在焉外，他对媒体要求极尽配合，让每个访问做起来都像“专访”，最后他在幕僚催赶下，不得不离开时，又露出大家现在非常熟悉、表示抱歉的笑脸。

董建华在竞选特首期间，媒体对他身为长子，曾带领家族企业东方海外走过濒临破产危机的经历津津乐道，许多人更寄望有这种坚毅个性的领导人，在香港万一遭遇危难时可同样发挥作用。现在看来，虽然1996年香港经济一片繁荣，但积谷防饥一向是香港的美德，许多人当初的选择，对香港似乎非常重要，只是，这艘满载着数百万人的大船能不能驶过险滩，可能就不只是“坚毅地捱过去”这么简单的手法可以解决的了。

一代名舰沉浮录——中山舰打捞实记

“小莉姊，编导说，你先别回饭店，可不可以直接到京口现场去。”望着我第一天认识，满脸惶恐的助理，既害怕我生气，又担心我不肯就范，没法和编导交待的表情，“走吧！”我说：“不过行李很重！”时间是1997年1月27日，我刚从香港搭机抵达武汉，一下飞机，就被摄影队派来接机的人拦截，直奔中山舰打捞现场——长江边上的京口。

助理嚅嚅地说：“明天中山舰就要举行打出水仪式，下午就得拍东西了！”于是我坐在的士车厢里，就着每20秒钟会震荡一次的高速公路路面，开始化妆，在抵达京口岸边停下车的一刹那，刚好完成我最后一笔唇彩。一个像是当地人的男子打开车门：“你好！”为了不破坏唇形，我以微笑答礼。“他是谁？”我问助理说：“他就是编导张绍刚！”“哦，我以为是京口的交通管制员！”我说。助理大笑：“你别告诉他，他特地来接你的！”之后，我的行李和我分了家，我被直接带上一只木板船，往长江中线驶去。

“这次我们要做一个小时的特辑，但是我们只有今天下午到天黑前的时间可以上船，明天上午的打捞仪式，我们没有转播权，所以不能上船，只能拍些岸边的庆祝活动。”编导交待任务。“有没有一些中山舰打捞的背景资料？”我问。

“有！中山舰已经沉没长江底近60年，去年底开始打捞，打捞船上的弟兄都是四川来的，已经在这儿呆了很久，预计还会在这里过年！”编导急促他说。

“就这样？”我追问。“就这样！”编导说。“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上船问吧！有一点很肯定，这帮四川兄弟在打捞船上都看凤凰卫视，他们都在等你来！”摇摇摆摆地我攀上了工作船。为了打通所有关节，编导和我看法一致：“先搞定总指挥”，一来可以补充我们背景资料的不足；二来方便在打捞船上的一切活动。

“李总，明天中山舰就要出水了，谈谈这次打捞的难度和艰辛？”“泥沙，中山舰在长江底半个多世纪，已布满泥沙，我们又希望完整保留船体，所以要一面除沙，一面扶正船身，一面把它从河中往岸边推移到今天的位置……”

“明天出水的程序如何……”我得意地看着编导，心想：“现在我知道的比你多啦！”如李总指挥所形容，当时的中山舰是被两条打捞船左右两边用缆绳架着，船体只露出右舷的一部分，我在准许媒体游走的工作船上，以中山舰右舷船体为背景，融合编导绍刚和总指挥告知的背景资料，做了段节目。编导仍为一个小时节目的内容而伤脑筋，“得上打捞船！”我们3人（我、两位编导兼摄像）默契地往船上攀。这时公安人员前来阻止，表示非工作人员免进，我赶紧对着远处刚做完访问的总指挥求救，“李总，我们想上打捞船！”李总看了看我挥挥手，示意保安：“让他们上！”我们终于爬上打捞船，有机会记录下中山舰出水前一夜工作人员最后的心情和工作情况。“你们好！”我说。

“吴小姐，欢迎你来！”打捞船上工作人员带着浓浓的四川口音齐声说。“你们现在做什么？”摄像机跟着我在打捞船上好奇地移动。“下水检查！”工作人员说。

“这个潜水衣很特殊喔！”我说。

“对呀！脚上要穿铅鞋才能沉下去，头罩里有对讲机，要上岸时便通知岸上工作人员，我们会用这条管子在潜水衣里充气，他就会浮上来了。”工作人员用四川国语热心地解释。

“下面情况如何！”我试着用对讲机和刚刚对着我们摄像机说“拜拜”要去做最后检查的潜水员对话。“右边有泥沙、水流很急，”潜水员在水底回话。情况似乎不太妙，第二天就要举行出水仪式，船身下40多条绳索，必须齐力拉抬中山舰，如果哪一侧淤泥太多、过重，导致倾斜甚至船身破裂，都将功亏一篑。我赶快把对讲机还给岸上工作人员，双方马上用又快又急的四川话对话，连总指挥也来了！

“人家正着急办正事，别在这儿捣乱了！”我心想。

我们把摄像机带离船边，转移到船上只在旁观看的其他工作人员身上。

“在这里待多久了？”我问。

“三、四个月了！”众人答。

“想不想家？我继续追问。

“想呀！答案一致。

“这里最小的是谁？我问。

“他！众人齐指。

“你几岁？我把麦克风转向众人所指的一个清秀男孩。

“18岁！”“16岁！”他的答案和众人说的不同。

“哦！有人谎报军情！”我开玩笑说。

“你在打捞舰上负责做什么？”我问。

“有没有人因为工作受伤？”我继续刺探军情。

“有！”一个手上仍包着纱布的年轻小伙子，红着脸被同伴推了出来。

“怎么弄伤的？”我问。

“我下水打探情况，河底黑，中山舰斑驳生锈，舰身很利……”他说。

这群四川大汉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和我分享几个月来与长江湍急河水搏斗的故事。这些也全部收录在我们的摄像机中，成为一代名舰沉浮录上集——中山舰打捞前24小时的真实记录。

28日的出水仪式，我们没有转播权，不获准上船。在岸边我们找到了解中山舰当年情况的老人讲述中山舰的故事，他以自己的蓝色手提包，生动

描绘日军炸弹轰炸，舰上官兵死守到最后一刻的情景。（两位编导绍刚和矫捷在做后期时找来日军轰炸的黑白影片，加上近 60 年后的现场访问，情境重演的效果感出乎意料地好。）上不了打捞船，我和矫捷只好在岸边“引诱”船民载我们到河中靠近出水的地方，希望尽量靠近中山舰。

一月的长江边，河风凛冽，我为了这次野外活动任务特别购买的羽绒衣，虽然可以御寒，却挡不了风吹头疼。

坐着小船漂泊近两个小时，把京口两岸和坐着渔船赶来围观的民众拍了一遍，该做的访问和现场口白都说完了，我们决定上岸，这时，政府官员已经离场，现场转播结束，在大批媒体往外撤时，绍刚说：“别人不拍，我们拍出水仪式后的中山舰！”我再度登上打捞船，所谓出水仪式，是把昨日看得到的那节右舷和整个船身再往上拉抬几寸，可以清楚看到中山舰大半个舰底。此时，忙了一上午的四川兄弟们，都松了一口气，他们看到我，异常兴奋，因为出水仪式顺利，我分享着他们的喜悦，也访问他们的心情，我突然玩兴大发：“我可以到中山舰上去吗？”“可以呀！小心点，我扶你过去，”四川弟兄说。

两天的贴身采访已经把这帮弟兄全数收服而不需问总指挥，他们一口答应，一副把我当成自己人的模样。

我坐在中山舰的舰身上，手指着被日军炮弹击中的裂洞，又滔滔不绝说起中山舰的故事。忙完采访，总指挥热情而且坚持要摄影队和大伙一块吃午饭。快过农历春节，弟兄们嚷着要唱歌助兴，我随口唱了几句《过大年》，虽然被编导讥为五音全三音，但四川弟兄可给足了面子，掌声如雷。有时电视工作的成就感不只在于成品的展现，我更满足于过程的付出和回馈，因为我是如此喜欢人，如此乐于亲近没有去过的地方。

两位编导对我颇感内疚，因为一下飞机，连安顿都来不及就让我赶着工作，我却乐于到我从没踏足过的长江边上走一走。严格说起来，两天不到的时间，我们完成一个小时的特别报道。在外援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尽量贴近现常几个月后，我在香港启德机场遇到一位旅客，在认出我后他说：‘我看了你们的中山舰打捞节目，很不错！’我把这段赞美词转到两位编导耳中，3人都颇为得意，因为个中过程的艰辛只有当事人心领神会。现在中山舰已经整体出水，安放在武汉供世人参观。这帮四川打捞船上的弟兄应该已经回到了家，或者又到了大江南北哪个需要他们的地方，继续和自然环境搏斗了吧！

愈来愈近的京港关系

和绍刚、矫捷的合作还没结束。

忙完中山舰打捞，原班人马便搭机北上趁香港特区筹委会在北京开会，对一些重要人士进行专访，香港回归的脚步是愈来愈近了。

筹委会为了庆祝即将功成身退和农历新年，由中国副总理也是筹委会主任委员的钱其琛具名邀请所有筹委同贺新春。在凤凰公关部的运筹帷幄下，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邀请我和筹委之一的胡经昌担任晚会主持人。

不在预料中的临时任务，一伙人乱了手脚，因为我没带礼服。一月天，在北京大街小巷找礼服，我个子不矮，属欧美骨架，这可难煞了我这些北京同事，虽然他们是“当地人”。好不容易找到黑色一件式无袖礼服，剪裁简

单，4个人（公关部经理多多、编导绍刚、矫捷和我）都满意。

这场晚会，除了有北京艺术界人士表演外，筹委们也发挥香港人能工作也能玩的本事，委员们拉小提琴，玩桌上猜谜。大合唱时，在我们两位主持人起哄下，鲁平、周南、董建华全给请上台，一起高吟《明天会更好》。董建华夫人伙同女委员合唱一首《甜蜜蜜》，这更是董太成为候任香港第一夫人后，首次公开献唱。

台上玩得不亦乐乎，台下绍刚、矫捷四处穿梭，也忙得不可开交。就这样，我们又完成一个半小时新春特别节目《特区筹委贺新春》和四个人物专访。

从此，我们4人“自称”是公关部和节目部合作的铁四角。因为这属凤凰草创初期，同仁以自我表扬、兼彼此表扬取乐，在辛苦工作中找到平衡，说句实话，我十分怀念这段陪着凤凰台成长的时期。

飞越黄河

1997年5月29日傍晚6点，我和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负责飞越黄河现场转播及表演的人员，坐在北京往山西临汾的夜车上，大伙又是速食面（方便面）又是冷冻北京烤鸭，带了大批食物，像是去野战演习。我的心情更觉得像是学生时期的野外郊游，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大陆搭火车，尤其是穿山越岭的夜车。也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到壶口瀑布，这个传说中“黄河之水一壶收”的著名天险之地。

坐了13个小时夜车，凌晨7点到达临汾，但这只是搭乘汽车的起点，从临汾市到壶口还要4个小时车程，由于先遭到达壶口的同仁传回的消息是“饮食状况恶劣，有人水土不服，腹泻”。这就是为什么大伙带了这么多干粮补给品的原因。在临汾吃早餐，北京同事教我：“小莉，快吃点当地的豆腐，豆腐是水和土做的，吃一吃水土就服了！”一伙人像是就此向繁华都市告别般，把早餐一扫而空，才浩浩荡荡地往壶口出发。

一路上，一会儿山峦翠绿，一会儿黄土盖地。一个大转弯，我看到了滚滚的黄河水，愈往山上走，愈觉得离天很近，离阳光更近，空气中弥漫着尘上和黄坡地的粗犷味，“这里是适合汉子，适合出英雄的地方。”我心想。

到达壶口宾馆，这是附近惟一的宾馆，不知是我心中已做了最坏的想象，还是宾馆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环境大作改善。总之，宾馆的设施是让我们这批之前听到许多“不利消息”的城市佬大为宽心，直觉“壶口宾馆是天堂”呀！后来知道，由于壶口宾馆床位有限，许多同仁是睡在附近的窑洞时，这个天堂说法就更加贴切了。

北京的哥儿们帮我送进大量矿泉水、速食面和水果。

我把自备的煮水器、床单、被单和拖鞋摆放妥当，同事卜邦贻看到我带来一箱的防蚊水、防晒油、保济九、袋装麦片粥、台式泡面、饼干，直嚷着要做个“凤凰情报站”，报告观众“小莉在壶口宾馆开杂货店啦！”“要对抗‘天险’当然要有万全准备呀！”我反驳说。

结果，当我的煮水器解了一群人馋，因为有方便面没有热水泡怎么吃？而我的防蚊水更让许多人免于成为蚊子饱餐的乐园。当一群人鞋底满是细沙的回到宾馆，我却是抖抖拖鞋，干干净净地走进房里时，同事们不得不佩服我的先见之明。

盛夏的壶口，天黑迟，傍晚，空气中的燥热稍解，反而适合活动，我按捺不住好奇爱冒险的性格，直嚷着想亲近黄河！

从宾馆到瀑布边，小黑（柯受良）打算飞越的那 50 米处，走路只要 10 分钟就到，我决定到现场去看看。

黄河之水流过山西陕西边境的壶口处突然收窄，形成一道瀑布，瀑布下水流湍急，此处的两岸也是浩浩黄河最窄处，曾听说有游客不慎失足，到瀑布下游被寻回时，只见破烂不成形的衣服，尸骨无存，壶口天险可见一斑。

壶口宾馆所在处在山西一侧，也是柯受良飞越黄河的跑道起点，飞过黄河就到陕西，那里窄到只有足够的空间做飞车的落点。

凤凰卫视推动柯受良飞越黄河的活动，铺排已久，从协调壶口岸边两省政府，到找寻合作伙伴——与中央电视台进行联合转播，足足有 9 个月的时间。凤凰卫视制作的 12 集飞越黄河特辑，更让我对壶口瀑布，虽还未亲身到过，就已有梦里百回的熟悉。但当我真的到达现场，自认也见过不少大阵仗的我，都忍不住说：“妈咪呀！我们怎么选了一个这么险恶的电视转播环境！”小黑选在 6 月飞越黄河，除了为配合香港回归外，也为了那时的黄河水量少，从技术层面降低风险，所以看到的壶口瀑布并不壮观，但是那两岸山壁抬头是天，下望是水，除了风沙滚滚，天地间别无长物的现场感，似乎告诉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标榜先进的电视科技在大自然面前也得低头。”工作人员说：“现在天气好些了，昨天，一个大风，把大伙辛苦架起的舞台和场景帷幕全给掀翻，今天又得重新来过！”险峻的环境，恶劣的气候，没有人有把握舞台能不能即时搭成，转播能不能进行，两天后就是 6 月 1 日了。

29 日的壶口，人影晃动，大家都在忙碌，但是有种虚无的微妙心情，因为有太多未知数，我们勘察地形回程，遇到小黑哥：“丫头，你来了，也不来打招呼！”小黑哥摸摸我的头，我学着像汉于般用力拍拍他的肩，我不想问他准备的怎样了？相信他的压力已经很大，黝黑的脸上看不出他的心情，但他好动的个性依然，他继续招朋引伴，招呼各地来看他的朋友。

一趟黄河边走下来，我满身是沙，单是漱口，都漱不尽满嘴的细沙，但总算是亲近了黄河，记起临行前王院长（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对我说的话：“壶口也没那么可怕，就是不在黄土坡地长大的人，见到黄河会有不同反应，得亲近一下，没事，就好了！”而我也果然是亲近了一下就好了，壶口之行，有同仁闹肚疼；而我小心翼翼，并没有水土不服。

当晚，主持人对稿时，我是唯一代表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和另外 3 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合作，我和朱军在山西起飞现场，周涛和张政在陕西落点现场，表演节目两边穿插。作为祖籍浙江、台湾出生长大的香港媒体主持人，我无可避免地成了绝对“异数”，加上飞越黄河是现场节目，中央电视台一套和四套节目，凤凰卫视，香港当地电视台，台湾中视，向全球转播。负责节目的中央电视台编导，担心现场节目主持人说话“擦枪走火”，在对稿时，他严厉地对所有主持人说：“脚本上的稿，一个字不能改！”虽然这是对四个主持人的告诫，但我想，中央电视台对主持人的训练，一向是照着本子走，这次重提，显然是告诉我这个“外人”这项规矩。

但这可把我弄慌了，自认记忆力不好，要一字不漏背稿，尤其不是自己语气的文稿，一来我担心主持起来不像自己；二来害怕达不到“一个字不能改”的要求。

当晚我紧急和院长（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商量，院长也忧虑我会失去个人主持风格，为了尊重中央电视台和平衡凤凰卫视的香港媒体特色，院长说：“你照着稿子的原意，以自己的口气顺一顺，再把顺过的稿，给邹主任（中央台文艺中心主任）看看，我先和他说说，如果他看过没问题，你就以自己口吻说话。”最后，邹主任看过我顺过的稿说：“很好呀！”这样我获准改稿上场，这让我稍微宽心，继续准备节目。

第二天，照原订计划彩排，伯摄像机吃不住细沙的侵袭，只是表演人员在山西、陕西两个大舞台上走位，黄河两岸的锣鼓队、腰鼓队动辄百人上常因为是第一次彩排，场面较混乱，但这也是唯一一次彩排机会。风沙愈来愈强，大队勉强走位一遍，正要撤走时，突然狂风一刮，漫天黄沙，眼耳口鼻没有一个能张开。我差点被吹着往前跑，赶紧使力定定位，迅速转身，以背对着风沙来的方向。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邹友开英雄式地站在我身后说：“我帮你挡着。”暴风过后，看着每个人灰头土脸的样子，彼此嘲笑：“你像出土文物，秦朝兵马俑！”但大家心中都有些沉重：“明天节目正式开始，甚至飞越那一刹那，万一起了像刚才的暴风，人都站不住，看不清，怎么办？”同事打气说：“天气预报，明天（6月1日）天气比较好！”“能不能预报是否有暴风？”我追问。

“难！”同事无奈他说。

我想今晚会有很多人祈祷壶口6月1日风调雨顺吧！

壶口恶劣的天气使黑哥有些急躁，毕竟明天他是惟一的主角，玩命的也是他，他又率众到跑道头，上香祈祷。

这条跑道对当地搭建工和黑哥的工作人员可是圣地。节目脚本设计了一段我和另一位主持人朱军，跑上跑道头访问黑哥起飞前的心情。彩排时，我兴高采烈爬上跑道，却见搭建工人像中了邪似地惊慌大喊：“女士不能上跑道，女士不能上跑道！”他们让我赶快下来。

原来黑哥有个迷信：“女士不能上跑道，更不能碰他的战车！”我嘴里虽然嘟囔着：“黑哥重男轻女！”但心想：“只要黑哥心里觉得舒但就好，我们毕竟都只希望他人车平安！”5月31日晚，严格说起来是6月1日凌晨一点，壶口宾馆里灯火通明，会议室内，所有台前幕后工作人员仍在一段段对着脚本流程，因为时间的不允许和舞台现场无法架机进行演练，所有上片头、进影片、换场景，都只能在纸上练兵。最后，节目总导演张晓海说了一句令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话：“兄弟姐妹们，咱们明天是‘带机彩排’了，大家切实照着流程走！”而第二天早上10点多开始，我们要进行的是3到4个小时的现场直播。当时，大家心里都没底，却都只有全力以赴的心情。

宾馆外，突然人声杂沓，汽车喇叭声不断，仔细一看，糟了，通往壶口瀑布现场的惟一条通道，挤满人车。山西附近的乡亲和远道而来的旅客，全都赶在半夜抢进现场，打算在瀑布附近露宿一晚，等着看柯受良飞越黄河，后来听说当时有所谓“三五”政策，就是50元人民币是观众门票、50元供给三人住的帐篷、另外50元是餐费。选择50元，是因为人民币50元票面上就印有壶口瀑布的图案。

邹主任一急说：“这些人一抢位，咱们明天的机组人员根本别想进，不处理这些人，咱们明天就不用转播做为主办单位之一的凤凰卫视工作同仁，赶紧协调当地公安维持秩序，喇叭声这才安静下来，众人也各自休息，因为硬仗还在后头。

临睡前，我去看了一下黑哥，从台湾和香港来的刘德华、赵传一伙朋友陪着他。但他已坐不住，一会回房里走走；一会说上香拜佛的时间到了。黑哥的小儿子更禁止任何人提到飞越黄河的事，佯装明天只是普通的一天。我和黑哥道声晚安，一切都在不言中了。

天一亮，我已被屋外嘈杂的闹声给惊醒，赶来看飞越黄河节目的群众又开始聚集。我梳妆整理完毕，坐上工作人员专车到现场，沿路看到满满的人影像朝圣似的，大家专心地往一个方向走，到了舞台现场更是惊人，山西、陕西壶口瀑布两岸山头上人影晃动，上万人从山的那一头不知花了多少时间，翻山越岭，慢慢爬上看得到瀑布的这一边山头，然后各自找到荒山上可以落脚的地方，坐着、蹲着等着看节目。这既省却门票钱，又不用人挤人。面对难得一见的盛事，黄土高原上乡亲看来是说什么也不会错过。

数十万观众聚集完毕，节目即将开始。“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周涛，我是凤凰卫视中文台节目主持吴小莉……”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联手制作主持的飞越黄河现场节目，几经周折终于开播了。

节目顺利进行，我和搭档朱军也逐渐建立默契，节目过半，原定一点多进行飞越黄河的重头戏，到了12点多，跑道头传来消息：“黑哥已经准备好了！”消息再来：“开始起风，黑哥有点急躁了，他情绪已经准备好，要提早飞，不然情绪会下来，”中央台文艺中心邹主任亲自跑上山西起飞点的舞台，对我和朱军说：“节目更动，随时准备飞，你们随机应变！”我们得到御令，乐得丢掉脚本，两人开始将现场数万攒动的壮观景象，到逐渐感受到的风力，和昨天彩排风吹成泥人的真实感受，一一告诉观众。我们强调，可能因气候因素，原定飞越黄河的时间要提早进行，我们一面等候跑道头最后消息。山西一边现场导演周晓东指示：“下一个节目后就要飞了，朱军到跑道头！”我站在山西舞台上，正对壶口瀑布的位置，可以清楚看到黑哥要飞越那生死交关的50米空缺，我站的位置在风口上，感到风愈来愈大，我开始担心，昨天暴风吹，人都站不稳的景象会重演，心里直念：“阿弥陀佛！”黑哥的跑车加速准备起飞。嘎！跑车突然在跑道中线急煞车！“哦！我的天！”我捂住了嘴，吓得我差点心脏病发。小黑的助手小白正在我身旁，事后他笑我：“第一次试飞失败，你吓得脸都发白！”“有什么不对！偌大的壶口瀑布，我都听到数十万观众齐声发出的惊呼！”我反驳。各种耳语传来：“一定是黑哥故意制造紧张效果！”“他是不是害怕了！”跑车退回起跑点，停了半晌，终于又往前冲刺。唰的一声，跑车凌空了，飞出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陕西现场准备好的气垫上。我顾不得形象，大叫一声：“好样的，小黑哥！”（好在当时麦克风没有打开。）现场群情激动，主持人都差点想上前拥抱英雄，我们勉强稳住情绪，继续现场直播，将《飞越黄河》现场节目画下完美的句点。

节目完毕，大队人马准备撤退，凤凰卫视同仁赶到我身边护驾。因为大批观众冲上舞台，要签名的签名，合影响合影，要动用公安保护才得以撤离。这时的壶口宾馆，气氛迥然不同，如释重负的欢喜、飞越成功的骄傲，让每个参与飞越黄河的人，在几近疯狂的边缘狂喜着。几位几个月来奔波山西、陕西多次进行协周工作，凤凰卫视北京神州公司的同仁，激动得哭了，我理解地拍拍这些大汉们的肩。我没有和他们经历9个月的波折，但十分有幸参与最后几天成果的展现，我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份不容易。同时也看着刚过一岁多一点的凤凰卫视如何在中国内地辛苦扎根，凤凰卫视同仁为成就风

凰起飞这个梦想所付出的努力。

如果说凤凰在中国享有多大的特权，我想我是不太相信的，因为凤凰在慢慢成长的几次关键时刻我都有幸参与如果过程轻易，同仁们便不会在事后有如此患难与共的情感。

飞越黄河的合作，更使我和中央电视台多位台前幕后工作人员成了好友，大家把酒言欢，虽然我不喝酒。大队人马在返程回北京的火车上，更是互相签名、合影、说故事，他们教我北京俗语，我告诉他们台湾笑话，我藉由他们了解更多中国内地电视人和电视文化，他们藉由我和凤凰同仁认识了揉和台湾和香港媒体人的不同特质。

现场导演周晓东事后不好意思他说：“小莉，你还记得在节目快开始临上场前，我还提醒你：‘尽量往咱们（中央台）这边靠靠！’后来发觉，我真是多事，一点都不用担心。

我想，这次飞越黄河，飞过的不只是壶口瀑布，更飞越了来自台湾、香港和大陆不同文化背景的电视人，对彼此并不了解的鸿沟！

职业生涯中最长的一次现场直播另一次展现凤凰群体智慧的是《香港回归——世纪报导 60 小时播不停》。

1997 年 6 月中，凤凰卫视领导层罕有地召开了一次全体动员大会。在忙完飞越黄河后，全体人员才全力投入这场世纪报道。

北京同仁大批南下，会议中心成了临时指挥部。但我们所谓全体动员也不过百人。我们要在半个月之内，在正常节目外做足 60 个小时播不停（除了历史时刻的现场讯号外的‘罐头节目’和新节目）例如，搭乘直升飞机鸟瞰整个香港的“遨游香港凤凰号”。

凤凰卫视 60 个小时回

归报道的直播，是除了中国中央电视台 72 个小时直播外，时间第二长的媒体。

而节目样式、片头、十几个主持人责任分配不断修正，许多媒体人的心情是既期待，又希望一觉醒来第二天是 7 月 2 日，直播已圆满结束。

6 月 29 日一早。所有台前幕后工作人员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行脚本流程的纸上演练。凤凰卫视行政总裁刘长乐来为所有人打气，尤其是在台面上代表凤凰门面的主持人。从此，每次凤凰有大任务，也是新闻人出身的刘老板总是有场面授机宜的聚会，而我们这群小朋友，也总在几位高层的剖析后，稳定军心能安心出外，进行征战。

晚上我主持《时事直通车》节目，进行直播演练，和会展中心的主持人卜邦贻对谈。但节目结束后，我感觉仍虚，院长（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说：“10 点半进行彩排，只要把 60 小时的前半个小时走顺了，后面就顺了！”我和同事窦文涛是这个节目的幕前总指挥总主持，负责全程坐镇位于红堪的凤凰卫视总摄影棚。而我要在 6 月 30 日中午 12 点的那一刻开始，开第一个场，说第一句开场白。

经验老道的院长说对了，在前半个小时彩排后，我们真的找到了那份感觉，我也不再为是否准备充分而心虚。

因为事实上，从我决定到香港工作的那一刻起，我已经在为香港回归的历史时刻做准备，而我已准备了 4 年。事后公司要主持人写下感受，我曾

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或许能表达那时的心情。

“凤凰”通讯回归特辑主持人手记 1997 年 6 月 29 日晚上 10 点 30 分，一群忙碌的人还在红堪凤凰总部进行 60 小时播不停的彩排。“这 60 小时，主持人很重要。”老板说，“但是整体风格要如何？”高层领导给了八字箴言“活泼、跳跃、轻松、幽默”。“如何呈现？”谁也没试过。

但是当彩排倒数 5、4、3、2、1 时，一种临场的兴奋立即给了我答案，“we

will be great”我告诉我的伙伴文涛。当晚，虽然忙到晚上 12 点，但我放心地睡了，因为我已找到那份感觉。

6 月 30 日 11 点 50 分，导播催进场，我坐进主摄影棚，文涛在指挥总部外场准备接我的话，我知道要开一个既欢乐又大气的场，而我当时真实的心情是开心而稳定。

“凤凰卫视世纪报道，60 小时播不停，您好，我是吴小莉……”我们开始了。

“我们现在看看在会展中心前线本部的戈辉和邦贻！”“谢谢李辉”。“鲁豫又被我们派到哪去了呢？”曹樱和静漪上现场，我笑着告诉她们：“放轻松，咱们只是在聊天”。Siand by 现场 5、4、3、2、1。

“这次转播，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同伴在各个点就位了，但是有些伙伴正准备赶到采访点上去，在我身边的，就是曹樱和静漪……”。

广告时间，院长（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跑进摄影棚打气“很好，很好，就是这样，基本上你们总主持的身分已经确认，继续带带各现场主持人的气氛和情绪。

”4 点 45 分，现场正在进行末代港督彭定康告别港督府的仪式，耳机突然传来“中国政府代表团专机降落启德机场，我们要加入这个画面，小莉，文涛作点解释。

”3 分钟后，耳机再度传来“等待时间太长，我们再切回你们，到告别仪式现常”这是第一个没法事前预料，没法按着节目脚本流程走的情况，却不是最后一个，而是一个开始。

此后，所有的时间和脚本都乱了，下面要播什么？得现场指挥和导播们商量，有哪个预先做好的段子长度适合，又可以随时切换到各地重要场景，我们主场主持人的任务就是一面嘴里说着临时编的词，耳里还要听着导播随时更换的最新指示：“小莉、文涛，我们收到添马舰的讯号，下面别去真心快乐 MTV，先到添马舰”。

“天安门广场现场收到了，转现场！”“不行，广美的讯号还过不来，先到万众同心大汇演。”由于现场状况太多，除了开头一两小时外，根本没有什么脚本、大纲可言。几经磨练，到后来我和文涛每到回现场前，彼此只问“谁先说！”“你先说，”“谁去影片？”“我去”就 5、4、3、2、1 开场了。

60 小时下来，我只记得自己不断上现场，“接招”补状况，做临时翻译员。有时间我就休息、补眠，眼睛睁开了就看着电视或是当天的报纸，补充新资料、新话题。

7 月 2 日晚上 11 点，60 小时节目接近结束倒计时，一群“少眠少休”的伙伴们也开始进入疯狂状态，只是不知是狂喜，狂欢，还是狂累？7 月 2 日接近零点凌时，我和文涛在节目中，最后一次击掌，‘大功告成’。我们脱离了麦克风，在各个工作点上找寻幕后的工作伙伴，我们在镜头前肆无忌惮

地欢呼拥抱，展现那一刻最真实的感受，就如同我在隔日庆功宴上衷心的话语：“我想我会如此迷恋电视工作，除了是自己的表现欲外，更重要的是电视是一个群体创作，在最辛苦难捱的时候，你都不会是一个人孤单地面对麦克风，而一定会有一群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陪伴着你，而这样历经大事之后的革命情感，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培养”。

有朋友问，60 小时的节目很辛苦喔！我承认，它不可能不辛苦，但有更大的成就和满足。这 60 小时相信激发了许多人的潜能，回顾 60 小时，我竟是从头至尾没有出现过上 Live 节目的紧张感，取而代之的是那份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放纵。或许因为我从事电视工作多年，来到香港也已 4 年，已经能掌握镜头和说话的分寸；而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我想是凤凰卫视给我的“自由”——一个没有呈现方式框架、信任我言论尺度的表演空间，让我能如此放松、如此自如地带着观众参加这场历史盛事。

回归前两天，ccTv 海外部的朋友访问我，我告诉他：对凤凰是 Record high 破纪录的转播，对我多年的电视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而我是以到香港 4 年，半个香港人的心情，带着所有朋友一起参加这场历史盛事，作为总主持之一，必须在主棚内坐镇，无法亲身到主权移交的大堂内现场采访，本来有一点遗憾，但当我与各地的记者朋友餐叙，却发现，我比他们都了解在这 60 个小时内，香港、北京发生的所有重要盛事，我才明白，在这香港关键的 60 小时里，原来我是重要历史的全接触者，而我相信，我没遗漏的，我的观众也必定参加了。

我的 60 小时 “小花絮”

1、60 小时，正餐加宵夜，公司供饭 11 餐，我只吃完 2 餐，其余吃两三口就作罢。

2、60 小时，减重 1 公斤= 2 斤= 2.5 磅。

3、60 小时，带妆时间 48 小时，每到晚上（或者说深夜或凌晨）就“妆都不成妆了”，文涛说像出土文物斑驳的青铜器，所幸电视上看不出。

4、60 小时，睡眠时间 9 小时。不过，我偷偷地把家中睡垫、闹钟、棉被带来，直播中若有空档，都想法子躺下假寐，效果颇佳（一位台湾中文台同事就奇怪，我睡觉前看到你，睡醒了，怎么还看到你，精神这么好呀！）5、60 小时直播状况，我的造型顾问，也就是忠实观众——在台湾的妈咪，看到我不在镜头前，她就打电话来关心一下，“你脸上的光好像不够！”“是，妈咪”我赶快询问灯光师，“喔！因为怕文涛眼镜反光，所以不敢打亮，我们调一调！”果真有此事，明察秋毫的妈咪！

7 月 1 号早上，再见到我，妈咪又有意见了，“你没睡好，上眼皮肿胀，请化妆师打深点！”“Yes Sir，妈咪！”60 小时刚播完，大家都想赶快回家“洗洗睡了吧！”但是那一刻，我却有些失落感，因为电视人的职业病：“经历 60 小时之后，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不禁要问：“Boss, what's my next big project?（老板，我们下一个重要的案子是什么？）”凤凰卫视在香港回归的报道上，应该有不错的成绩，尤其对亚洲区的华语观众而言，它提供了一个没有历史包袱既定立场和禁忌框架，只有现场事实的报道方式。这场历史盛事给了凤凰卫视一个机会，在中国内地观众心中再攻下一城。对台湾的观众而言，藉由卫视中文台的转播，让我父母再度见到了我，而 60 小时香港

所有活动的全接触也是台湾传媒所没有的，相对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事后，中国中央电视台一位朋友从北京来电：“小莉，你们准备这次世纪报道有多久？”“做什么？我问。朋友无奈他说：“台里面要做检讨报告！”我想朋友想问的是：“为什么才一岁多的凤凰卫视能做60小时的节目，评价和回响又还不错，一定是有极大的人力物力和筹备期！”我想起凤凰高层常自嘲的话：“小莉呀，我们仍是小米加步枪！”意思是凤凰卫视的力量仍小，但就因为明白自己的优缺点，凤凰卫视懂得扬长补短，藉力使力：“我想是综合各家讯号，各家之长，加以精编整理，同时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子上，大家同心协力，只想把节目做好吧！”我回答。

无可否认，“香港回归世纪报道，60小时播不停”让凤凰卫视和所有主持人又走上了另一个台阶。

“两会”的故事

1998年3月2日香港同事一行3人包括我在内飞抵北京，加入北京两会报道组的行列。

甫下机，3人直奔人民大会堂宾馆、两会新闻中心办理证件，接着又转往紫荆宾馆开会。因为照惯例，在大型报导活动前，刘老板会亲自主持动员会，既提供事件背景，也定下报导基调。之后王院长分配工作，众人各自领命，整个报道组就开始动了起来。

每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俗称的两会，是京城也是中国政坛的年度大事。我第一次参加两会报道是1997年3月，那时凤凰台还没有带状时事类节目。公司指示：“小莉先上会（北京媒体行家术语，指采访两会），为4月即将开播的‘时事直通车’热身！”于是我、多多（公关部经理）、绍刚、矫捷、星光、金光几位编导和摄像，小孙、小崔就组成了8人小组，完成去年两会“北京三月风特别报道”。我们自称是采编播黄金组合，因为每个人都像是穿上了红舞鞋，舞个不停，战斗力强，十足工作狂，公关经理多多和我自此更成了福祸与共的姊妹，至今依然。

这是我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凤凰卫视的威力，“你绝对会受人瞩目！”同事警告我。

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我，体会5千人一起入场开会的场面，也体会被参与或陪同开会的代表、委员围住无法脱身的窘况。凤凰卫视主持人受欢迎，同事原本十分得意，乐得让我应观众要求又拍照又签名，但后来发现人潮源源不绝涌来，情况不妙才充作恶人，左挡人群，右手开路，帮我杀出重围。

但第二天我还得上会，怎么办？公关经理立刻想出法子，“带着公司帮你做的主持人卡片，再碰到热情‘影迷’要照相签名，你就送他一张卡片省时间，免得被围困！”第二天，试用新方法刚开始奏效，但很快观众又有新要求，要在主持人卡上签名，心软的我答应了一位，就不好拒绝第二位，于是人群再度围了上来，惊动在场的外国记者，以为是哪一位政要出现：“发生了什么事？”看着有人不断要求合影签名，一位外国记者疑惑地问我：“You should be a star！”（你一定是明星）法新社驻北京记者还拍了一张众人围着我要签名的照片，这张图文稿后来被台湾、香港的报纸转载。

这是我第一次上两会，却也看到凤凰卫视的力量逐渐在中国内地扎根。

1997 年的中国政坛风起云涌，2 月邓小平逝世，大家都在等待 9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简称“十五大”）的召开。又将会展现出什么样的政治格局，由于 4 月，凤凰卫视的时事直通车已经开播，我责无旁贷地开着“时事直通车”来到了北京。“小莉，你就再去北京签签名吧！”刘老板说。

我全然了解语意中的含意，“高层明白前线作战的甘和苦，凤凰卫视仍在立根基的打战阶段，你就再担待担待。”事实上，我是挺乐意北上的，只要是在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和有支援的情况下。因为这是切身了解中国最好的方法，也或许是骨子里泛滥的新闻细胞，那种“当大事发生时，我存在”的使命感在作祟吧！

十五大报道结束，我损失了一公斤体重，带着一双严重发炎的眼睛离开北京，但我全程见证了中国在邓小平辞世后完成的政治布局。在以党领政的中国，这是无比重要的，就如同我在 1998 年两会后做的深入报道节目《直击两会》中所说：“在中国只要去年十五大的那股秋风吹得平稳，今年 3 月两会的春风就会吹得和煦。”而我喜观秋风丽人。

十五大报导，凤凰卫视开辟了北京现场，我坐镇主持，对那些北上开会，在宾馆内常收看我们即时报道的各地代表们震撼和影响力更大。

大会新闻官会后开玩笑转述十五大会场外的情况是：“如果哪里出现骚动，人群突然集中，那必定是吴小莉又被代表们给围住要求签名了！”为了解情况，十五大会议安排了七八场记者会，我参加了五六场，几乎场场提问。1998 年两会新闻官听说我也来了，笑着对同行说：“吴小莉是去年十五大之花，场场记者会都提问。”我的受关注也令我处境尴尬，1998 年两会首场记者会，新闻官首先点我提问。

会后有位中国内地媒体朋友问我：“是不是和新闻官打过招呼？”我反问：“我是香港媒体，不知道在内地有这样的规矩吗？”他顿时哑口无言。

等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开记者会时，我整场努力举手提问，但终场都没有如愿。这位朋友反而跑来为我抱不平：“你一直举手，他们怎么都不点你呀！”弄得我啼笑皆非。

1998 年的两会意义不同，一来需落实中共十五大的党意成为政府的行动力；二来是 5 年一次的换届，人事有新安排。会期长达 17 天，我带了整箱行李，以适应可能需要初穿皮袄尾穿薄衫的北京 3 月天。“小莉，你可能要做好你做两会的报道，别人也会来采访报道你的心理准备！”刘老板说。

我点头，心领神会，因为从 1997 年两会，十五大，我已经逐渐体会中国内地媒体朋友对凤凰卫视和对我个人的好奇，而在我慢慢代表凤凰卫视，成为观众识别凤凰卫视的那张脸时，我对其他媒体的发言，就不再只是代表自己。

两会顺利进行，我的思绪也随着每日的议程变化。

3 月 6 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3 月 10 日进行通过的程序，3 月 16 日开始决定一连串中国高层人事案。那几天我是夜夜梦高官，午夜梦回，尽是中南海里的高层领导在我梦中走来走去。朋友笑我工作太紧张，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毫不讳言地承认，两会期间我在北京呆了近 20 天，每天早 7 点半到晚 8 点半，平均工作 12 个钟头。白天上人民大会堂采访；晚上上直播室现场，做完节目后开第二天的工作会议。结束后回酒店叫“Room

ServiCe”。

一面吃晚餐，我一面看自己的节目《寸事直通车》，做完检讨的工作后，我再研究第二天的资料至深夜，平均每天睡眠时间 5 小时，乍暖还寒的天候和劳累的工作，使已经习惯出门，算是懂得照顾自己的我，仍然罹患感冒。

同事捎来上海一位那时还未曾谋面朋友的问候：“听小莉电视上的声音，好像感冒了，要她小心照顾身体！”“糟！我努力压抑略带鼻音的嗓子，还是给‘观众’听出来了。”我心想。但是心里却是暖和的不得了，内地朋友的关怀令人窝心。

“吴小姐，你昨天用了我说外面的世界海阔天空的那段访问，上级领导立刻来问我，是不是想下海了（大陆术语就是离开公家单位，自行经商），”一位受访的人大代表说。

语毕，我们两人相对哈哈大笑，他笑他说话还挺有影响力，我笑原来代表们看我们的节目如此仔细，这种即时回馈的鼓励，就成了我们这群日夜工作的北京报道组同仁最好的精神寄托。

忙碌工作的另一个“附加价值”，就是几个娘子军并肩作战的伙伴成了患难真情的挚交。有时我和小宋，星光、张力工作到极至，发了狂，就自行找乐子——开领导玩笑，好脾气的钟老师（北京报道组总指挥）绝对是“花木兰飞弹”最佳落点。就在钟老师担心姑娘们又有什么新招式时，我们会理直气壮他说：“钟老师，我们是喜欢您才有兴致和您逗乐子呢！一副对方是三生有幸的模样，然后等不及他有反应，一伙人一哄而散，各自工作去也！中国第九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都如外界预料，媒体等待的只是各位领导人得票数的多寡，藉以评估民心向背。

3 月 17 日，朱镕基高票当选为新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媒体开始准备出席新总理的首次记者会。

3 月 18 日，同仁们闭门造车，议定了 9 个题目，再排定优先顺序，以防如果最想问的题目已被同行提问，才有后备的选择。我们的目标，当然是争取提问。

当晚，大家又开会到晚上 9 点，空气中弥漫着莫名的兴奋，就如我在《直击两会》中所说：“这次的人大会议，让我感受到两会后的中国，是真的要动起来了！”

“知道中国的发展到了关键，前路不好走，却又非得好好行，这是一种对新人新政的期待，毕竟中国内地发展的好坏，对香港、台湾，甚至整个亚太区，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十几天充当我并肩作战的小保姆，小宋成了知我甚深的姊妹，她从没见过我像小学生见老师一样忐忑不安。她笑着对我说：“你想和朱总理说什么话，你就写下来，我或许有机会以后托朋友的朋友转给他！”“我只想表达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支持，但又不晓得他认不认识我，这样做会不会太唐突？平时挺大方的我突然害羞担心起来。

“不会的，不会的，他会知道你是谁的！小宋安慰我。于是我振笔疾书：“亲爱的朱总理，毛遂自荐的写一张卡片给您，是要诚挚的祝福您，您未来五年想要完成的所有事都能实现，因为不论作为一个媒体人或是中国人我们都会为此祈福。”我慎重其事交给了小宋，然后安心回酒店休息，准备 3 月 19 日的另一场重头戏。

3月19日10点多钟，我在忙完人大闭幕式采访后，赶到记者会现场，同仁们已分工把座位找好。在等待记者会开始前，我再度拿出准备好的问题，做沙盘推演。

此时，我做记者的那份勇气突然涌现：“为什么不搏一搏，或许有机会自己把那张鼓励新领导班子的卡片交给朱总理！”我把想法告诉小宋，已成了专业保姆的她，立刻抽出我的另一张卡片说：“昨天那份我没带来，你再写一份等会儿碰碰运气！”此时国务院新成员陆续进场，朱总理在落座前往台下扫视了一下他的观众——也就是我们，突然他看到我，似乎有些意外，接着对我颌首微笑。我略为惊讶，心想，这可能是我坐在首排，朱总理在和媒体打招呼时有地利之便，我赶紧代表媒体朋友点头回礼。随后钱其深副总理落座，也对我笑了一下，这个笑容我不陌生，因为几天前钱副总理的记者会我也坐在第一排，但举手老落空。我想，他对这个认真而可怜的女孩，可能有些印象吧！

记者会开始，由于是朱镕基上任后的首次中外记者会，又是这次两会最高层级中国领导人面对媒体，所以现场吸引了600多位中外媒体人。中国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香港无线、亚视、有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英国国家广播电视BBC等，都做现场实况转播，媒体记者更是争相发问。

几次举手落空，眼看记者会已经过半，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新闻官点了一位俄罗斯记者发问后，我立刻低头准备要记录同行的提问内容，这时耳边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你们照顾一下凤凰卫视台的吴小莉小姐好不好，我非常喜欢她的广播。”说话的人是新任中国总理朱镕基，当我回过神来抬起头时，只见他托着下巴对我微笑。我赶紧双手合什向他回礼表示谢谢。这时会场响起一片笑声。朱彤（翻译官）笑了起来，因为她也 very 意外，不知该如何翻译朱总理这段话。

俄罗斯记者和朱总理的答问继续进行，但会场已有小小的骚动，大家都在期待着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也开始有些心不在焉，因为隐约感到，我应该有机会提问。这是全场记者会我惟一记不清上一个答问内容的一次。我侧身和坐在身边的多多（凤凰卫视公关部经理）说：“如果我有机会提问，我想我会先向朱总理致谢！”问答结束，照例是一轮举手抢问，新闻官轻点了一下我，全场又传出笑声。我起身提问：“谢谢朱总理，首先，我要说的是，您也是我的偶像。”“大家好，我是香港凤凰卫视吴小莉，想请教朱总理的是，我们知道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所受的影响已经陆续显现，尤其今年上半年，香港的失业率也达到一年半来的新高，中央政府在面对经济困难时，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加以支持？另外，海外媒体对您的评价相当高，有人说您是铁面宰相，或者是经济沙皇。

外传您在进行经济改革时，也曾对您的家人造成一些困扰，想请您谈谈您在推动改革过程的心路历程，有没有曾经沮丧，想要放弃过？”根据记者会规定，每人仅限提一个问题。我在容忍范围内，夹带了两个问题，但事实上是三个问题，一个以香港媒体身份，关心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经济的看法和政策；一个是外界对他铁面宰相，经济沙皇的评价，对此有什么看法？另一个就是他推动改革的心路历程。

因为就我对他记者会前半段的观察，他对媒体的提问听得很仔细，遇到特别有感动的部分，媒体不强调他也有感而发，所以我就提出两个问题，再以铁面宰相，经济沙皇为引子，问他心路历程。结果，他回答中央政府支

持香港经济的问题，使当天香港股市上升 300 多点。在他听到经济沙皇这些评价时，他也立刻有感而言，说他不喜欢外界说他是中国戈尔巴乔夫，经济沙皇。至于推动改革的心路历程的问题，更使他发出了一连串豪语：“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会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赢得整场记者会第一次全场如雷的掌声。

在慷慨激昂的陈词后，他转头对我认真他说了声“谢谢！”我想，这次的问答，我们双方都很满意。

记者会后，各方朋友贺电不断，因为合作《飞越黄河》成为好友的中央电视台导演张晓海诚挚地对我说：“小莉呀！在这样举世瞩目的历史时刻和历史的场合，你得到这样的赞赏，有这样的表现，这可是前无古人的事了。”他接着问：“电视上看你在记者会后，立刻叭一声站起来，快步往前冲，是去握手了吧？”我笑着说：“我除了握手致谢外，是去送表示支持的卡片去了！”那张在会前我决定再写一次的祝福卡，我终于有机会亲自交给朱总理，并在卡片上再加上了一段：“谢谢您的支持，我们也支持您！”在北京给身在台北的母亲打电话：“妈咪！我这里发生大事了！”“怎么了？”母亲以为我有什么意外，紧张地问。

“中国新总理朱镕基，在记者会上说喜欢我的节目，点我向他提问！”我说。

母亲起初并不明白这有什么意义，到了晚上她给我打电话：“我看到中央电视台对记者会实况的重播，你姊夫还把它录起来了！”她终于明白当初她放手让我离开台湾的家往外飞的决定，促使我在亚洲区、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飞出了另一片天空。

回到香港，我收到一封北京观众的来信，他说“吴小莉一问动京城”，所以他自创了一首诗送给我，诗是这样写的，“小处可传天地意，莉香能酿古今情！”

我想，我会把这段诗珍藏起来，就如同这次终身难忘的经验一样。

第八章、从“时事直通车”到“小莉看时事”

“当大事发生时我存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我”擅于形象和节目包装，一向是卫视和凤凰卫视，或者说是香港媒体的强项及特色。

记得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李一萍在凤凰开台才一年的年度战略研讨会议中，曾提出一个电视台一定要有强打节目，要有“造星”的能力。现在看起来凤凰台已经初具这样的雏形，正往这条路上前进。

我刚到香港一年多，有次和台湾驻港的金融界精英聚会，一位朋友笑着对我说：“Star makes a star！”卫视造就了一颗新星，藉以表达我和华视时期气质的转换及不同，已经是星味十足！

回顾我 1993 年初刚抵香港，卫视为我设计的第一个个人宣传片，穿上一身米白色套装，走在香港中环大街上，环顾四周的高楼大厦，是现代感十足的都会女郎。

1994 年 9 月，中文台高层想找一张能代表中文台的脸，“The face of

chinesechannel”，高层说：“就如同汪明荃就代表早期的无线电视台一样。”首先要为中文台定位，必须是国际化，具现代感的形象，当时的高层选中了我，把我从新西兰正在拍摄《电脑号快车》的现场召了回来，因为宣传形象部的 Bill 要为我做个人宣传片。这也开启了我、Bill 和 Ange1a（当时这个案子的统筹）3 人的个人情谊。

Bill 是澳洲人，对屏幕形象宣传和造型是既专业又耐心。为了了解我，他和我进行多次长谈，问题广泛，“从身家调查到喜欢的音乐？爱做的休闲活动？爱看什么书？喜欢的衣服色系？梦想是什么？学习过程和儿时的成长！”由于我在台湾出生长大，现在居住香港，为国际性电视网工作，经常奔波于中国内地，工作范围遍及京、港、台，成了纵横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和媒体人。Bill 要求我在北京拍摄宣传片，我们在人潮熙来攘往的秀水街驻足，人影，自行车影在我身后和眼前快速掠过，当时留着半长发的我，悠然地站在辽阔而忙碌的中国大地上，颇有神州大地任我遨游的豪情。

不过 Bill 为了先观测拍摄现场的地形，正蹲在地上目测距离时，被一辆正在转弯的自行车撞个正着，当场把 Bill 的高鼻子给撞歪了。Bill 当时很大方挥手让肇事者离开，但事后却哭丧着脸对我说：“我父亲的鼻梁也被撞歪过，想不到我的鼻梁也不保！”适逢星期日，各地医院休诊，找不到适合医生问诊，Bill 非常敬业地说，先拍完片子再说。这一拖，他是回到香港才去就诊。后来，每回碰面我总是关心他的鼻梁，而他就回敬：“还不是因为你，我才痛失直鼻子，如果以后因此找不到女友，你就得补偿我，充当我的女友！”我清楚知道不可能，但面子可要给他个十足，于是我豪爽地回答：“没问题！”

“不过，至今我都没听说他缺过女友。”

这次我的北京行任务繁重，除了拍我个人宣传片外，我还要为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做访问，Bill 更要拍一组中国残疾人士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宣传片，所以同一组 4 个人，是忙得人仰马翻。到了晚上，一伙人苦中作乐添乐子！趁 Ange1a 生日，我们在酒店里大切蛋糕，Bill 和摄像师两个大男生，追着我和 Ange1a 两名弱女子满走廊跑，硬要我们脸上吃蛋糕，服务生不知出了什么事？我们这四人小组的名言就是“work hard,play harder!”以一个歪了的鼻梁换回在秀水街市集的那个镜头，我非常喜欢，回到香港，他把这段日子对我的了解用英文写成了宣传稿，要我翻成中文，改成自己的感觉，这就成了 1995 年一整年在卫视中文台播放的“Who am I? Sally Wu, That's me”长达一分钟的个人形象广告：“当我第一次构得到电视机的时候，这台黑白电视，就成了我最好的玩伴。长大了，电视机却成为我最重要的工作伙伴。”画面出现我和家中首台电视的黑白照片。

“大学 4 年，大众传播，1988 年，我第一份工作就进电视台。见到镜头下的我，他们都说：‘我本人要高多了，有趣多了，而且漂亮多了。’”“电影、音乐、旅行是我最喜欢的 3 件事，为国际性电视网工作，从此我的旅行就更名正言顺。”“看电视对我父母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他们亲近我最好的方法，我是谁？吴小莉，就是我！”这是我成为中文台形象代表，兼负中文台国际化现代化形象的开始。

一直到凤凰卫视 1996 年启播，1997 年规划开播时事类节目，我终于从财经节目、电脑资讯节目和文艺资讯节目归队回我的本行——时事节目。也由于我对时事节目的熟悉和专业背景，宣传部在为我设计新节目《时事直通

车》的造型时，已经是形象鲜明。

撰稿同仁问我，做时事节目，你心中的愿望是什么？我真诚他说：“希望当大事发生时，我存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我。”“希望有一天能说，晚安中国人，不论你在世界哪一个角落！”于是伴随着 1997 年 4 月 1 日《时事直通车》开播前，观众在凤凰卫视，看到了这样一则我的个人宣传片：“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成为一位新闻工作者，是我从小的志愿。秉持着见证历史，眼见为凭的工作信念，我来到了香港，求真相、求知识、求进步。对未来，我的自我期许是，当大事发生时，我存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我。”很幸运地，这两年跟随着凤凰卫视，我基本上实现了当大事发生时，我存在的理想，也因为这则宣传片整体感受专业且具说服力，它还获得了 1997 年国际 pro-max 电视宣传推广大奖，新闻类主持人个人形象片的金奖。也使得“当大事发生时我存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我”，成了许多中国内地朋友对我的直观联想，深入人心，可见一斑。

《时事直通车》是一个集合两岸三地消息、国际大事、财经资讯和体育讯息的时事类节目。它仍然是以香港为立足点和着重点，但又更重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互动，或许因为题材内容和包装方式的新颖，它成为中国内地吸收海外资讯，特别是港台消息的另一个选择。

尤其在中共十五大、两会报道、甚或朱镕基访问欧洲，凤凰卫视都把主播台搬到了现场，开辟了卫星连线，这无疑开拓了观众的视野，随着主持人飞越到了现常 1998 年两会后，大陆的媒体朋友访问我时说，“在中国电视圈，只有文艺类主持人容易成名，很少有新闻类主持人成为明星，你算是特例！”我和中央电视台的朋友聊天，他笑着说：“小莉，你不知道你对中国内地电视新闻从业员的冲击有多大，现在许多人加快了语速，剪短了头发……。”在时事天地里成为具影响力的主播，是我的自我期许，但如果真的意外成为影响电视新闻播报形式和风格的主播，这绝不是我有意的规划。我对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非常感恩，真的，所有朋友的接纳和厚爱是推动我再向前的动力。

对我来说，电视工作 10 年，我只是满足于浸淫在时事的天地里，看着世事变化，参与和见证历史。从小就喜欢说故事，同学们只要发闷了就央求我说故事。那时许多故事都是我信口拈来、自己编造出来的，但同学们也听得津津有味，而我的这个功力一直维持到高中不变。

后来随着年岁增长和大学联考的压力，我想象力不再丰富，也不再能信口雌黄。倒是在从事新闻工作后，朋友们再度喜欢听我说故事，不过这回是真实的新闻故事，什么来龙去脉，幕后真相和采访花絮等等！

这也是为什么在我踏入电视新闻圈第 10 年的今天，我会从《时事直通车》再开一个 VIP Room 贵宾室，和观众一起来《小莉看时事》。因为我一直深信，新闻是世界上“卡士”最强，永远不褪流行的剧目，名人政要都是必定出席的嘉宾，哪一天你有空也让我为你讲讲他们的故事，一起来分享这个时事天地。

朱镕基访欧采访手记

编按：资深记者、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主持人、节目统筹经理吴小莉小姐，因采访朱镕基总理被朱镕基两次“点名”而名闻遐迩，成为海内外传

媒的焦点人物，不少报刊杂志争先采访她，并以大篇幅版面予以报道，是传媒史上罕见的现象。吴小姐应《明报月刊》之邀，把她撰写的《朱镕基访欧采访手记》交由《明报月刊》独家发表，以飨读者。

“腰骨都要散了！”“人部要凋谢了！”这是每一个跟随朱镕基访欧的香港媒体，见面互相打招呼的第一句话。

但是，回到香港，我已经忘了那种一天传 2 次卫星，做 4 条新闻，上一次现场连线，晚上 11、12 点收工，睁开眼就是工作，坐上车就能睡着，这一站行李还没时间全打开，又要收拾起来，到下一站去的辛苦情景。

倒是 8 天里，早早晚晚追着朱总理跑的点点滴滴，成了难忘的采访印象。

故事要从“两会”结束开始谈起。3月19日朱镕基在中外记者会的“点名”事件，意外地把我推向了另一个镁光灯聚焦的所在。结束北京 20 天的采访回到香港，立刻接到公司另一项任务，一周后随朱镕基外访欧洲。由于我仍在媒体的焦点下，所以公司的指示是“做新闻可以高调，对同业则要低调。”3月31日，伦敦时间清晨 5 点多，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抵达了伦敦。为了采访之便，我们住在朱镕基下榻的海德酒店，一个有 106 年历史的五星级酒店。除了刚到的第一顿早餐欣赏了一下海德公园的美景外，忙碌的采访工作使我们根本没机会享受它五星级的品质。因为时间太早，一直到中午一点钟，一行人得出发往机场接机了，仍无法 check in，只能将行李暂放在同事房内，自此，开始那“没眠没夜”的欧洲之行。下午 3 点半钟，中国国际民航专机抵达伦敦希斯路机场，朱镕基一行步下飞机途经媒体区时，我抓紧机会，大声提问：“朱总理好！第一次以总理身份到英国来，有什么特别想完成的事？”

朱镕基率性依然

朱镕基先是举起右手向问好的声音打招呼，接着看到我在人群中提问，伸手指着我笑着说：“吴小莉，你现在，在香港有名了。”我说“谢谢总理”，继续提问，他却笑着离开，随后中国驻英大使馆人员发了一份朱镕基到达英国的书面讲话。

这是自记者会后，我们第一次再度“见面”（电视上见到的除外），朱总理又以他率直的个性，当众表达了他在点名事件后，看到香港媒体反应的看法。虽然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让我放下心来。不只因为他的俏皮，更因为他的坦然，让我知道，“点名事件”后，在媒体上掀起的轩然大波对他并没有影响，他率性依然。

媒体同业开始寄望我，尽量让朱镕基多开金口，一位电台同行就说：“不知道他这次会不会多说些内容，全靠你啦！”下午 5 点多，又有一次可以近距离采访的机会，朱总理刚从温莎堡会见英女皇返回酒店，大厅内挤满了当地侨民，当然包括媒体，朱镕基在和侨民握手，接受献花后，眼看就要离开，这时我只好以人情攻势：“总理，我们等了好久，可不可以说几句话？”朱总理同情地看着我们，走了过来，于是一连串的问题——“和英女皇见了多久？说了些什么？”“这次访英，有什么期望？……他回答的话虽不多，但是我们很满意，因为他肯开口，是个好的开始。

4月1日上午沾朱总理的光，走了一趟格林威治天文台，应媒体要求，

他还站在分隔东西半球的子午线上拍照，我又趁机提问了：“第一次来吗？”“First time。”（刚听完英文解说员说话，他还来不及转换语言频道）“为什么选择来这儿？”“他们（英国和中国外交部人员）安排我来我就来了！”（诚实得可爱，引来一片笑声）“第一次到时间的起点来，有什么特殊感受？”“当然有，我小学念书就知道这里是 Zero Degree（零的开始）。”一位香港朋友，看完电视新闻跟我说：“看来朱总理对你真的不错，是有问必答，”第二天英国《独立报》在刊载朱镕基参观格林威治天文台一张大笑的照片后，转载了香港《南华早报》对我的一张访问照，它的标题是这样写的：“TV Star Woos the Old Men of China”，意思是“能讨朱镕基欢心的电视明星”。内文写到我让两位很重要的人很开心，一位是朱镕基，另一位是传媒大亨莫多克。（因为他是凤凰卫视的股东之一）。我的同事开始学朱总理的口气笑我：“吴小莉，你现在，在伦敦很有名喔！外国的一些摄影记者在我们守候来镕基时，向我的摄像师说：“你站哪？我要站在你旁边，有好处！”都是人单力薄地到欧洲，香港同业这回非常团结，除了在分散的各点上互相支援画面外，大家开始开玩笑：“小莉，朱总理待会儿出来时，你记得要叫住他！”“好，我负责请他留步，大家一起问问题。”融洽而互助的相处，化解了不少我在媒体焦点下的尴尬。

朱镕基为媒体所爱戴，不只因为他对中国事务的熟悉和使命感，更因为他对媒体人的人性化对待。中国内地的媒体朋友说，朱镕基不想大肆报道欧洲之行，所以将随专机采访的内地媒体由六、七十人减为十几人，但是走出了中南海，却摆脱不了我们这些香港媒体的纠缠。看着我们早早晚晚跟着他，甚至用上苦肉计地等候，他会很不忍心他说“辛苦了”，他也开始习惯大家不停地追问，有机会时，总是想法子回答。

他回答问题绝不敷衍，总是仔细聆听，然后就你的问题，作适度回答，所以常常看到他有时侧着头，或是支起耳朵仔细听问题。即使是在法国，发生撤传单的抗议事件，媒体同业追问“有什么感想？”时，他老实地说：“听不清楚问题？等到听明白了，即使已被保镖护送到门外，他也回过头来，大声回答“我没看见。”一次为了赶下一场会见，没法回答完问题，他还显得十分抱歉。“和亚洲领袖会谈后对金融危机有什么新做法？”“大家立场一致！”“什么样的立场？”“帮助，尽一切可能地帮助！”“什么具体方案？”“方案有的是！”但是他两手一摊，满脸歉意地说：“现在来不及说了！”接着被随从人员簇拥着离开。

不过别遗憾，他总是会在别的公开场合发言时补偿你。媒体对他所有提问，他可以很快融会贯通，溶入他的演讲或即席发言里。一次是在对英国商界的晚餐演说，我们相信，即使他事前准备了讲稿，在现场也被他临机应变地改得差不多了。他在演说过程中，补充了下午他没法回答完的具体援助方案。一次是亚欧会议结束当晚，他会见英国侨界，原本预计 10 多分钟的发言，他即席演说了 23 分钟，除了对侨界应有的鼓舞外，其中又间接回答了许多媒体的疑问。

他的 presentable 还不仅于此，如果你给他一语双关的好题目，他绝对可以给你意料之外的好答案。媒体问：“你刚才横跨东西半球的子午线，你觉得东西方现在关系如何？”“关系很好呀！我刚才就横跨了东西方，而且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它们连在一起！”什么都看在眼里的总理朱镕基无疑是受人瞩目的，也由于他的形象，媒体对他有更高的期望。访欧行程结束近一

周，报刊上仍不断有访欧的各式评论。任何与他有关的人、事、物，仍然是媒体的焦点，回到了深宫大内，他也没有断了和外界联系，从新总理记者会上他对媒体的如数家珍，和一到伦敦就指着我说我在香港出了名，都可以看出，他获得媒体消息的及时性、和对舆论的关注。

4月13日，他更罕有的在接见南非外宾时，谈到了那八杆子打不着、毫不相干的访欧期间，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人员和香港媒体同业的事件，甚至解释了他的确没说大话，因为他听到有人问对传单内容有什么感想，他说的没看到，是真的没看到传单内容。

这个举动，再次显现他率直的个性，觉得受误解，就要说个清楚，好不容易在公开场合有媒体在，所以不论和主题有没有关系，都不吐不快。

而我更看到的是，他对香港舆论的重视，这种有闻有问，或许也是中南海领导人和香港媒体界展开另一种对话交流的开始，值得鼓励。

访欧行程的8天，说实话，这才是我直接接触朱总理的开始（当然19日的记者会，和以往电视上的认识不算）有人问我，朱镕基是什么样的人，记得在参观法国罗丹博物馆时，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走到朱总理身旁，开始和他聊天，随行人员把我们团团保护住，反而使我有机会和他单独对话，我问他：“刚刚看过世界第二大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内地有没有想过建这样的图书馆？”他坚定他说：“会的，一定有机会！”“怎么看罗丹的艺术？”他说：“巴黎是艺术之都，一定要来看一看！前几天工作得太紧张了！”接着他转过头看了看我说：“不过你们更紧张！”聊着聊着，我们走到了罗丹著名的沉思者雕像前，我把跟在后面的朱夫人劳安迎到前排，大家开始听解说员说沉思者的故事。我也陷入沉思，这就是朱镕基，一个什么都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的人！

（摘自九八年《明报月刊》第五期）

九江抗洪最前沿

有时觉得自己对新闻的敏感像个魔咒，九八年4月随朱镕基访欧回港后，和同业谈到，想去印尼看看，因为那时印尼经济太差，像个火药库，我直觉有事。5月印尼发生暴乱。

6月，中国内地大水，血液里流动的想上前线的新闻细胞再度涌现，几次和同事讨论“有没有上现场的必要？熟悉内地水情的同事说：“每年这个时候内地多少都有大水，防洪是年年都有的事！”七、八月百年来罕见的长江洪涝发生了。

8月10日接获公司命令，要上九江抗洪前线一个因为长江大堤一度决口，引来全球关注的地方。我的心中没有意外，却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前线是晒？是雨？缺水缺粮？还是一片水乡泽国？我无法确实知道，带足了能想像到的药品，我们上路了。11日，一行人飞抵江西省首府南昌，一出机场，迎面扑来的是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就像置身在蒸笼里，所有人只能缓慢蒸发，无处可躲。

江西电视台朋友礼遇香港来的两位女士，请我们上车暂避，我和同事

倒不在意，因为知道，这只是个开仁已安排探访省政府里的抗洪指挥部，这个探访，收获颇大，除了对江西的灾情有了整体了解也确认了九江的行程。

由南昌到九江，还需车程一个多小时，第二天天刚亮，一行人就赶早到达九江，赶办采访证，在九江找到临时落脚地，采访队就往长江大堤 37 号闸口前进，因为长江大堤决堤处淹水，只能由水路沿已停航船舶的长江前进。

闸口前早已站满人，包括媒体同业、想上大堤慰问的民众及医疗队等。“11 点才有补给船开航！”前方传来消息，也就是一伙人得在闸口等上两个小时。心里有些着急，因为这次拍摄任务重时间紧。凑巧，一队武警，从前方撤退，搭船回来，有人认出我，开始询问：“能不能合照？我爽快回应：“可以！”继而反问：“我可不可以搭照？我爽快回应：“可以！”继而反问：“我可不可以搭你们的船上大堤？答案也很豪爽：“没问题，你们有几个人？”这是我唯一庆幸自己还有些知名度的时候，因为更方便我的工作，当然也造福了其他同行，一伙人全上了船。

一上大堤，我被千多名解放军排列成的人龙，由运沙包船，直达缺口处的景象给震祝鱼贯而机械的动作，茫然而疲惫的神态，现场没有硝烟却尘烟弥漫，时光似乎倒流到几千年前，民兵正在修筑万里长城。而这次的长城，抵御的是洪水。

“四天没休息！”“两天没合眼了！”士兵们边回答，边跟着大队的长龙走，背上的沙包没离肩，往大堤决口处走的步伐也没停顿。

顾不上热心民众送来的菊花茶，士兵们只是一个劲地移动着，间中听到齐声的呐喊声，一来是配合士兵们丢沙包的韵律，二来是自我提振精神。

南京军区派驻在大堤上的副司令员说得好：“士兵们食物补给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休息。”摄氏 40 度的高温，无处可逃的暴晒，我在大堤上仅近 5 个小时，已经全身通黑，满脸煤灰，变了一个人。

士官说得轻松：“他们在部队中也得操练，如今只是换个场地操练，现在做的事，还更实际些！”副司令员用军用冲锋舟，把我们送回市区，约好第二天一早，再送我们到长江中已被淹没的江新洲岛，探望住在大堤上的灾民。

采访队回到九江市，一路无语，没人提议吃饭，即使早过了吃饭时间，一伙人冲回饭店，洗身冲凉，休息半晌，才回过神来。

傍晚，趁天色尚明，到九江市区惟一的灾区，因长江大堤决堤而淹没的开发区。

来到和开发区接连的市区西北边，这里因为地势较高，成了新的“岸边”。

正要前往子堤巡查的解放军士兵好心地招我们上船，载我们一程，行驶在 9.5 平方公里的淹水区里，不时看到仍在二楼居住的居民，这家厂房的招牌还斜露出一角，那家银行也给淹没了。

一些民船载着晚饭，食物补给品往淹水区送，说要送给亲人。一位父亲，用临时编的竹筏，带着七八岁的男孩，牵着自行车，扛一包米，硬要用竹竿撑过河，众人劝他别冒险，他却坚持要回家，小男孩对筏底已经过两米高的深水也并不在意，扯着父亲衣角，坚定地过河，家里淹水好几天了，原本是城市的居民，似乎也已适应了另一种水上行舟的生活。

而我则有梦里不知身何处的迷惑。夕阳斜照下，一片辽阔的泽国，远

处几只小鸟飞来，宛如这里本来就是水乡，谁想得到几天前，这里原还有 200 多家厂商、7 万多人居住着。

嗒嗒的马达声推动着冲锋舟前进，突然，船上唯一的动力——一具单引擎掉入水中，船长说，“引擎掉了！”七八个人，以为他开玩笑，继续谈笑风生，却发现没了动力的扁舟，正慢慢随流漂向树丛边，最后搁浅。这时，冲锋舟已到了淹水区核心，附近不见民船，船上官兵急了，连忙用手机向军营呼救，由于有官兵在，一伙人倒也放心，好整以暇地等待救兵。直到一个钟头过去，救兵还找不到我们确实位置，而天色是越来越昏黄，淹水区是停电区，大家开始心慌，官兵用最原始方法，拿起扩音器，向远方呼救……终于，又听到动人的马达声，“有船！”众人齐呼！ *

8 月 13 日采访队成员穿上救生衣坐上仅能坐四个人的冲锋舟，往已被淹没的江新洲岛。九江市水利局人员再三嘱咐：“若是上不了岸，别勉强，安全第一，来采访新闻，别出了事，成了新闻。”话声未落，船已启航，船太小黄澄澄的长江水拍打着船沿，直扑脸庞，十几分钟后，江新洲被冲毁的大堤出现在眼前，决口处竟有艘民船，原来有人在这儿作生意，为村民摆渡，往来大堤和市区。

我们的冲锋舟驶入决口处，直入岛中央，想找些仍住在岛中的居民。举目所见，淹没的民房，倒落的浮木电线，冲锋舟几次纠缠在不知是否还通电的电线围中。

一直勇往直前的我们，第一次有些害怕，因为所在地是长江中央，不比市区。我下意识地查看了一下手机是否仍然管用。冲锋舟终于脱困，我们决定沿大堤寻找居民。

江新洲在 8 月 5 日决堤后，部分居民仍住在水尚未淹没的家中，或是住上了大堤。

单在堤上行走，很难察觉异样，有摩托车的人，在长长的大堤上行驶，为居民提供“机车的士”服务，大难中抢救下来的小猪躲在临时搭建的凉棚下，牛只则啃食堤边仅存的杂草。

堤上酷热，有一家 8 口人，刚从市区避难中心回到大堤开始搭建木棚——一个临时的家，男主人蹲在堤边，对着长江发呆，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说不知道，问他：“现在怕大水吗？”“做梦都怕！”他说：“太可怕了，真的是洪水无情！”说着说着，一个大男人忍不住流泪，时间仿佛凝住在那突然决堤的夜晚，堤上锣声响，“决堤了！”一家 8 口老老小小，只顾逃命地往堤上跑，什么也顾不上带，命是捡回来了，但是家没了，原本因种棉而颇富裕的江新洲居民，要面对没有收成的下半年，和一无所有的家园。

五四年大水以来，江新洲没决过堤，九三年、九六年几次大水，情况危急时大堤都保住了。所以九江市政府通告，居民疏散财物，上大堤时，居民们大多抱着侥幸心理，因为没见过长江真正发威。

一个小女孩倒是早早把自己上学用的课本，暑期作业搬上了大堤，“怕做不完暑期作业，快开学了”她说，我去看望她时，她正坐在江边温习功课，暑期作业还没做完，她一心惦记着：“要上学了！”采访队在大堤上呆了几个小时，热心的居民在木棚里搜搜翻翻，找出了条长板凳硬要我们坐，又拿出家里仅剩的半瓶矿泉！”但这叫我们怎么忍心，婉拒了对他们来说弥足珍贵的洁净水，倒是长板凳让我们免于：“就堤而坐”的命运。不知如何安慰他们，我只说“辛苦了”，居民一把抹了一下早已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毫不

犹豫地回应：“你们比较辛苦！”记得我在中国文化部民政部抗洪赈灾义演晚会上，曾由衷他说过一段话“那些灾民，对现今一天可能只吃两餐饭的现状并没有太多抱怨，但是对于如何重建家园，面对明天，却有很深的迷惘，”我在江新洲的大堤上，为“小莉看时事——九江抗洪最前沿”特别报道节目中，说了这样一段结束语：“不是依水而生的人，可能永远无法明白，水边人家，对水深深的依恋，他们靠水而繁荣，却也年年得抗洪，只是，他们没想到，年年都过得了洪涝灾害的家园，今年竟然会一无所有，对他们来说，抗洪、守卫家园，不只是天与地，生与死，更是有和无的一场战斗。”采访完毕，临走前，采访队把所有的干粮留给了灾民，看着小男孩跑到我们船边，接过了八宝粥，矿泉水、米果等，兴高采烈地往“家”中跑，我突然想起他父亲说的一段话：“希望孩子长大后到城里，学点手艺，不要再靠水为生了！不晓得他知不知道父亲的心愿，更不知道，他何时才舍得打开那罐八宝粥。

冲锋舟渐行渐远，我回头望向浩浩长江中仅存的陆地，原本不该住人的大堤，在我眼前逐渐消失。

回到香港，我用了两天的时间，休生养息，因为在大堤上晒伤而肿起的双耳，也慢慢消肿。我的生活恢复了正常，只是不知道，大堤上的灾民，他们的家何时才能恢复正常？9月开学了，小女孩的暑期作业做完了没有？

从亚太经合会到江泽民访日

——随行采访手记

1998年10月份，我已经知道11月份整月的行程。基本上，是一个星期，要呆在热带的马来西亚，一个星期，要去时序已入冬季的日本。但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行程更忙，整个11月，他基本上是吉隆坡、莫斯科、东京、仙台、札幌，游走在亚洲几个重要国家之间，进行外访。

正如他自己所言，时差虽然不大，但温差颇大。除了俄罗斯之外，我也跟随他的步伐，进行采访。11月13日，凤凰卫视APEC报道组连同先遣人员，共6人陆续抵达吉隆坡。从深秋的香港，抵达吉隆坡，一行人的感觉是轻松不少，因为可以渐次脱下较厚的衣裳，换上夏装，这是我第二次到吉隆坡，却是第一次使用吉隆坡新机场，这个新机场比香港机场早启用几个星期，刚开始，也是一片混乱，当地司机笑着说，正当马来西亚人，想要到香港考察一下机场运作时，香港新机场启用了，而混乱的程度有过之无不及。现在，混乱的情况不再，除了我们的行李最终还是分好几个不同的运输带送出，弄得我们一头雾水外，倒是马来西亚新机场特殊的造型，机场内连接的穿梭火车，让我有在香港机场内似曾相识的感觉。

一到吉隆坡，报导组已进入工作状态。首先，是换证件，领取大会资料，熟悉新闻中心，认识路透社帮我们剪辑传送卫星的几位外国朋友，还有和香港新闻处连上线，以便和香港同业互通有无。因为这次参加亚太经合会，除了中国代表团，还有中国香港的代表团。

一阵忙乱，回到饭店已近晚上九点，凑巧在香港飞吉隆坡5个小时的航程中，我结识了一位马来西亚当地经商的华侨。热心的他，晚上立刻帮我约了几位华文报纸的同业相聚。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颇为发达，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等华文报纸，在当地具一定影响力。当晚，和当地的媒体同行聚会，除了更多地认识当地华人的生活外，我也深刻体会到，出外靠朋友的道理。

在往后几日的采访中，有当地媒体的支援，我最早证实了美国总统克林顿，不参加这次 APEC 领袖峰会的消息。我也在即将卫星连线，但是手中资料翻查不到时，找到了他们，而他们成为我最好的资料库。当地华人朋友的热心，让我感动，因为，我们也不过是见过一次面的朋友，巧的，或许是同行的机缘，巧的，或许是他乡遇华人的缘分吧！

11月14日领袖峰会前的部长级会议召开。这次 APEC 会议经济议题，有金融风暴问题，美日间对提前贸易自由化的项目争持不下，政治上，有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与前副总理安瓦尔的争拗，中国与菲律宾因南沙群岛美济礁问题等，成为一场重要的外交舞台。11月15日，各领袖陆续抵达，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专机，是晚上10点多落地，但是遇上大雨，到了11点多一行人才抵达饭店。许多媒体已在饭店内守候，江主席微笑而过，但是一言不发。倒是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开始和熟识的媒体朋友打招呼。这个结果，事实上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中国外交部早就言明，江主席此行，不接受采访，但媒体朋友总不会轻易打退堂鼓。第二天，行程紧凑的领袖双边会开始进行，和什么人见面，会谈时间多长？都可以显现这个成员在这个组织和国际间的地位，而中国第一个双边会的对象，是美国。副总统戈尔更是一下专机，就直奔双边会常由于采访人员数量管制，香港电视台，采轮流进场拍摄，画面共享的方式，凤凰卫视，轮派为第一常我和摄像，在会场外，等候江主席入场，上午11点多，江泽民步出电梯，我只轻声问候：“主席早，睡得好吗？”江主席听到人群中声音，转头微笑说：“很好！谢谢！”即步入会常没多久，戈尔率美国代表团成员进场，媒体被允许入场拍摄，彼此寒暄的前5分钟画面，戈尔在把美国代表团成员贸易代表白茜芙等人介绍给江泽民，双方准备落座时，江主席突然对着我站的方向看来，笑着说，有香港媒体在，然后指着我说“是你吧！是你吧！”我回应：“是的，主席！”中国代表团成员喊出吴小莉的名字，江主席接着说：“吴小莉，吴小莉，现在成了有名人物了！我轻声回答，“谢谢主席”。

江主席随后才转头，开始和戈尔展开中美领袖双边会。这场双边会历时两个多小时，比原订时间延长一个多小时。因为时间所限，我必须赶到车程须一个小时的新闻中心，先处理完中美双边会这则新闻，再赶回吉隆坡市中心，江泽民下榻的来来香格里拉酒店，因为按照安排在一连6场双边会里，最后一场和泰国总理川立派的会面，又轮到凤凰卫视入场，6点40分，我和摄影队即时赶到会场，在等待川立派时，江泽民走到了门边，做礼节性的迎接，这给了我一个亲近他的机会，我轻松地问：“会谈得如何？”他笑着说：“很好，Everything is great！”我接着问“一天的会谈下来，您的精神很好呀！他兴致高昂地说：“我精神抖擞，应该这样说，以我的年龄来说，我这样的精神状态是很好的了，棒，你听得懂吗，就是好耶（广东话）的意思！”说着，说着，泰国总理到了，双方握手寒暄，他又进入正式的外交活动中。等到所有媒体退到门外守候，今天最后一场会谈结束时，我几经思考，觉得江主席今天的兴致很好，或许有机会，问问他关于这次中国参加 APEC，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事实上，因为事前已知道，江主席是不轻易开口的，我就多次和媒体同业商量，有没有什么方法，能采访到江主席，一位中国内地的同行，给了我很好的启示，我们决定用最实际的方法，去问实际的问题。

人民币过去一年市值的稳定，是避免金融风暴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力量，

未来，人民币的走向，关乎市井小民的荷包肥瘦，也关乎各国的经贸发展。我们决定问人民币市值的问题，但是我从香港飞吉隆坡，身上只有港币、美金和马币，热心的内地同行说，他从北京来，饭店里留有人民币，最后遍寻之下，他发觉身上百元人民币纸钞都太旧，只有一张 10 元人民币是崭新的钞票。这就成了，现在香港媒体盛传的 10 元人民币的故事。11 月 16 日，江泽民在完成当天最后一场双边会，见完泰国总理川立派后，步出会场，守候在门外的我，当然不忘大声提问，看今天一连串的会谈如何？江主席只是很讶异地看着还主门外等候的我们，歉然他说：“很不好意思，你们还在等呀！”就准备离去，此时我赶紧扬起手中一早准备好的 10 元人民币，高声地问道：“江主席，我们都很关心，我手中的 10 元人民币，明年，是否还值 10 元？”江主席听到后，立刻回头，转身走向我，坚定他说：“当然，人民币不贬值！”“到明年为止，都是吗？我追问。江主席心中有话要说，又满脸笑容地走回来，对着我们说：“我说人民币不贬值，是很科学的，任何事都不是绝对的！这要讲 scientific（科学性）”说罢，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在笑声中步入电梯离去。

之后，我们加订了一段卫星时间，把这段访问送回香港，这段采访在当晚的凤凰卫视节目中出现，第二天，香港苹果日报和明报在报导亚太经合会的政经版中，刊登了一则花絮，题为“吴小莉访江泽民出新招”内文说到：“素以乖巧机灵见称的吴小莉，昨日以一张面值 10 元的人民币，居然使已明言不接受访问的江主席开腔，发表明年人民币不贬值的言论。”这张 10 元人民币，至今仍保留在。是江主席对我们这群晚辈，早早晚晚在门外守候的辛劳，给予了最大的体谅。中国内地的随团记者，事后开玩笑地告诉我说：“江主席还夸奖你呢！”原来，在吉隆坡，一场只有内地记者能参加，江泽民对当地侨界讲话的闭门会面中，江泽民还举了我以人民币问他会不会贬值的故事，告诉马来西亚华侨，中国内地的情势很好，人民币不会贬值。另一位随中国代表团专机采访的随团记者，更告诉我，江主席看到我们在门外等待不断说，“媒体记者太辛苦！而这分体谅，我在随访日本时，有更深的体会。

11 月 24 日我在结束 APEC 采访后，趁江泽民一行访问俄罗斯期间，回到香港，完成了“小莉看时事”——亚太经合会领袖峰会回望特辑后，飞往日本东京，在那里等待首位中国元首，踏足日本的历史之旅。

日本纬度偏北，比香港气温低了摄氏十度，时序，一下子进入冬季。中国外长唐家璇，先到达东京，和日本磋商中日联合宣言的最后内容。大家都关心磋商的进度，25 日，凭藉着我在朱总理访欧时期，和亚太经合会与唐外长的几次交往，我直接打电话给唐外长，说明想进行访问的来意。或许是见面次数多了，朋友相熟，或许是几次提问的水准，令他放心，他爽快他说：“那你就来吧！不过我下午有客人，你 4 点半到我房里来，我和秘书说一声！我连忙讨价还价。唐外长想了想说：“那你 3 点一刻来吧！”后来，我才知道，外长把安排见客人的时间调整到接受我访问之后。我依约找到了外长，他笑着说：“既然来了，就做专访吧！我信任你的专业！”就在和唐外长的彼此信任中，我完成了此行第一个独家访问。

傍晚 5 点 40，中航专机抵达羽田机场，江泽民在向媒体们说第一句日语“晚安”后就展开他 6 天的访日行程。

日本外务省的保安不但严密，对媒体控制更严，许多场合，是日本媒

体优先，在中日媒体人数对等条件下，香港媒体也常被排除在外，在仅有一名摄像，准予轮流进场拍摄的情况下，我们常要等到中国外交部的吹风会（记者会）上，才能一窥会谈端倪。

26日，非常重要的中日峰会更是如此，由于双方对许多问题的不同意见，峰会时间不断延长。之前，消息传出，日本可能仍采用九五年当时首相村山富士的口头道歉模式，我请日文翻译联系村山，非常及时地在26日播出了他的专访。不出所料，小渊政府在中日峰会后仍采用村山富士的框架，处理中日历史问题，使得这个紧接在中日联合宣言后的专访显得更有新闻性。但说起这段被我戏称为运气好，碰来的新闻，却有段巧妙渊源。

日文翻译告诉我，在日本约专访，不在几天前，甚至几周前进行，通常成功的机率不大。但凑巧，10月份，村山富士和桥本龙太郎连袂赴京，拜会江泽民，村山在游览钓鱼台宾馆时，我刚好在馆内拍摄小莉看时事“董特首赴京述职记”的外景串场，他看到我在写有钓鱼台几个字的大石头前工作，就叫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参事，要求和我合影，我也觉得他醒目的白眉须十分眼熟，也请凤凰同仁帮我留影。之后，翻译官才将我们彼此介绍给对方。就当这张合影还在我相机里，尚未问世前，村山回到了日本，凡是碰到中国媒体访问他，他就会拿出我俩在钓鱼台的合照，问：“你认识这个女孩吗，可以告诉她，我在找她，我想把相片送给她吗？”于是，在我还未到东京前，一位CTN的同业，传来这样的信息：“村山在找你，希望你到东京和他联系！”就这样，我礼貌性地请翻译给现在身为日本众议院议员的村山打了电话。

村山的秘书马上知道是怎么回事，并在当天，村山已经排得满满的行事历当中，挤出了10分钟的时间，接受我的来访。这天刚好是中日高峰会举行的日子，所以到了他众议员办公室，发觉那儿门庭若市，我们之前，他正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访问，而我们之后，中国中央电视台驻东京记者也在门外等候。NHK的记者听说，是村山指名要见我，十分好奇，透过翻译，想对我做访问，但当时已傍晚5点，之后，我还要赶往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的记者招待会，只好婉谢。

说是10分钟的访问，村山和我却在先赠送合影照片叙旧，又彼此赠书的气氛下，进行了近30分钟的交谈，对中国颇为友好的他，模仿我著作上汉字名字的写法，用中文在他的赠书中落款送我，我则是之前，已经请翻译在我书中，用日文写上，“从北京到东京，缘分使我们成为异国的忘年之交”。

这次采访的顺遂，令我感触良深，许多机缘，竟是平时与人交往的善意所累积的缘分，这是我当初在钓鱼台接受合影时，绝对没想到的事。

日本采访行，我们和中国代表团是近在咫尺，远在天边。晚上我和代表团高层通电话时，他惊讶地问，“你来啦？怎么没见到你！”“日本外务省不让我们靠近！”我立刻哭诉。所幸，峰会第二天，11月27日江泽民一行在东京有比较轻松的参观活动，在他参观日本东京湾跨海高速公路和海萤人工岛时，我才有较近身采访的机会。

东京湾跨海公路和海萤岛是日本现代化基础建设工程，去年底才完工通车，耗资9亿港币，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基建，江泽民又是学工程出身，代表团选择到这里参观，别具意义，江主席更是兴致昂然，问得十分仔细。

这段参观，分三个点。一个是资料模型馆，一个是海萤岛制高点，可俯瞰东京湾全景，第三点，是个巨型隧道钻洞机的钻头实体。我们随中国外交部安排媒体的车队，提早两个小时到达，勘察了一下地形，媒体同业一致

认为第三点最具特色，位置最好，但由于香港媒体每个点上只安排一组摄像，大家共享画面，我们称为做 pool，凤凰的摄影，被安排在第一点上，我则在第三点上等他，在拍摄完第一个参观点上所需的画面后，我的摄像以百米赛跑的速度，直奔回我身边。

没多久，江主席参观完海萤岛制高点，缓步走下阶梯，慢慢走到此行的最后一个参观点上，由于江泽民一行行经路线离媒体区还有一段距离，身旁朋友赶忙说：“小莉，叫，你要叫，主席才听得到！”我扬声向江主席问好：“主席好，海萤岛，看得怎么样？”“东京的基础建设，高新科技对中国有什么帮助吗？江主席被人群中，响亮的声音吸引，往我的方向望来，最后笑着，缓步靠近我们，他的第一句话，也是问候：“很有幸，已经好几次见到你啦！主席显然还记得我在 APEC 会议期间，对他的早晚守候，“我还要多看看，因为我很重视成本回收的时间问题，以工程技术的观点，我的问题会比较多”他继续说。“日本之行，收获大吗”我继续问着，大家关心的中日关系问题。“挺好，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他爽快回答。

“满意吗？”媒体们追问。他则笑着继续他的参观行程。

参观完毕，海萤岛送给江主席两个创造出来的海萤小宠物，两只公仔娃娃，临上车前，我问他，“这两个小娃娃叫什么名字，喜欢吗？”他开心地回头说：“很好，很好！”这是访日行程中，我对江主席的第一次近身采访。第二次，则是在 28 日江泽民的中外记者会上。为了这场在东京举行，由日本记者协会一手主导的记者会，我连续 3 晚，在日本时间凌晨近 3 点才入睡，因为忙完每晚东京现场主播台卫星连线，和凤凰同仁讨论安排完第二天的工作再和同行及中国代表团人员联系，互通消息，已到 12 点多，常是晚上回到房里才吃晚餐，我们入住的新大谷饭店的送餐服务，大概被我吃遍，然后是一边吃 Room Service，一边和香港总部联系，通报情况，商量记者会可提问题的内容，再消化当天传来的新闻剪报资料，准备第二天的工作。

根据日本媒体朋友传来的消息，这场记者会主持人是日本记者协会理事长加藤博文。按照日本惯例，记者会通常有 6 个提问，前面 4 个，由中日双方各两个媒体提问，之后，就由现场媒体，举手抢问。我虽然半信半疑，但还是在记者会开始前两个小时，到了会场排队，我们是最早到达的媒体，时间逼近，会场外开始形成长龙，但是安检人员，还是用日文表示，日本媒体先进场，接着是摄影记者，最后才到香港等非当地传媒。由于提早排队，我仍算是比较早入场的媒体，我迅速在大会预留的前排座位后，为其他同行占了一排座位。之后，赶忙搭救正和日本安检人员“有理说不清”的摄影记者和日文翻译。把摄像机安顿好，我才安心入座，先思考好我在记者会开始前要做的外景串场词，赶快趁媒体们进场落座的空当，完成串场作业。之后的重头戏，就是等江泽民一行到来。由于上午江泽民在早稻田大学演讲时，有日本右翼学生闹场，江泽民的演讲，虽未受影响，但看得出他的情绪一度激动。到了下午记者会，70 多岁老人，以他的政治智慧排除了所有情绪，一如常态的回答所有提问，即使是敏感的中日历史问题，江泽民展现了国家元首的风范，不带情绪，但十分坚定地重申“不忘历史，才能展望未来”。

记者会中，我的座位正对着江泽民，我和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外长唐家璇，彼此点头打招呼后，记者会正式开始。

同行所谓的日本惯例，似乎有些可信度。在大家频频举手后，只见点名官往左右两个方向轮流点名，恰巧是一日一中轮替，到了中央电视台同行

问第 4 个问题，关于中国送给日本一对朱鹮的意义后，终于到了开放抢问时刻，我迅速举手，或许是正中央的前排座位，和频频举手的勤奋，素未谋面的日本记者协会理事长，还是自由心证地指向我，请我发问，在之前一连串中日历史问题后，我把主题带向中日关系中另一个关键，台湾问题上。之后，两位台湾电视台驻东京特派员，接连询问两个台湾问题，记者会才告结束，我成了惟一提问的香港媒体，接受提问的数目刚好是 7 个，与传言相差不远。

记者会后，我火速赶上前往火车站的媒体专车，准备和中国代表团搭乘同班新干线专列往仙台。由于时间紧凑，担心凤凰摄像同仁，如果参加记者会，收完机器再排队离场，会赶不及专车，我运用了以前的老关系，情商以前的老东家，华视的同事帮忙，彼此互利，我带他们入记者会现场（他们原本没报名，不在记者会名单中），我过去华视的摄像搭档晓华，就充当凤凰的摄像，在会场内为我拍串场，并录下全场记者会实况，帮我们卫星传回香港凤凰总部，当然，记者会内容和画面，华视的同仁也可因而得到，完成他们的采访任务。所以在拍串场时，我笑着对晓华说，我有些时空错乱，似乎回到了从前，晓华更语重心长他说：“还是跟你合作好，一次 OK！”这次东京行，在当地管制严格，媒体支援较差的情况下，反而使我们这群来自北京、香港、台北不同地方的媒体朋友，互相合作建立起一种患难的友情，而我和内地传媒朋友的熟捻，又成为联系两岸三地传媒界的一个渠道。

因为赶子弹列车，我和凤凰其他去传卫星的同仁兵分两路，在火车站会合，但阴错阳差地我留在饭店的行李没有赶上火车，留在了东京，CTN 台湾中天频道的胡志强，担心我到零下三四度的札幌，却只有在东京摄氏 12 度的装备，硬是在饭店找行李，找到半夜 12 点半，然后一早 5 点多，托第二天要直飞札幌的香港同行，把我的行李带到北海道。我打电话说谢谢，他只说：“朋友嘛！”朋友，是我在这次东京奇遇记中，最大的收获。而我已和所有留在东京的朋友相约，下次不是工作，而是把臂畅游东京。

仙台是充满文化气息的小镇。下了子弹列车，我们直奔日本当地协力电视台写稿，录声音、剪辑、传卫星。第二天一早，为赶上江泽民在北海道的乡村之旅，我们只好放弃他在仙台探访鲁迅纪念碑的文化活动，搭机直奔北海道首府札幌。听闻北海道已经下雪，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拿回我在东京行李里的“重装备”。一行人已在仙台机场，采购御寒品，买了毛手套、毛围巾，我稍感心安。果然近两个小时航程，我们到达札幌时，中国代表团的专机，还有半个小时就抵达。

我们已进不了机场禁区，香港同行决定直接开车到下午江主席参观的第一站，北海道池田农家等候，我和摄像两人，就提着脚架、扶梯、摄像机和凤凰其他同仁分道，他们往酒店 check in 行李，我们直奔农家，经过一个多小时车程，我们来到被冰雪覆盖的农家。北海道的雪白净洁，但走到户外，就能感受冰雪的威力，由于外来车辆不能暂停，一伙人全下了车在路旁等待，趁等候的空当，做外景串常路边积雪深，却探不出牢不牢靠，常是一个箭步踏下去，才知道，半只脚已深入其中，所幸，我穿了双高底靴，总算没受到雪的直接侵袭，倒是半露在外的双耳，老让我想念起，我那仍在行李箱里的耳罩。一路忙着打探消息，凤凰同仁好心留给我的羽绒背心都顾不上穿，一个多小时过去，代表团的媒体专车到了，我们才被带进农庄里。几经讨论安排，香港媒体仍采合作方式，3 名摄像各在一个参观点上，3 名文字记者，则集中到花卉暖房里等候，所谓暖房是维持室温摄氏 13 度，和香

港比较虽是低温，但比当时户外零下的气温，我们已直呼运气好了。又一个多小时过去，江主席终于拜访完农家主人，看了花卉分装，来到了温室花棚里，江主席一边听主人介绍温室的花卉养殖，随行的曾庆红主任，看着我们直打哆嗦，笑着问我：“冷吧？冷，耳朵都快掉下来了！”我说。唐家璇接口聊天：“不会呀！这不算冷！”“比起俄罗斯，当然不算冷！”我笑着回答。曾主任接口了：“对了，香港不下雪的！”江主席认真听主人讲解，又提了几个问题后，准备离去时，我趁机问：“这次看农业怎么样？花卉好吗？”江主席笑了起来说：“花当然好，每个人都喜欢花，妇女们可能更喜欢花！”随团的人都笑了。“中日农业方面的交流如何？”我接着问。这已经是他日本行的第5天，在俄罗斯、日本的紧密行程中，我看得出，他比前几天，更加劳累，他原本只笑着准备离去，不打算再开口了，但在我一句：“主席，我们等了你3个小时了，说几句话吧！”他从门边，调过头来，再度笑着说，“我要跟你们讲，这种现代化的农业，不同程度地在中国农村、许多城市都有的。

我认为日本的经验还是很先进的，有些东西跟自动控制等先进技术分不开，我来，也有向他们学习的意思。”他笑着离开，我跟他道了声“主席，再见！”离开池田农家，已近傍晚5点，日本冬天天黑得早，暮色中的雪地别有一番风味。新闻播出后，凤凰高层领导，来电慰问说：“你说等了3个小时，我们都感受到了！”我笑着说：“所以江主席都忍不住再和我们说说话！”老板说：“那当然！”在赶赴当地电视台发新闻的路上，我耳边再度响起一位内地媒体驻日本特派员，在花棚里和我一起等候时，告诉我的一段话：“江主席说你很辛苦！”“什么时候说的？”我问，“今天早上7点多，他出门的时候说的！他回答。我不禁笑了，因为，这段，马来西亚到日本，随访的点滴，不再只是工作，更像是长辈和晚辈的寻常交往，虽然许多故事，我要到事后才会知道。

在札幌电视台发完新闻后，日本当地记者透过翻译，向我们问：“为什么同一条探访农家的新闻，你们的看起来有趣多了？”虽然他听不懂我在新闻中说的中文，他接着问：“江主席对着日本媒体时，表情比较严肃，为什么对你们有说有笑？”我忍不住大笑了起来，突然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成就感，因为，我们不只让观众了解江泽民在札幌的情况，或许，在他举目望去都是异国媒体时，看到我们这群熟悉的朋友，也有一种他乡遇故友的亲切感吧！对我不断问问题的宽容，或许也是他在连串严肃议题下，难得轻松的时刻，而我更乐于见到，在世人瞩目的日本之旅中，我有机会让他多展露几次轻松快乐的笑容。

在北海道采访的最后一夜，札幌下雪了，结束了所有的工作，我突然有午夜踏雪的雅兴，做完所有采访的收尾，写下几张感谢协助的谢函，晚上11点多，我到中国代表团下榻处，拜访几位内地媒体好友，因为终于有机会轻松相聚。中新社的田副总编辑知道我没吃晚饭，一会是煮泡面，一会送上仙台大苹果，几个大男生最后决定，陪我踏雪北海道，吃一顿道地的札幌拉面，以补偿我的晚餐。

在同伴们酒酣耳热的招呼声中，我轻呼了一口气，满足的不只是我的肠胃，更是我满溢的心灵，因为这次日本之行，结交了那么一群老少好友。

1998年4月小莉看时事，制作了“泰坦尼克”现象的特别节目，这是我挺喜欢，也是少有采用的软性题材，它说出了弥漫在九八年初一股复古和浪漫的情怀，所以我把那集的内容和读者分享。

吴：我们看到的是勇夺今年奥斯卡11项金像奖的《铁达尼号》的一些经典画面，以及夺得最佳电影主题曲奖的《my heart will go on》。《铁达尼号》又翻译成《泰坦尼克》，去年底上映以来，不断创造全球电影界神话和风靡了一个全球的大众文化时尚。男女主角的画面和传统的画片，更成为现代男女模仿的对象，《铁达尼号》究竟有多受欢迎？自从去年12月上映以来的4个月中，依然处在热卖之中，在全港的50家大型电影院当中，有26家依然在争相放映，4月初票房已有1亿2千万港币，美国本土上映10周的票房已有4亿零250万美元，仅次于电影史上的冠军《Star war》—《星际大战》的4亿6100万美元；今年4月份才刚在中国内地上映，而且在全球愈演愈甚，欲罢不能的局面来看，它对《星际大战》这个冠军票房纪录的宝座具有很大的威胁。

有人估计，在香港少说有200万人看过《铁达尼号》，以香港630万人计算，就是每3个人中就有1个人看过；更重要的是，在香港不景气的电影环境当中，它把过去6—7年来不进电影院的观众带进了电影院；究竟《铁达尼号》的魅力何在，让我们问一问香港观众，稍后，我们将在棚里继续探讨一下《铁达尼号》这股席卷全球的风潮。

观众一：最吸引我的是男女主角；最感动我的画面是老太太将项链抛入海中。

观众二：印象最深的是快要沉船时，大家都在甲板上，母亲紧抱着孩子，以及男女主角在冰冷的海洋中。

《铁达尼号》除在香港引发了一股热潮，它在大陆也出现了反应热烈的空前盛况。4月份，它来势汹汹地靠拢了内地口岸，由于北京媒体的大肆炒作，被吊足胃口的北京市民争先恐后地涌进北京18家首映播放的影院，希望感受一下这股国际热潮，虽然票价定在80元人民币，创下北京市最高票价纪录，依然阻挡不住人们的观赏热情，首映后3天的订票更是一售而空。

吴：今年3月份两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参加香港和广东的人大代表团小组讨论的时候，都饶有趣味地提到了《铁达尼号》，他说：最近我看了一部叫《泰坦尼克号》的电影，过去叫《冰海沉船》，这是好莱坞投巨资重新拍摄的影片，这部片子把危难中的金钱与爱情，贫与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分感人。他认为这是很好的思想教育，建议部长们都去看一看。中国高层的赞赏使这部西方影片在中国取得了放映配额，本月初《泰坦尼克号》在北京靠岸了，并且获得首部在中国相关单位批准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在200间戏院内同步放映的地位，打破了西方电影在中国放映的常规。但是，并非《泰坦尼克》一开航就顺利的，导演卡麦隆以破纪录的2亿美元，即16亿6千万港币严重超支完成了这部电影，当时大家都不看好，他还放弃了自己的导演费800万美元才得以完成。有人说，《铁达尼号》的沉没是因为人类过分地迷信科技，相信巨大和豪华。但是，《铁达尼号》的全球热卖也是拜了科技所赐，而导演卡麦隆也是功不可没的，他曾先后12次深入大西洋海底，拍摄《铁达尼号》的残骸，并将片断用于影片当中，他还在墨西哥制造了一个有真船大小，九层楼高的大模型和一个1700万加仑的大水缸，再加上电脑动画的科技，使他的巨片气势和电影的

特效，成为第一个口碑，其次，它赏心悦目的豪华场面，惊心动魄的灾难场面，更有震撼人心的浪漫爱情，以及动人的电影主题曲。

名利双收的《铁达尼号》不仅在 70 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抢尽风头，光芒四射，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且缔造了全球电影票房的神话；在香港，它为香港分公司带来了五、六千万元以上的纯利，成为该公司在香港成立以来，赚得最大利润的影片；相信导演詹姆斯·卡麦隆也没有料到。据透露，投资这部影片的制片人，已准备了一张 1 亿美元的支票，准备付给詹氏做片酬；而当时由于超支过重，詹氏曾忍辱负重，主动提出放弃 800 万美元导演费，如今，《铁达尼号》在全球一炮走红，而詹氏又成为奥斯卡奖最佳导演的得主，总算是吐气扬眉了。《泰坦尼克号》以有史以来最高的制作费为号召，而导演为使形象逼真，挖空心思，复制了一艘几可乱真的游轮在墨西哥作为拍摄场景，相信谁都会好奇这艘耗资 750 万美元的豪华巨轮是怎样沉没的。因此，使人震惊的巨变和电影技效便成为了主要口碑；……吴：不只是男女主角因 Titanic 而声名大噪，凡是与影片扯上关系的周边产品都热卖，举凡是电影海报，明信片、男女主角的画片、中英文的书籍，甚至是衣服、被单都有，今年 2 月份的情人节，《泰坦尼克号》的周边产品更成为送给情人的好礼物，CD 啦，VCD 啦，还被卖到了断货；一个因成本制作费太高而被认为必定赔钱的电影，结果却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成为全球商品化的商品，更有学者认为这是美国在与各国知识谈判权结束之后所取得的全球影视配销管道，再加上好莱坞电影工业制造的奇观，使得全球的电影市场逐一失手，而《泰坦尼克号》只是好莱坞电影国际化潮流的第一波而已。

这部世界卖座的《铁达尼号》不仅在西方掀起巨浪，而且它也在全球华人社会大出风头，除了宣传攻势的凌厉，片中一些赏心悦目的奢华镜头，以及触目惊心的浪漫爱情，都称得上是致胜因素。《铁达尼号》的爱情故事能在一定程度上讽刺上流社会，贴近普通大众，使观众能得到心灵上的慰藉。

对身处逆境的观众来说，片中生命系于一线的抉择使观众明白，不因命运的起伏而一蹶不振；相反，应该培养积极的人生观；剧情中男主角劝女主角的那段话就是勉励每一个人都应当乐观、坚实地面对人生，这就是影片放映以来观众各取所需、满足自己心灵亏欠的部分；而另一方面，导演卡麦隆选择这一历史作为背景，凝造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浪漫爱情，这种史诗式的爱情正好给时下追求速食文化的青年男女带来了一个思考的机会，青年男女开始反省速食的空虚和不踏实，通过这部影片，大家对爱情有了一个重新思考的空间。

吴：有人说，看《铁达尼号》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会它的语言，因为它已成为和同济聊天的话语，“You Jump ; I Jump”，（你跳，我跳！）观众的感情已与影片融为一体，每个人似乎都能在影片中找到认同；处于金融风暴中的香港，有人说就象是经济风暴中的铁达尼，过去的繁荣是风雨过后的雨过天晴还是沉入冰冷的海洋呢，而在影片中，一个来自低层社会中的男孩却展现了他的勇气和对生命的热爱，而《铁达尼号》的危机感更是不分阶级的，当灾难来时是不分舱等的，让观众大有富贵如浮云的感受。

这个历时三个小时，历史上最昂贵的电影会跟着二十世纪末的时代一样，永远落在人们的记忆中。就象当年看《乱世佳人》被视为经典一样。也许下个世纪人们会问，上个世纪你看《泰坦尼克号》的时候是在哪里、和什么人在一起？而我更想问的是：当年老的 ROSE 一声轻叹把海洋之心抛入北

大西洋之后,你是否也和她一样,抛下了心中的牵挂?真正地甜甜入梦了呢?《铁达尼》自1997年12月18日,在日本、香港等地首航以来,最为人谈论纷纷的除了这艘号称海上霸王的铁达尼号失控撞向冰山惨剧以外,迪卡普里奥和奇文斯利一发不可收拾的爱情于是成为生死与共的承诺都成为观众谈论的焦点。同样也使两位男女主要演员奠定了在好莱坞的地位。

这部影片在走红男主角的同时,更形成了男主角的理念:男主角牺牲自己来鼓舞爱人的生存意志,成为新人类想做却又做不到的伟大情怀,里奥勇敢,具有冒险精神又感情丰富的形象深入年轻人的脑海,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现代情圣。

吴:《铁达尼号》自从去年12月中在亚洲放映以来,不仅带动了一个电影的风潮,更带动了一个电影的神话,最近为什么它会成功,我们邀请了一位专业影评人,香港的徐永耀先生来为我们谈一谈。

吴: Titanic 为什么会成功?徐:《铁达尼》不仅是一部电影,还是一个现象,它给大家一个感受就是,它完成了大家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一个梦。尤其是其中的爱情故事,是现实中难以完成的,需要死亡考验的,可生死相随的爱情。

吴:大家看电影时不胜唏嘘,其中的一些画面也为大家津津乐道,是剧情,还是拍摄手法的成功?徐:成功的地方不在剧情,它的剧本很薄弱,如果这是一个悲剧,它又没让人感到伤感,你说它是一个很好的爱情故事吗?但除个别地方使人流泪以外,这段爱情故事也没什么特别,但是它电影手法考究,如道具、服装,场面的调度,都可称得上是一部好的商业片;但这部片子并不是特别好。

吴:像你说的,它的剧情等并不特别好。但为什么成功呢?除了将历史和现实中的爱情揉为一体之外,它宣传上投资1亿美元,是否也是成功的原因,徐:也可以说如此。由于制作成本过高。制作公司考虑,它在美国本土无论如何是收不回成本的。于是就把它放到亚洲首映。他们认为,亚洲的女孩子会对男主角着迷;是亚洲作了一个声势之后,才放到美国本土放映的。

这是策略上的成功。

吴:今天我们花半小时来谈《铁达尼号》,不仅是因为它是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更重要的是它带动了世纪末的一股怀旧的风潮;铁达尼号的沉没是二十世纪初的一场悲剧,影片却以真实的史实加上虚构的爱情故事将铁达尼号启航短短五天的爱情、友情和灾难呈现在世纪末的这一代人面前,使得人们透过电影的手法、高科技的效果,看到了导演想要呈现给我们那一代人的故事,这也可以算做是电影和高科技的结合给人类的另一项贡献吧!记得导演詹姆斯·卡麦隆在得奖后说过一段话,如果这么一艘巨大的邮船都会沉没,那么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我们要更加珍惜生命。谢谢你今天和小莉一起看时事,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第九章、我的人生哲学

永远的笑脸

这本书香港版问世时，适逢 1998 年 7 月是香港国际书展，恰巧 7 月号的《新香港月刊》杂志以我作封面，《新香港月刊》的编辑部以我一张大笑的脸做封面照片，并在香港各大地铁站刊登广告。一位同事乐呼呼来告诉我，你的脸笑遍了香港。我担心我那毫不掩饰爱笑的个性，会显得很淑女，同事却笑着说：“不会，很传神，现在香港不景气，你的笑脸很有感染力，让人看了也想大笑！”笑脸恐怕是我翻开儿时相簿里永远的记忆。到了初中、高中，虽然多了些年少青涩，但仍然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朋友问我，“你的人生哲学是什么？”“快乐！”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记得 4 年前在香港电台要做一个关于谈生活的环节，两位主持人必须先片头词上说一两句对生活的感受，我想都不用想就录下这段话：“我希望我的生活是不断快乐的累积！”这是我的梦想，至今仍然在努力实践它。快乐是需要智慧的。高中时一位英文老师曾对全班说了一段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她说：“世界上什么人最快乐？只有重度智能不足者最快乐，因为他们单纯地不明白什么叫不快乐，但是在座的各位都没有这种单纯快乐的能力，所以惟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聪明一点，懂得寻找人生的快乐。”快乐是不假外求的，我有一位朋友十分聪明，而更让我欣赏的是他对人生的坚毅和积极乐观，他说他喜欢这样一段话：“When you are over thirty years old, you, I never get older but wiser.”（当你年过 30 岁，你永远不会再老了，只会变得更聪明。）我仅把这段话送给所有害怕过生日，会老一岁的朋友。

《电脑号快车》的意大利制作人 GP 对我说，“你的个性像小孩，容易开心，容易沮丧。你是知道今天功课 100 分，明天可以放假出去玩时会雀跃不已的人，但是永远像个孩子似的把自己不设防地投入现代社会中，却又容易受伤难过！”原本对朋友说我是 childlike（孩子样）而非 childish（孩子气）感到高兴，因为至少还保留纯真，但是听了他的后文，我又觉得甚有道理。或许随着年岁增长，我该开始学会在心中仍保有孩子的好奇和活力，却在把自己投向公众社会时，懂得自我保护。

朋友说：“你这张脸不笑时，眉、眼、嘴都像在笑，笑起来就更是月眉弯弯，嘴儿翘！”若问我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有！当然有！”我会说。

那怎么办呢？我会试着找出不快乐的原因，找朋友聊天，在倾诉过程中理出头绪，或是写下来把它条理化，再问问自己可不可能改变现状？如果可以，列出改善的方法，通常我在完成这样的自我疗法，合上笔记本时，我就可以重新快乐起来了，因为我知道一切都可以改进，但最重要的是需从自己的心情改进起！

一次，我到台湾文化大学所办的社会讲座向社会人士做演讲，题目是《人生舞台红不让——谈生涯规划》（就是人生之路的计划）。会后，一位从事保险业经理工作的听讲者，寄了一封谢函和一本书给我，谢函中这样写着：“所谓演讲，是既能演又会讲，从听完你演讲后每个人满足的表情，可以看出你的演讲十分成功。

“而那本赠书，书名为《活在当下》“Real Moments”，我心中感谢这位朋友在书里写的：“宝剑赠英雄，书香伴美人。”我更感谢因为一场演讲的心灵沟通，我有机会多认识一位朋友，多读到一本好书。

我非常喜欢 Real Moments 这本书中的一段话：“昨日已成历史，明日

还未可知。”此刻是上天的赐与，所以我们称它做“现在（The Present）。”（按：英文 Present 既为现在之意，也可做礼物 Gift 解释。）活在当下是我奉行并努力实践的人生观。我珍惜现在拥有的每一个 Present，因为它真的是上天的赐与。我的父母给了我热爱生命和欢乐的能力，我会宝贝它到老，老到我鸡皮鹤发，齿牙动摇，或许你仍会看到 80 岁的我开怀大笑的模样，即使那时我已老掉了牙！

但至少我知道我成功地活过每一个时刻。

我的工作哲学

前些日子为了写书，我向公司请年休假，在家里闭门造车，每天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我嘲笑自己是提早退休，学习过家庭主妇的生活。日子刚开始过得挺惬意，但后来我逐渐地因为和外界的隔离有些发愁，最后更是闷得发慌。

这终于敲醒了我一直嚷嚷工作辛苦要早些退休，回家享清福，或者嫁人后在家里相夫教子做少奶奶的美梦。

我找到自己不得不工作的理由——怕闷。销假回公司上班后我又开始生龙活虎，和同事谈笑和观众说新闻故事。我想提早退休的计划就只好无限期延后，因为我喜欢工作。

在中外记者会的点名事件后，许多我认识或者我还不认识的朋友，开始流传：“小莉现在身价倍涨了，让凤凰卫视在香港和大陆大为出名，有没有向公司要求升官加薪？”我诚实地说：“没有！”一来因为我觉得这是凤凰卫视全体同仁的努力；二来，因为这是我一贯的工作哲学，我只会问：“这份工作，我做得开不开心？有没有成就感？有没有发挥的空间？”所以至今我如果出差到没去过的地方，做一个很棒的专题，或是知道自己做的节目好看，和合作的小组工作愉快，我都会感到开心，这些都是我工作的动力和快乐的泉源。反之，才会是我感到沮丧和我会静极思动的源头。

我虽不是男儿身，但或许父亲恨女不成儿的愿望在我身上有些发酵。我不但长相像父亲比较英气，连个性也偏男子气，所以工作时我也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

现在回想我在华视的第一份工作，我之所以会每天拼了命地跑新闻，一来是因为自己的新闻病；二来是因为自己的受重视。从新闻部经理、副理、采访组长、企划组长，他们对我工作的肯定，喜欢我的冲劲，就更使我不能 let them down 让他们失望。一直到物换星移，许多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走马换将，再加上想再进步的心才使我静极思动。

现在，我的工作信念未变，在凤凰卫视亦然，因为我仍能感受到那分“知己”，而我更惜福的是凤凰给了我一个可以实现理想的舞台。

在卫视派我回台湾任驻台节目部制作经理的这段岁月里，也让我的工作哲学有了新的体会。因为一直以来的我都认为万事皆下品，唯有工作高。

或许是我的幸运，我一直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所以一埋头苦干起来就六亲不认。母亲抱怨我好不容易再回到家中居住却是早出晚归，母女俩见面时间短，谈话聊天还不如我在香港打国际电话回家报平安时的专心。一次偷闲上美容院整理头发，美发师不经意他说：“吴小姐，您有一根白头发！”这可把我吓了一跳，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根白发，是年龄到了，还是压力使然？

我的震惊不在于担心自己的老化，而是害怕一夜急白了发，这根白发使我猛然惊醒：“工作是现在，健康是一辈子。”我告诉自己得放慢脚步、放宽心情，因为许多事急不来。从此我的工作仍然勤奋，但是已学会减压，因为我的新工作主张是工作不能影响我的健康和美丽。而我的减压方式就是旅游，到我没去过的地方走走看看，一来休闲；二来认识新文化，这也是一种充电。因为环游世界是我人生的另一个梦，未来有机会我还会去圆这一个梦。

单身贵族

单身对我来说是现况，却绝不是恒态。

从小到大，男孩和我的相处只能用“好极了”来形容。因为我不拘小节的个性，所以有一票“死党”哥儿们，但又因为我外形长得十足女性化，所以即使个性男性化，却也十分有异性缘。

小时候和母亲惟一的争执就是因为男孩。小字五、六年级，同学们开始知道男女有别，异性会相吸，隔壁班男生放出风声：“某某某喜欢某某某。”于是一群男同学在我眷村家中后院呼啸而过。一会儿大呼我的名字；一会儿小叫他们计划帮忙表达心意的那位男主角的呼号。母亲生气地问：“他是谁？”一副恼我偷偷去谈恋爱，我无辜他说：“我连对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吴家有女初长成，家中开始出现无名电话，母亲又着急了：“这是谁打来的电话？”我甚觉无聊：“你接的电话，我又没接到，你怎么不自己问？”母亲开始偷看我的日记、拆我的信件，我对此大力反对，认为这侵犯我的个人隐私，为此我们母女俩的关系降至冰点。一来因为我反对侵犯隐私权，我认为即使是父母也不应该剥夺儿女这个权利；二来我对那些乳臭未干的男孩子一点兴趣也没有。也因如此，使我当时对男孩反感至极。

一直到十六、八岁，和所有少女一样我开始迷恋台湾琼瑶小说的爱情故事，心中会设想千百个白马王子的模样。虽然高中女校开放日会有许多男校生想到我班上的摊位认识一下我。而每次走在路上经过一群男生面前，我会感到所有目光的移动，但是当时心中只会骄傲地想，我会等到我的白马王子。

真正的恋爱季节是大学时期。挣脱联考的束缚，母亲也放宽了管制，那时向往的是作家鹿桥所写《未央歌》里，在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学一群大学生在大时代里的爱情、友情和爱国情。我喜欢故事主角“小童”为自己穿鞋不穿袜的行为辩解：“这是与大地亲近。”没有大时代轰轰烈烈的背景情节，却仍有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闲逛的雅兴。

年龄渐长，离做梦的岁月愈远，对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却愈发清晰。我的身边一直不乏追求者，朋友看着我的苦恼问我：“你知道自己喜欢和需要的伴是什么样的了吗？”以前我会摇摇头。“所以，你就只能穷于应付那些追求你的人！”朋友继续说。

现在我对另一半的勾勒更加明确，我已不再寻找白马王子，而是一位 Mr . Right 真命天子。因为我自认已走到人生的成熟和丰盛期，我完全知道自己能对我的伴侣贡献什么，而我的 Mr .Right 又该是个什么样的真命天子。或许台湾《中国时报》对我的一篇专访已经透露了我的爱情观。“吴小莉静待理想伴侣出现，希望他是爱人也是朋友”“一个女人在一生当中如果只有狂风浪蝶，而没有真命天子的话，是最大的悲哀。然而一个女人在一生当中，

如果只有真命天子，而无狂风浪蝶，也不无遗憾。

在香港的那段日子，无意间读到一篇文章，深深地触动吴小莉的心。

从台湾到香港，放眼天下，从香港回台湾？实践理想，人生的路途上飞愈高，内心更加渴望有个温柔的肩膀可以依靠，彼此倾吐心事，互相扶持，尤其当一个人愈往高处走，更加重视生命中有位真命天子的出现。

单身像堵无形的墙，墙里墙外心情分外不同。如今的吴小莉分外珍惜现在单身时光，尤其当经济独立，工作、思想独立，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目标之后，更能怡然自得享受单身的日子。然而单身虽自在，但自己绝对不是不婚族，特别是从小到大感受到家庭的温馨，父母之间的恩爱和一辈子的相知相守，也因此使她更期待生命中 Mr. Right 的出现。

在感情的路上虽然抱着随缘的心情，在身旁也不乏对她好的人，但也有朋友笑她傻，总是被动让人选择，为何不积极采取主动选择所爱的人，或许个性使然吧！

吴小莉从未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但吴小莉心中倒是很清楚勾勒出未来理想伴侣的特质：那就是聪明、能谈心事、工作上能给你不同的观点，和他在一起就很开心，是爱人也是朋友的关系，纵使外面的世界有风有雨，回到家之后总是能拍拍对方肩膀说：“你很棒”，彼此鼓励，为对方加油打气，夫妻感情紧密，家庭气氛融洽，这就是她的婚姻主张。

在过往有几位知名主播踏入豪门，麻雀变凤凰，但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戏剧人生虽然令人羡慕，但吴小莉慧黠地说：“怀抱金枕头，或许物质上不虞匮乏，但真挚的爱，才是女人终其一生最爱。”的确！每个人都是一个半圆，如果能找到另一个半圆，人生再美满不过了。

（摘自《单身心情告白》）婚姻大事是父母现在对我最大的牵挂，父亲几次告诫我“不要做女强人！”我总是笑着说：“怎么可能，爸妈感情这么好，我怎么样也不能低于你们的标准。”对单身我怡然自得，但我对家庭绝对有梦，因为我相信那是我人生第二个丰盛的阶段。现在的我只是在储备能量，做好为人妻、为人母的准备，等我准备好了，我一定让你知道！

台北、香港、大陆，我的两岸三地情

1997 年秋天，我从香港坐上中国民航飞北京的班机，刚落座，空中服务员便轻声对我说：“吴小姐，头等舱有空位，请您往前坐。”我看看周围乘客不多：“没关系，今天人不多，这里挺宽敞。”我说。“还是请您往前坐，方便我们照顾您。”

他坚持。我不再说话，跟着他的引领往前走。再度整顿好座位，我拿起厚厚一叠剪报资料和书籍开始啃读起来。空服人员陆续送来茶水，我说谢谢，她赶忙接腔：“您要去采访十五大吧！您的工作对我们太重要了，为您服务是我们的荣幸！”我的注意力离开了我手中的十五大资料，向她抱以最灿烂的微笑，心中却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时间仿佛回到几年前，我在台湾有机会搭乘中华航空公司班机时，我也常在空中服员的好意和坚持下，自动升等。时至今日，这样的场景在飞往中国内地的班机上重演，这是在凤凰卫视开播才一年多，《时事直通车》才开播 5 个月后的事，而且不是惟一的一次。

我知道，我在重复做一些事，只是服务的观众群不同，但是对求知若

渴的观众来说，不论是台湾或是大陆，反应是一样的。这又让我联想起以前在台湾搭的士，司机不肯收钱的场景。我深刻明白自己从事的工作对公众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而我也终于感受到，我不再是台北、香港双城记这么简单的两个点，而是台北、香港、大陆，我的两岸三地情了。

有一次我参加香港同事的婚礼，同仁们起哄问：“小莉，什么时候轮到你摆酒呀？”北京同事接着问：“看来小莉你要摆酒，非得京港台三个地方都摆。我笑着回答：“好呀！”事后想，这可能还是非做不可的事实；刚到香港，每次碰到港台的朋友，一定有人问：“小莉，香港好还是台湾好？”我老是笑着说：“如果您有一点钱的话，在香港过日子是挺好的！”“瞧，出门有地铁，出站就是购物广场，和朋友逛街逛累了，随处都可找到不错的下午茶场所。心情不佳，搭个渡轮过海，欣赏维多利亚港繁华的景象，只要你懂得享受，不是只埋首于忙碌繁嚣的人群和高楼大厦里，你可在香港找到很多情趣，同时香港资讯快，绝对是工作和自我发展成长的好地方，香港现在已是我第二个家。”我说。

但台湾又不同，没有那么紧张的步伐，尤其我现在回台湾多半是休假，就更能放下心情，会会朋友，照顾家人。在熟悉的地方，许多成长的记忆都会涌现，我现在爱极了众人都在上班，我一个人走在台北街头的静谧，台北是我重新充电再上路的地方。

随着凤凰的成长，现在进出大陆的机会比回台北看父母的机会多得多，我对中国内地的感情也由原本单纯的出差，变为心中多了份牵挂。

“小莉，你不是说8日来北京吗，怎么不见你踪影，让星妈甚为想念！”北京同事打电话来关怀。

“小莉，你上次到上海主持晚会，我已经把有关你的剪报寄给你了！上海电视台编导传话给我。

“小莉，电视上你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是不是太累了，要小心身体！观众在电脑互联网上传递关怀。

“小莉，恭喜你呀！两会的报道做得很成功！”深圳的朋友给我留话。

有次北京的哥儿们送我上机场准备回香港，看着秋冬苍凉的北方大地，我突然有感而发，临行前拥抱了一下我的兄弟说：“中国内地对我来说，原来只是儿时教课书上的神州大地，我乐于一一去踏足探奇。但是现在，因为有了你们——这些好朋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使这里不再只是辽阔的世界，却已成为我另一段情绪的依归。”朋友说：“小莉，你现在是第一位纵横在两岸三地的电视新闻主播，你要好好珍惜！”我不时收到一些中国内地观众来信说，知道我在两岸三地都吃得开，希望我代为转达一些讯息。我在广州外贸外语大学演讲，学生热情询问：“两岸三地文化、电视制作有什么不同，怎么促进两岸沟通？”我总是笑着说：“虽然我1993年到香港时，并不知道自己肩负如此神圣的使命，但是事实上，我已经不断在做的就是沟通两岸三地的文化、思想和讯息。尤其是做为一个电视人，这点更为重要。因为我深深明白，所有的误解可能源于沟通少，而误解又可能造成错误的决定。”而我很乐意，继续扮演这种沟通桥梁的角色。

记得凤凰卫视开播后北京分公司成立，刚开始北上和北京同事合作是在1996年10月到上海访问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和当时的副书记陈至立，并制作7集的《今日看上海》——我眼中上海的变化。

北京同事是先从电视上认识我，或许因为在台湾时所受的教育和工作

训练不同，再加上近年在香港的熏陶，这种揉和着港台的荧幕气质，对他们来说可能比较少见。他们表现出喜欢这个电视上的小朋友，但是既熟悉又陌生，像试探什么似的，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和我说话，想不到话匣子一开，不但沟通无障碍，彼此有说有笑，而且讲到得意处他们会笑着说：“还是小莉厉害呀！”因为我以一敌众，把他们全收服打败了。

我常对他们说，对中国内地文化我是“外地人”，而他们也不厌其烦地把我教会成“自己人”。对于了解港台文化，我又成了“自己人”里的一面镜子。

一位北京朋友说：“小莉，我知道很不容易，一个女孩只身闯天涯，又在国际和合资公司工作！”这也是我自己很大的感触。九七年一次参加公司节目研讨会后，我有感而发他说，“谢谢凤凰卫视不但没有把我当外人，还像疼、自己家里的孩子般照顾我。”也因为对我这样的放心和支持，让我更乐意全力为凤凰卫视打拼。

如果现在再让我下注脚，我不只会重演 1993 年我说的豪语：“属于中国人的地盘好大！”我更会说：“属于中国人的情感，好丰盈！”而我庆幸的是这台湾、香港、大陆我的两岸三地情不只使我视野扩大，更有朋友满天下的骄傲。

回首九八

1998 年 11 月 12 日，在我整理行李，即将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准备采访亚大经合会组织 APEC 一年一度领袖峰会的前夕，接到了北京同事的电话，欣喜的告诉我，我被《华声月刊》选为九八年度十大杰出海外人士之一，希望我回顾过去一年的经历，写些感想。原本答应，在 APEC 会议回来后交稿，但 APEC 之后，满脑子是 11 月 25 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的故事。24 日，我又飞到了日本东京，随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段感想，就一拖再拖，真正动笔，是 12 月初（真的到了岁末年终），我随访日本归来，又上了一趟广西，采访壮族自治区成立 40 周年之后。

回到香港小窝的那个周日，我看着窗外，半山的绿茵，回想过去一年。事实上，从邀稿，到交稿的这段故事，已经充分反应我的工作状态，也是我九八年工作的缩影。一个月里，平均有半个月在外地出差，香港的家倒像个旅店，家中，大、中、小型旅行箱齐备。这边厢，到马来西亚的夏装还未清理，那边厢，往日本北海道的雪衣，已经要装箱。到广西只要 3 天，改为手提小行李。差旅的频繁，我已练就一身整理行李的好工夫，只要一声令下，随时可以出门。拿着大小行李，进出公司的景象，老让我有是不是该改行做空中服务员的错觉，不过，公差、旅行，认识新朋友，亲身见证，发生在各地的大事，到一些没去过的地方，都是这一年丰盛我生活，增长我见闻的机会，再次回望，旅途中的辛劳已不复记忆，留下的是一段段珍贵的人生经验。

许多人说我的故事，喜欢从九八年 3 月开始聊起，我也就顺应民意，和朋友们分享，今年 3 月后，我的足樱 1998 年 3 月，中国每年政协、人大会议召开，适逢换届，新政府成立，香港特区政府首次单独组团参加，都使九八年的两会别具意义。这也是我公差，在同一个地点，“落地生根”比较久的一次，从 3 月初一直到“两会”闭幕，新总理记者会后两日，我一共在北京呆了 20 天。这期间，每天，要做一则头条新闻，晚上卫星传送时间，

要上主播台，和香港同仁做卫星连线，讲述“两会”最新消息，每周日，要为即将开播的小莉看时事暖身，制作两个半小时的“直击两会”特别节目。即使是3月19日，新总理点名事件后，全体同仁欣喜若狂，北京报导组在忙完最后一天活动，第二天可以大肆庆功时，我的喜悦和放松也只能维持半天，因为忙完当晚的卫星连线，我和编导张力，还要为周日半个小时的“直击两会”完结篇做奋斗。

在各方恭贺电话，采访邀约不断时，我对着中文台副台长的慰问电话，几乎落泪，因为我担心，我做不完直击两会的节目。当晚，我熬夜写完串连词，第二天一早，冒着北京3月乍暖还凉的寒风，在天安门广场做外景串场，一面接受BBC（英国广播公司）的专访。即使是21日回到香港，在机场受到凤凰高层的鲜花祝贺后，我也是直奔摄影棚，去完成“直击两会”最后的棚内作业，直到深夜12点，我才拖着在北京20天的大行李，安心地回家。

这就是荣耀背后的故事，它有所有凤凰同仁的辛劳努力，有我掉了4斤（2公斤），和许多不眠的夜。

这段故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即使是我即将在内地出版的个人书籍里也没有提及，要不是《华声月刊》的编辑问及，我不会再去翻阅我的记忆库，但是一经翻阅，却是历历在目。但这一切，都值得，因为我们获得了观众的肯定，而朱总理的率直表现，更让我们确认了凤凰观众群的广阔。也让我更加体认做为大众传播者的社会使命。

许多人问，荣耀之后的小莉，有没有变化？我要说的是，没有，一点都没有，周围的朋友都知道，我只是更忙了，更没有自己的私人时间和空间，连回台湾看父母的机会都是匆匆忙忙，难得的是，他们的体谅，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做一件我喜欢的工作，他们的女儿在完成她几时的梦想，做一个对社会负责的传媒人。

这份忙碌，体现在我九八年的行事历上。

4月5日，“小莉看时事”开播。

4月初，随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欧。

在英国希斯路机场，再获朱总理点名，此行完成8天的随访报导，在英国更设立主播现场，并制作“小莉看时事”朱镕基访欧特辑。

5月，访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当时的省长郑斯林。

6月、7月，访青岛市长王家瑞。

8月，长江水患严重，赴江西九江长江大堤决堤处，深入灾区采访灾民，和抢险工作，制作1个半小时，小莉看时事“九江抗洪最前沿”特别报导，之后参加中国文化部，民政部，江西省政府等各项赈灾晚会。

8月、9月，访辽宁省委书记，贵州省委书记。

10月，宁夏自治区成立40周年，访宁夏自治区书记、主席。

制作小莉看时事“融冰之旅——汪辜会晤”特辑，第十届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大会，访上海市市长徐匡迪。

11月，采访马来西亚亚太经合会，非正式领袖峰会，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点名。

11月25日，中日历史上首次中国元首访日，随访日本，除在东京设立主播现场，做每日的新闻报导外，并制作小莉看时事“江泽民访日”特辑。

12月3日，赴广西，采访广西自治区成立40周年，访书记曹伯纯、主席李兆淖。

这篇文章在 12 月 6 日完稿，到杂志出刊时，我的行事历上，或许还会多添几笔。这就是传媒工作迷人之处，我永远不知道道，我下一个行脚处在哪？但我相信它绝对值得我期待，而当我回首来时路时，它永远是密密麻麻、丰盛的轨迹。

同事告诉我，我获选为海外十大杰出人士之一时，我觉得十分荣幸，而当我完成这篇感言后，我更加感到高兴，因为（华声月刊）的敦促，和获选机缘，让我有机会，回顾我过去的一年，许多遗忘的故事和心情，得以拾回，而在岁末年终的此时更可展望未来，我希望九九年能比九八年忙得更有序，忙得更更有成就感，忙得更加意义深长。

吴小莉

12 月 6 日岁末

于香港半山

（附注：此文为《华声月刊》邀稿，于该杂志九九年一月号刊出）Who am I? Sally Wu, That'S me.

1998 年 12 月 8 日，一年一度的国际电视宣传推广大奖 Promax 在香港举行。来自亚洲各个国际频道，从事宣传推广的制作人员，创意小组齐集，除了评选年度得奖作品外，也是这群电视创意人年度聚首，交换心得经验的时机，所以大会安排了多项演讲和研讨会。

由于我在卫星电视，不但是多朝元老，职务经历更是多重，既有行政职衔，又是主持人，promax 大会，于是邀请我讲述电视宣传片和主持人的关系。

文中内容，可能与我书中部分文字重叠，所以我保留了英文全文，而把中文稿加以精简，它只是我在那个特定的场合，和参加 Promax 的朋友的一场交流，虽然，读者看不到我在演讲时，所播放的一些影片，不过我仍乐于分享那时和我和一群专业电视人彼此碰撞的火花。

演讲的一开始，是由主持人介绍主讲者背景的一段开场白，介绍我出场的是马来西亚迪士尼频道的 Rayman。

一个来自台湾的女孩

1988 年，以她小时候立志为记者的志愿，考入台湾中华电视公司（Chinese Television Station）担任记者和新闻主播的工作。

1993 年，sSTAR TV 在台湾积极找寻，台湾人的老朋友，亚洲的新面孔时，选中了她，这位台湾新生代主播，力邀她到香港加盟 sSTAR TV，Sally 以希望做更多好节目，给更多中国人看的心愿，放弃了台湾高薪，人人羡慕的主播工作，来到香港，开展她全方位媒体人的职业生涯。

sSTAR TV 素来以擅长包装，擅于造星著称，STARmake stars，这是外界对 STAR 的评语。而造星首要工作，除了主持人本身的定位、形象、内涵清晰外，荧幕宣传、定位包装成为重点。

sally 在 sSTAR 的个人宣传片，从九三年的“都会女子”篇到九四年“天生的电视儿童”篇 who am I? sallylwu, That, s me。到九六年凤凰卫视开播。

九七年凤凰卫视推出新闻节目，Sally 回归新闻本业，形象益为突出，同年，“当大事发生时我存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我”个人形象宣传片，

得到了九七年 pro-m0ax 新闻类主持人形象篇金奖，而这两句宣传词，也成为中国大陆众多观众对 Sally Wu 的联想词。

1998 年 3 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新任首次记者招待会，朱镕基点名称赞，表示喜欢 Sally 的广播，希望她提问，同年 4 月，随朱镕基访欧，朱镕基甫下飞机，在伦敦再次点名 Sally Wu。

1998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赴马来西亚参加 APEC 领袖峰会，在与美国副总统戈尔双边会开始前，点名 Sally Wu 说她现在是有名人物，之后，Sally 又以 10 元人民币询问江泽民有关明年人民币会不会持续稳定的问题，使原本表示 APEC 之行不会接受访问的江泽民，开口做了说明，建立起和中国领导人另一种互动关系。

Sally 将以自身亲验，讲述自己在不同时期荧幕宣传片，对她本人生涯转换，职业定位，和专业形象的帮助，因为她就是一个 STAR makes a star 的最好例证。

我是谁？吴小莉，就是我。

首先要感谢大会，让我有这个机会，和来自世界各地电视传媒界的精英们碰面，我想在座的很多朋友，或许会问，这个女孩是谁？Who am I？1993 年，当覆盖范围包括整个亚洲的 STAR TV，把我从台湾华视（CTS）挖角到香港来时，很多亚洲的观众朋友，对我这个台湾的老朋友，亚洲的新面孔，可能也有着同样的疑问，Who am I？STAR TV 是亚洲区第一个卫星媒体，它没有当地媒体的地缘优势，不易成为某一地区的强势媒体，所以为了让泛亚洲区不同国度的观众有更深刻的印象，和更迅速被接受，除了推出好的节目外，不断的自我包装和宣传，成为卫星媒体的强项，和必须走的路，STAR TV 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因身在其中，身受其利，一位朋友，更是讶异于我从台湾到香港的改变，他评价这是 STAR makes stars。

STAR TV 对我第一个包装短片在九三年诞生，它没有强调我是来自台湾资深新闻主播的背景，反而将我放在被称为香港华尔街的中环闹区，在老\新中银大厦间，在汇丰银行两对铜狮前，身着俐落的套装，自信悠然的游走，因为我已在香港落户，成为一位具有国际感的都会女子。

到了九四年，9 月，STAR TV 要为 chinese channel 重新定位希望找一张中文台的脸成为中文台的标志，我有幸获选为 The Face of STAR Chinese，STAR TV 想将新中文台定位为，具有现代感国际感和世界观的频道。我们首先来看看，STAR TV 怎么把我重新介绍给亚洲观众，Who am I？影片中的我非常胖，比现在胖多了，但是她很忠实反映出九四年时我的状态。

因为那时我为了制作 Big byte，一个电脑节目，常飞新西兰，New Zealand 的羊肉，牛奶和 ice cream 造就了我那时的体态。

这个宣传片的制作近 4 个月的时间，制作人员，典型是个国际组合，Bill 是澳洲人，Angela 是加拿大籍华人，摄像是香港人，从 8 月开始，为了解我，Bill 和我进行多次长谈，最后，他还要了我儿时的照片，他决定从我和电视的关系开始，所以宣传片的第一句话，和第一个镜头，是我儿时和家中电视机合影的黑白照片，和现在的我，我的旁白是“当我第一次购得到电视机的时候，这台黑白电视，就成了我最好的玩伴，长大了，电视却成为我最重要的工作伙伴。”为了加深我纵横在俩三到感觉，九四年九月，摄制组人员和我到了北京，Bill 选在北京人著名购物街秀水街拍摄我和神州大地，和这片土地人们的关连，影片中的我静止不动，或是缓慢移动，但身旁

人影穿梭，成为一道道人影，车影，我非常喜欢这个镜头，它既反映出中国苍茫的北方大地，也反映出人潮往来的热闹景象。

但是，这个镜头的代价是制作人 Bill 被自行车撞歪的鼻梁，因为他为了勘查地形，蹲在秀水街边，不慎被急转弯的自行车撞伤，他原来挺直的鼻梁就给撞歪了。

不过，好人好报，在这个宣传片制作完毕后，Bill 一路升官，现在已是 STAR TV 创意总监。

我在亚洲区观众眼中，另一次形象转变，是九六年，凤凰卫视开播。凤凰卫视是 STAR TV 的姐妹公司，九七年，凤凰开播新闻性节目，我终于又回归本行，成为时事节目“时事直通车”的主播。为了开播新节目，凤凰决定先突出主持人形象，做新的个人形象推广片。

STAR TV 中央宣传部的撰稿同仁，跟我商量，她说，我过去一直浸淫在时事的领域，是位资深新闻主播，已经有很强的个人特色和风格，宣传部同仁对于如何强化我的新闻感已有初步构想，但希望我就对自己形象的期许，写段草稿。于是我用半天的时间，写下了，“报导事实，伸张正义，是我从小的志愿，对未来，我希望，当大事发生时，我存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我。”的自我期许，这段话，的确是我九七年时的个人心境，因为我一直喜欢美国一个电视影集，描述一位电台主持人的故事，他在做完 Radio show 后说的一句话“Good night Americans, wherever

you are!”(晚安，美国人不论你身在何方!)我希望有一日，我也能说“Good

night Chinese, wherever you are!”(晚安，中国人，不论你身处何方)因为中国之大，中国人之多，遍布全球，就以我的这段草稿为主体，宣传部同仁为我制作了个“今日新闻，就是明日历史”的宣传短片，如果各位去年有参加 Promax，甚或参与评审的话，或许已见过这个片子，因为它得到九七年新闻类主持人个人形象篇金奖。一起来看看。

说句实话，相较于上一个宣传片，这个宣传片花费我时间和精力较少。为了这个宣传片，我只在摄影棚待了半天时间，拍完之后，我就立刻飞赴北京，采访中国人大政协两会会议，由于导演阿伟在我摄影棚拍摄影像前已经画出分镜；草稿，所以，我只要在摄影棚里，抬头，凝望，翻书，沉思，但是，在后期制作时，加在我影像旁的电脑动画，甚或，真实的新闻影片，却都是幕后工作人员，和我过去半年上第一线采访，真实片段的累积，严格来说，累积花费的时间更长。由于这个宣传片的形象专业而鲜明，至今“当大事发生时，我存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我”这段话，成了许多中国内地（凤凰现在主要目标市场）的观众，对我的代名词，深入人心，可见一斑。

屏幕的宣传包装，对一位幕前人物，一位主持人的重要性，我有切身感受，因为我就是 STAR makes stars 的受益者，不论是这个适合我个人特色的宣传片，或是，凤凰开播的时事节目，在我觉得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使我有机会在今年（九八年）3月，受到中国新任总理朱镕基的点名称赞，可见凤凰的屏幕影响力。

我同时想说的是，一个好的屏幕宣传，必须有一群好的制作人员，好的创意，当然更要有特色和适合这个节目的被包装者，因为这可省去创意人员许多精力，不需要刻意去创造，只要帮助发挥即可，举个例子来说。

九五年，我奉 STAR TV 之命，调往台北，制作“今日看台湾”“今夜看

台湾”，两个带状软性新闻节目，当时两位主持人一位是台湾著名政治人物，后转入媒体工作的前立委赵少康，另一位是资讯娱乐节目主持人，sSTARTV中央宣传同仁要为两位主持人做个人形象片时，煞费苦心，因为赵少康形象鲜明，做立委时，也是好打抱不平，挺贴近社会脉动，但是另一位女主持在社会性节目的形象就稍嫌模糊，大家可以感受到，轻重的不同，一起来看看。

秉承着 STAR TV 的风格，凤凰卫视也十分重视形象包装，九七年，在我推出“今日新闻是明日历史”这则短片的同时，凤凰同时推出，不同主持人的宣传，当时的策略是凤凰才开播一年多，是很新的卫星频道，所以希望先藉由造星（Make stars）来带动节目，于是我们有了做资讯时事节目的窦文涛，有模特儿出身做娱乐节目的孟广美，她在宣传片中，就尽展模特儿本色，也有渴望飞向世界的大男孩卜邦贻，一起来看看。

进入九八年，凤凰对屏幕宣传的策略有了改变，在造星之后，希望藉由星星，带动节目，于是不再有人形象篇，而是将主持人和节目结合在一起，让主持人来卖节目。

如果主持人和节目都是电视台的一项产品，虽然，我很不乐意这样说，因为我自己也是主持人，但又是公司的中层主管，所以，as a manager（行政人员），我以电视发展的角度来看，节目创作人员，努力创作的好节目，主持人努力培养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之后，如果没有在座的各位，用你们三寸不烂之舌，用你们高超的屏幕包装技巧，不论是节目或是主持人，都可能成为卖不出去的商品，as a presenter 做为一个主持人，最后我要说，我的前途，全在你们手中！

谢谢各位！

Wh am I? sally wu, that's me.

First, I'd like to thank Promax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to meet and speak with creative professionals from around Asia.

Many of you might ask, "who is this Girl?" Who am I? When I left CTS, a Terrestrial broadcaster in Taiwan to join trans-Asia Star TV in 1993, many of Star's viewers might have the same question, Though I might be an old friend to Taiwan viewers, I was a new face for the rest of Asia, So, who am I? Star TV was the first major Satellite broadcaster in Asia, Without the advantage of familiarity of being a "home grown" broadcaster, it is crucial to build a friendly alliance with our viewers instantaneously. To give the Network a "personality", packaging and promotion became the priority, and through this, Star became the expert in the area, I was one of the personalities who was made the "fa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my TV persona amazed even close friends of mine. Their amazed comment was, "STAR makes Stars". My first image promo at Star didn't emphasize my Taiwan background. Instead, the montage of me in Central. the Wall Street of Asia created the sense of me as an international city slicker. 1994. I became——prom0 x 2——1997, at the time of the today, s News is tomorrow, s history'' spot, Phoenix also aired a series of image promos of other presenters as their on air strategy. This is to drive the programme of the channel by Star power. We have Dou W——-pr0m0 x 3——Entering into 1998,

Phoenix Channel once again repositioned their on air strategy. Since the individual imagepromos of the presenters have already successfully anchored the channel, more emphases are put on highlighting the style of the——promox 3——Both Presenters and programmes are products of Television. And promo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and effective way to package and advertise these products. As an executive of Phoenix, from the television development point of view, I have to say 小注：promax 大会后，传来新消息，“小莉看时事”的宣传片——“青蛙篇”获得了九八年 promax 新闻类节目宣传片银奖。这个以青蛙 180 度广角视野看世界来寓意视野辽阔的构想，来自卫视中央宣传同仁的巧思，而值得恭贺的是编导阿伟，因为九七年我的个人宣传片“今日新闻是明日历史”的得奖，也是来自他的制作。

顺道告诉大家，这只宣传片中的小青蛙被阿伟买来拍片后，已被免费送回宠物店，现在不知在哪位新主人手中，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呢！

第十章、随想随笔

做电视的人有个毛病，朋友交待任何事，总会问，“期限为何时？”仿佛生活老在赶“播出时间”，就连朋友约稿也一样，要不是有截稿压力，就算是心中满满的生活感受，也是先任由它沉淀。所以，过往累积写下的心情并不多，1998 年 8 月去了趟美国度假，因为之前，有香港杂志约稿，因此留下些当时的随想随笔，翻箱倒柜找出来，想想，不妨和我的读者分早。

更有意思的，是九五至九六年间，台湾杂志和报纸的邀稿，现在自己翻阅，都差点忘了“原来我曾有过这些念头！”，翻阅旧作，像是翻阅生命的历程。

女子当家

“省钱是不会让你富有的，要赚钱才会让你有钱！”“我觉得美国有些大公司是故意要让自己的属下养成坏习惯，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你的生活水准被拉上来之后，你就只能努力工作，好维持现有的生活品质，这叫做 Motivation，动机！诱因。”这是我和一位女性朋友在美国逛 Outle 以一类类似 Joyce 仓储专卖名牌非最新上市品的地方，价格类似批发价，较便宜），俩人在一阵“血拼”（shopping，就是疯狂购物）后，稍作休息时的一段闲聊，更精确他说，应该说是她对我的提示。

“我都是这样对我男朋友说的，两件大衣差 30 美元，我会鼓励他买贵的那件，因为真的好看嘛！省钱不会致富，想买好东西，得会赚钱，这也是我对他的 Motivation！”她继续说，因为泄露了她的动机：“我妈说，男人要征服身边很多人。女人，只要征服身边的那个男人就行了！”甬说，我有多喜欢这个小女子了，不是因为她对男人的“野心”，而是因为她对生活的了若指掌，对自己追求的东西有定见。

我这位女朋友 30 岁不到，台湾出生，美国长大，现在在上海做房地产生意。别看她一副洋派作风，骨子里却是中国到底，也别以为她是只想控制或依附男人的小女人，她自己可也是能干到底。十几岁就开始打工念书，现在打理家里在上海的生意，从小训练是万事自己动手，所以对家务细节知之甚详。

“正中午，你现在不能洒水。”对著美国房子里大片草坪我这一位女友大叫。

“要清早或是晚上洒水，正中午，草儿会死掉，you know！”女友对她男友说：“I teach you one thing every day！”她男友莞尔，我却在旁乐得直呼：“真是绝配！”她男友面对工作时精明能干，对照料自己则绝对马虎，我这位女友会是他最好的 back up（支持力）。而她的“征服论”，充其量，又是她对生活规划的定见之一。“我想未来要和另一伴商量，年轻时两人努力打拼赚钱，但是赚到一千万美元后，就可以退休过自己想过的日子！”两个月前，她和我聊天许愿，听得我瞠目，因为较少听到有人把退休时间表用金钱量化，而且雄心不小，最近，她改变了口风：“或许，赚到三、四百万美金，就可以退了，一千万可能太久！”唉！我真是爱煞她对生活的有把握，或许这就是她的 Motivation，让她能逐梦踏实，更望她美梦成真。（不知为何，对这点我一点都不怀疑。）谁说女人不能当家理财？或许女人更有雄心，却没野心，更能打拼，却也能激流而退吧！

最近，看了一篇美国的调查，说美国女孩普遍对数字、理财和体育较缺乏兴趣，表现也较差，有人认为，这是传统教育中，告诉女孩只要找到白马王子，“长期饭票”，从此相夫教子就好，理财，赚钱让老公去操心。

本来有些讶异，美国怎么仍存有中国社会早期的观念，但是看看美国白天，专给家庭主妇和妇孺看的 Talkshow 或是电视节目，我终于明白，在美国本土，所谓的女性精英仍是少数，大部分的美国妇女，仍是被肥胖、家庭问题困扰极深的一群，所以那些对亚洲的我们（至少在我这个电视人眼中），极尽无聊的“脱口秀”节目，对美国妇女观众却起到集体催眠的作用。

难怪，美国企业界要发起“带女儿上班”日的活动，规定，每年 4 月的第四个星期四，职业妇女可带女儿上班，让她们熟悉职场，了解女性也可以在工作中奉献心力。

不知为何，眼前又浮现我那女朋友闪烁著希望和奋斗目标的眼神。“我们家现在这种景况，都是我们一手一脚做出来的。小时候，我得挨家挨户送传单，读书不重要，赚钱重要，十几岁学做生意，即使是现在，我们做的是服务业，半夜一通电话，房客说房子有问题，我们还是得服务。”她诉说往事，语气中没有诉苦但有坚定：“我妈说，要什么东西，都得要自己打拼得来，”她继续对我说：“喂！等我家在上海的生意告一段落，我想回美国念书！学电脑动画设计，（和她原来的学习专业风马牛不相及）你也申请到美国念书做伴怎样？”“好呀！”我满口答应，我想，我这个情懒的人可能也需要些 Motivation 了。

或许，这才是现代女子，不给自己依赖他人的藉口，只给自己良好的教育机会，让自己能够真正的当家做主！

我想，虽然我还学不来我那女朋友的十分之一，但下回买东西，再面临抉择时，我会记得：“省钱，是不会致富的！”不过，这不会成为我挥霍的理由，我更深深记取：“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得自己努力赚取！”

急诊室探医记

7月底，去了趟美国，意外地两次和医生打交道。

第一次是没有预谋，到了洛杉矶第二天，眼睛发炎突然长针眼，赶紧抓著朋友要看医生。

其实，因常化妆又要戴隐形眼镜，眼睛感染发炎已不是第一回，久病成良医，知道只要点消炎的眼药水即可，殊不知美国医药分业严格，无医师处方，眼药水是近在咫尺，都妄想到手。凑巧碰上周日，要医师处方只得上急诊室。

听从友人建议，上午 11 点钟到 LA 所谓高尚住宅区的大医院就诊，进入急诊室，一片窗明几净，丝毫没有电视影集中 ER（仁心仁术）里的场面，救护车呼呼驶入，单架推进满身是伤的患者的场景，我依序登记就坐等待，身旁坐著一对好整以暇的老夫妇，突然一个妇人带著 3 个上吐下泻的子女抢进急诊室，说中午吃意大利餐坏肚子，护士赶紧把他们带进房，先行照料小病患。原来美国急诊室是名符其实的谁有急诊谁先上，护士忍不住提示我：“急诊室里很忙，床位都满了，要等床位，像这位先生（她指指我身旁坐著的老夫妇）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我和友人心想：“我们不需要床位，只要有位医生能开处方单，让我们到药房买药水就成了！”先谢过护士，我们决定换一家医院碰运气，兜兜转转所有私人诊所周日都休诊，真是符合美国人重视休息的原则。看来在美国周日看病仍然只能到急诊室。

再回到我原先登记过的急诊室，已是中午 1 点钟。

“我从早上 10 点钟，花了 4 个钟头只是拿医生的诊断书，到药房拿药治我的颈痛，早知道要这么久，我就忍到明天门诊开诊再说！”他抱怨他说。“你在这里看不出里面的状况的，救护车都从另一个门进来，我刚才身旁就躺了一个满身是血的车祸患者，医生要先忙完他们，才会轮到这里的普通病患！”他继续说。临走前他不忘丢下一句：“Good luck！”我和友人面面相觑，心想：“反正已经耗掉半天了，我倒要见识一下美国的急诊室作业！”终于叫到我的名字，虽然不是大病，但按照规矩我得躺上我轮候了 4 个小时的病床，因为病床放空，表示医生才有空，告诉医生只是眼睛感染长针眼。医生照例是一轮视力探测，询问有无药物敏感。我暗示需不需打消炎针？医生一阵摇手，前后不到 5 分钟就走了，我大概是他今天最简单的急诊病人，但是所有程序还是得一丝不苟，随后护士拿来医生消炎药水的处方单，我小心翼翼接过单子，为了“它”我浪费了周日半天的光阴，付出 125 美金（折合港币 968）急诊室费用，这还没计算医生诊断费。在美国，假日是真不能生病！

回首来时路：重重思考，轻轻放下

“工作女性”的心情是千锤百炼的。

已婚女人一颗心在公司、家庭间奔波摆荡，未婚女子在职场内寻觅，选择立业或成家。

这些心情或许动人、或许惹来心酸。这些酸甜心情的“上班情事”专栏本期开讲，找张舒服的椅子，一起来聆听知名“工作女性”的心情告白，顺便也探索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

人的一生都在做抉择，从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出门、到谁是最好的终身伴侣？两年前的6月，是我工作生涯转换的一个抉择点，在华视近5年的主播记者工作上面临瓶颈时，sSTAR — TV 卫视中文台提出了邀请，我经过一个月的深思，一个“不进则退”的喷水池理论使我决定暂别台湾，跃进亚洲舞台。

跌破眼镜的抉择

这个抉择不知跌破多少同行的眼镜？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要离开一份稳定、高薪、人人羡慕的电视台工作，怎么下得了这个决定？我没有任何居心，却成为台湾电视媒体跳槽海外的第一人。之后电子媒体变化，可说风起云涌，从不到10个频道至今60多个频道，（目前仍持续增加中）。

适时的工作转换，转入事业另一个山峰，让我的眼界提早从一个单纯的节目制作者，跃升为媒体研究者。更重要的是能在实务界成为决策者一个新的Title，年轻的经理。

知道自己已无可避免地成为电子媒体大战的一员。但对一个传播人而言，我是多么地庆幸自己生逢其时。

现在，就没有朋友再问我当时为什么选择离开台湾了，取而代之的是，你走的“是”时候，很好的抉择，殊不知，当初我是怎样在婚姻和生涯转换的十字路口上，重重思考后，轻轻放下决定离开生长的地方，离开熟悉的朋友，对一个适婚女子来说，就不只是换工作而已，更是将自己的婚姻抛向未知的未来。

我当时想是选择可预见的稳定生活？抑是将工作、婚姻都交给自己？交给所有的不确定？或许是血管里流着记者冒险犯难的血液，于是我们选择了后者，就因为有多数不确定，所以，我想趁着未婚年轻时，自己多做些决定。

现在，如果朋友问我过得好不好？会不会对两年前那个大胆决定后悔？我诚心他说——回首来时路，也有风雨也有晴，深知人生是一场不断抉择的游戏，重要的是，我们懂不懂得“抉择前，重重思考；决定后，轻轻放下。”人生，只为寻找一个宝藏？如果人生像个寻宝图，最终只有一个宝藏，那么走错路，只不过是多走冤枉路而已，如果我们终究走得到，抉择时，就不会那么痛苦，如果没有福气走到，那倒不如欣赏沿途风景。

而我正觉得我的沿途风光山明水秀，景色怡人。

不管，最终我能不能找到更大的宝藏。

现在你问我，会不会想回台湾？等到要抉择时，我会将答案告诉你！

第十一章、我的家人的话

家人，是这本书在创作期不断给予我刺激的灵感来源，和家人的相处，也是我动笔时最动情的章节，但他们却不是我第一个读者，一直到在香港的书出版，我才把成品交到他们手中。

回馈的反应不一，母亲说：“原来你还有另外一个才能，看这本书像看

故事书一样，一直想把故事看完，”想当然尔，因为书中有她嘛！

一向不轻易表露感情的父亲，没表示意见，但老对四姊抢走了他手中的那本书而耿耿于怀。他说，台湾的浙江同乡会不知道从哪知道，我出书了，希望父亲提供一些我这位“优秀乡亲”的资料，想在同乡会月刊上刊登，他有机会，会把资料摘录一些给月刊的老乡们。

二姊看了书是哈哈大笑，因为书里把她写得挺逗趣，当然，她仍不改本色地拨拨秀发——露出她那人近中年，却十足娃娃脸的慧黠笑容说：“不过，怎么写我，写得这么少，可再多写些嘛！”四姊夫此时插话了：“小莉，你那本书，害你四姊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肿着一双眼上班！”“怎么回事？”我问。“因为想起小时候许多事，现在都回不来了！”四姊怪难为情他说。

倒是么妹的一篇文章，勾起我一些早已遗忘的故事，也从家人对我的侧写中反过来了解了，这些年来，家人是怎样看着我只身在外的变化，而我最喜欢的是，么妹在结束语只对我的提点，唤起我年少轻狂，带着妹妹在公园里学花式溜冰的记忆，那时的我，还懂得如何藉着旋转的力量，腾空向上，在空中翻转两圈，然后漂亮落地那是我再也不会回头的青春年少。每每看到这儿，轮到我有泪水盈眶了。

我的女儿吴小莉

话说小莉的出生我尚任军职，某天部队行军到金龙禅寺，并在那里午餐后休息时光，偶然有同事提起我内人身怀六甲，这金龙禅寺灵签很准，何不求一支看这次夫人是否生男（因已有4个女）。那寺里的签做得很别致，是将签诗纸摺好放在一个像乒乓球1/2大的塑圆球内，将很多签诗圆球放入签诗箱内，其方式有似现今自动贩卖机。求签者告明所求意愿后，那时是用铜制的5角硬币投入箱中，即响2秒钟歌声，然后签诗箱下方即滚出一个签诗圆球，将那圆球请寺中管理人员用钳子夹破取出签诗，众目睽睽祈望我有个男孩，结果是“六甲生女”大失所望。有人建议再求一支仍如同前签。再有人说：国人求神拜佛均以3次为准，再求第3支签，竟使佛祖不耐，签曰：“六甲生女，生男凶。”我也不敢将签诗告知内人。尔后在内人进产房待产约两小时，我在产房外急得像热锅边蚂蚁，踱着方步，喃喃自语，不断地祈求佛祖保佑她们母女平安就好。孩子出生后不数月我因胃疾提前退伍休养。小莉这孩子小时候虽不怎么白嫩，但轮廓清秀，也不哭闹，这也是她乐天知命性格有关，其活泼、爽朗、乐群之个性，自启蒙开始即为老师赏识，同学们之爱戴，故自国小到国中当了多年班长，就读高中后选拔到乐队并任分队长，就无暇为班级服务其他事项。在求学过程中成绩优异，几乎每学期都有领到奖学金。我对这孩子生活规范及学业方面均有信心。虽在事先我还是会对她叮咛嘱咐一番，但事后从不会让我失望，凡事都有分寸。她大学毕业后我虽经济并不宽裕，但希望她再深造，惟其衡量处境，尚有小妹就读高三需要栽培，毅然决定参加甄试电视记者，幸蒙录取，达到其生平志愿，但刚出校门踏进社会工作，尤其是记者生涯很不简单，早出晚归艰辛不说，初进电视第一个月，看她晨间起来，愁眉不展，原因是一到办公室汇报时要提出今日采访目标，题材难找，我夫妻俩见孩子痛楚情感同身受，委劝孩子这工作不好做就不勉强，我们回家吧！再去读书吧！个性坚强、毅力充沛的

她说：再冲刺看看。一个月后，下班回家，看她情绪表露似有心得，工作已入门径，士气非常高昂。后续几年先后曾任早午晚间新闻主播，工作更得心应手，只是见她仍早出甚至到深夜才回家太辛苦了，令我二老担心不已。

自 1993 年 7 月到香港卫视中文台，再加入凤凰卫视后，欧亚大陆到处跑，回台湾我俩相聚机会越来越少。她说公司、长官对她栽培爱护、同事们对她的照顾，使她工作顺利，生活愉快，不让我二老忧心，其实远隔重洋我们想照顾又奈何。只希望我俩有生之年能看到她事业婚姻两顺，早有归宿。

吴振法

1998 年 10 月 3 日

我的妹妹——吴小莉

当小莉“圆人生的梦”由香港带回台湾时，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将它读完，实在是太生动，太精彩了，说精彩是因为看到她非常用心的活出每一天，不蹉跎光阴、不辜负老天予她的天赋、才能，在短短的数年间，纵横两岸三地，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我们真的为她感到骄傲，更以她为荣。

还记得小学五六年级时，她固定为我送饭包，班上同学喊她小馒头（因为我是大馒头之故），她与我同学也很熟，老爱跟着我们玩，是个小跟班，但人小脚步慢，总觉她很烦人，却怎么也甩不掉。

但当我进入初中，忙于联考时，那当年的小馒头，却像吃了儿童速体健般，长的修长而标致。妈妈后来很担心地警告说：不要再跳高了，超过 170 公分，以后嫁不出去。长大后才知道，是我不经意的话：小腿不运动会变粗，影响了她，她不停的跳，深怕小腿会变粗，所以在人群中，她总是鹤立鸡群。

青少年时期，那时流行琼瑶的爱情故事，我们姊妹们会一同到东园街上的复兴戏院观赏，但我们总有个习惯，一定赶在电影开场前，气喘嘘嘘地进入，还颇觉得意能及时赶上，不浪费时间，如果小莉现在仍有此及时赶至的特质，可能是小时赶开场的习性所致。而每当太投入剧情到散场时，我们总会哭红了眼，一言不发，将自己想像为那剧中不食人间烟火的女主角，直至长大，小莉愈发出落的清秀标致，亭亭玉立，大学时代长发飘逸，更活脱是琼瑶小说中的女主角。

在求学过程中，她表现得极为出色，举凡演讲、朗诵、辩论比赛，带队指挥，班级代表……，都少不了她，而在家中更是父母姊妹心目中的开心果，很能模仿，很能耍宝，看她手长脚长的，表演起人猿猩猩来，真是无人能出其右。

小莉在华视当主播时，我的第一个宝宝——丫丫，正由外婆带，只要问丫丫：小莉阿姨在那里，她会指着电视机，因为她见到阿姨时，总是在那荧光幕中出现，而晚间新闻更是件大事，因为母亲会从头到尾聚精会神地看，还会不时地问：她化妆好不好看？衣服搭配的妥不妥……，说老实话，小莉个性随和，大而化之，但不大会打理自己，包括化妆衣着，都不挺灵光的，但这可不能跟老妈直说，否则她会整晚惦记不安。

到香港发展，对一位填写大学志愿规定，“台北以外的学校不要就读”“大学以后才可校外旅游”的父亲来说，无疑是一项重大的考虑，对小莉而言，更是她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抉择。因为当时台湾传媒记者，到香港发展，

是史无前例的，她应属第一人，我想那需要无比的勇气与超强的毅力，才能承担。常常她会为处理生活小事打电话回台湾求教于母亲，衣服怎么洗，饭怎么煮，菜怎么炒……，由此可知母亲对我们照顾的细微，在家是不需要动手的。

再回台湾时，她会告诉我：属于中国人的世界好大，当你坐在台下，站在台前，或甚而站在讲桌上，所见的世界不论宽度与广度，都截然不同。我能深切地体会，这样的勇气尝试，用心付出，为她开拓了视野，赢得了掌声，更成就了自我。

今年中秋，我带着小朋友回爸妈家过节，台北天气豪雨不断，别说赏月了，就连到户外走走都很勉强，正觉无趣，就接到小莉由杭州西湖打来的电话，说是浙江省长要问候老爸，爸爸开心地直说：改天回乡再去拜访你，中秋节快乐！小时候爸爸常说：家乡好大啊！今天因为女儿的成就，省长来电祝贺，爸爸是多么的开心啊！

但爸妈心头仍有一心愿，那就是小莉的婚事，愿她能早日与她那位MrRighi，走进礼堂，圆人生的梦，否则小丫丫变成大丫丫，就无法做他们的花童了。

吴曼莉
1998年在台北

我的姐姐

藉由小姊新书付梓，让这些年断了线的亲情再度串连起来。自从她进入新闻界之后，看见她在电视上的机会比见着本人的机会多，她实已属于群众！而众人看的是幕前的光鲜，我们看见的是来去匆匆的她和父母的担忧——犹记某年夏天，窗外刮着台风，下着豪雨，她仍坚持出门采访。除了为她的勇气倍觉激赏，也为她的冒险犯难而深感忧心，然，也因此对记者们生起崇高的敬意。

从前，我会引以为傲地向人说：吴小莉是我姊姊；现在，虽仍引以为荣，却鲜少再提起。有人说，姊姊的成就那么高，是否会带给你压力？细想，是我看见了自己的虚荣心，就算我父亲是高官，也不应有什么不同；至于压力，如果能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如果世人能脱离“比较”的束缚，将自己释放，用“平等”的心去对待，也许，就没有所谓压力。这是我爱佛法的原因，也是值得追寻的真理！

然在书中，清楚地看见了她和大家的心紧密相连，不是为了新闻而做新闻，而是为了真诚的关怀和正义的伸张，她愿将一切人当作朋友，亲切平和的处世态度，是最个人动容和称许的地方。

这些年她离乡背井，我们却仅因着这本书才了解个中艰难，渺小的我，惟藉着诵经后回向祈福，希望小姊一切平安，圆满。无论在别人眼中，她是如何耀眼的一颗星。

在我的记忆深处，最怀念的，还是那年少的午后，和我一同在河堤边骑单车，黄昏时一起溜冰的好姊姊……。

莉莉
于1998年8月27日台北

第十二章、朋友们的话

严格说起来，我不会是个好朋友，尤其这两年京港台四处跑，居无定所的情况下，朋友根本是到了香港也不得找得着我，他们知道我行踪的方法，只能靠电话答录机里的留言：“我下周到杭州做中秋晚会，周三才会回来。”“我现在人在北京做节目 16 号才回香港。”“我到美国度假，有事先留言。”“我回台湾看爹地妈咪，很快回香港。”朋友们也都体谅，我有时实在没空主动打电话 sa yhel-lo 的恶习，他们只是三不五时地来关心一下我的生活，而我也总坚信，朋友是一辈子，不论你身在何处，你永远知道，他们的存在，而他们也深信“here I am”我永远在那里。

于是，朋友来电哭诉心情不好，我会想法子放下手边所有事，飞奔到朋友身边，带她离开几乎要令她崩溃的环境，朋友事业面临抉择，我可以牺牲睡眠和她长谈两个小时，直到她能安心入睡。

对我来说，多年不见的朋友再相见，情景依然，因为，我会把时间还原到上次见面，一切再续于是有朋友说：“很奇怪我们有两年没见面了吧？怎么感觉好象昨天的事，一切都一样熟悉。”近年来，到处奔波，朋友的范围圈更扩大了，但送旧迎新下，是老朋友因忙碌疏于联络，新朋友还有待时间深交。于是，我给自己定下了新的志向，“该把好朋友留在身边了。”

随着新书即将付梓，好姊姊多多，神来一笔建议：“你可以请朋友，友情来稿呀！”这句话一出，就是我满脸笑意地向她邀稿：“多多，你首先来稿呀！”朋友眼中的自己，像面镜子，尤其是曾共事过的朋友，许多当时的心情，你或许早已遗忘，但是借由这面镜子反射出的光线却仍然生辉，引我流连。

还要特别感谢刘震云，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内地作家，籍由他，我认识了内地文人儒雅幽默兼而有之的气质，而他本人就是本好书。

亲和力注解

什么叫亲和力？什么样的人具有亲和力？如果您想要了解这方面的问题，那就请仔细阅读本文，因为本文恰好就是一篇有关亲和力的注解文章（详细的案例可以从小莉的这本书中读到）。——这是解题。

靓丽、大方、活泼、可爱、睿智、敏捷、清新、灿烂……这不是程某人的词儿，这是许多平面媒体加给小莉的形容词。凤凰卫视主持人微笑着播报时事，始于吴小莉。

她有一张“自来笑”的脸，即便是抿着嘴唇，她两边的嘴角也是微微上翘，依然笑意盈盈的样子。

第一次与吴小莉合作是在 1996 年 11 月，上海电视节期间。当时我和矫捷、黄晓燕等人比小莉先期到达上海，做开幕报道，而小莉因为参加 9 日在北京举行的凤凰卫视演示会，所以在 10 日抵沪。当她到上海时，我们没有替她订下五星级酒店的房间，而是把她直接弄到上海有关部门为我们摄影队安排的三星级饭店，让她跟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不知道小莉心里究竟乐意不乐意，但当时我看到她脸上的确是笑笑的。在结束了电视节期间的

上海报道后，我到饭店门口给她送行，她欢欢喜喜地对我说：“鹤麟哥哥，你是一个好人。”我当时就想，这个台湾妹不比咱内地的主持人难伺候。那次在上海，小莉也给与我们合作的上海电视台的摄影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说她既专业又勤奋而且好相处。当时她采访了黄菊、陈至立等上海市领导人，陈至立对她评价也很高，说她给人感觉“很舒服”。1997年中共十五大期间，小莉在会上遇见了已经调到教育部的陈至立，二人都欢呼着跑向对方，好像久别重逢的姐妹。

这就是亲和力。小莉身上的亲和力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生的气质，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欢快融洽的气氛。

小莉的亲和力并不是靠她的那张笑脸，而是来自她内心深处对观众的诚意、对采访对象的友好和尊重。西方的心闻理论强调记者与采访对象“平起平坐”的平等理念，忽视对方作为人，除了平等还应互相尊重。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西方记者对采访对象咄咄逼人的进攻挑衅的态度，不把采访对象逼到窘境誓不罢休。对照当今世界提倡对话，减少对抗的大趋势，反思这种所谓记者乃“无冕之王”的理念，不难看出它有明显的缺陷。“王者，高于一切的主宰也。而我认为，平等必须坚持，尊重也不能忽视；没有平等谈不上尊重，没有尊重也就没有平等。

“无冕之王”理论实际上把传媒凌驾于受众（所有的采访对象始终都来自受众）之上。受这种理论影响，有的记者、主持人，常常到平民百姓那儿去找平等的感觉，找无冕之王的感受。他们对普罗大众谆谆教导，以为人家都比自己傻；采访遭拒绝时恼羞成怒，对拒绝采访的人不依不饶，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缺乏对人的谅解精神。英国王妃戴安娜之死，传媒狗患队怎么说都难辞其咎。这种状况，连平等尊重都谈不上，又逞论亲和！

人们从小莉这么一位学习大众传播专业的科班出身的主持人的身上，一点儿都看不到咄咄逼人的传媒职业采访大官儿时，她的态度并不仅仅是平起平坐，而是更把对方看作有血有肉的人。政府官员的记者会往往不是枯燥乏味，就是剑拔弩张，而在1998年3月的新一届国务院领导人记者会上，小莉对朱镕基总理所提的问题，富有人情味，用港台语言来形容，就是很“感性”，朱总理的回答，也没有半点官腔或外交语言，充满了对香港、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片真情。采访老百姓时，小莉的态度也不仅仅是平等尊重，更有一种亲密无间的感觉。1996年11月她在上海的一家敬老院采访时，和那里的老人们亲如一家，简直就像他们的女儿。1997年初，她在武汉采访打捞中山舰的一群工人时，采访几乎要变成了联欢。

主持人绝不是大智大慧的化身，而是平民百姓的替身；不能摆俯视众生的架式，以为自己真是“无冕之王”。有人说过一句刻薄的话：“主持人一思考，观众就发笑。”小莉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不自以为是。1998年4月凤凰卫视开播两周年之际，凤凰卫推出一个新栏目——《小莉看时事》。这是一个思考型的栏目，小莉凭借多年的新闻工作经验，以敏锐的触角、灵慧的思维及对两岸三地社会情态的深入认识，把每周发生的重大事件，重新思考整理一番，做出自己的分析，使《小莉看时事》成为一个全新风格的时事追击、深入报道的专栏。在这个栏目里，小莉没有摆出大智大慧、俯视众生的架式，依然象一缕和煦的春风，吹拂着观众浮躁的心。笔者也曾主持过新闻评论节目，每天接触的都是沉重的主题，自己也变得一脸的苦相。其实我们的误区是我们不知道怎样“隔离”，我们感情用事地把自己的情绪带到了

节目里，并且把这种情绪传染给了观众。如果我们医生，我们就一定是那种每治一个病人就给自己留下一病种的医生（谢天谢地，没有这样倒）霉的医生）。小莉的聪明就在于她始终不把自己的情绪带到节目里去，始终相信观众的判断力，始终没有把自己当作救世主。

其实小莉并不是万事如意。1998年5月，南方的一家双周刊在中国的7个城市做了一次有关主持人的主题调查，调查报告的题目是>（题目的设置本身就是一个陷阱），几乎每一个被提到的主持人都有观众表示不能忍受，其中包括一般认为人气很旺的几个明星主持人，就连小莉也未能幸免（我相信如果设置的题目是“我最喜欢的主持人”，每个被点到名字的主持人又会个个都有人喜欢）。但是南方的这家双周刊的这次调查至少说明，一个主持人要讨一切人的喜欢几乎办不到。无怪乎电视学者、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先生曾感慨道：“主持人是个毁人的行当”，天真的小莉对此曾有过担心，她觉得既然观众有意见，那就一定是自己有不足有问题，她焦虑地说：“可是要叫我一脸痛苦，我实在做不出来的”。

小莉还遭遇过更大的误解。凤凰卫视1998年6月起播出了一个关于《小莉看时事》的栏目宣传片，这个宣传片的主体形象不是小莉，而是一只大大的虎皮青蛙。

在这个长度为20秒的宣传片里，小莉的形象只有3秒左右。片子一开始，是大红大绿的验光镜片的特写，镜片后是青蛙的眼睛，由虚变实；然后，这只青蛙全身现形，是一只很美丽的虎皮大青蛙。在这些画面上，相继出现了这些文字：“模糊不清？”“真假莫辨？”“视野广阔？”“全面真实清楚——只有在……”这时画面上出现了玩具般的开关，“off”、“on”，小莉出现在一个玩具式的电视机屏幕里，她平静而快速地说道：“谢谢你今天和我一起关心时事，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她只说了这句话，只出现了这么一会儿，而且那个小小的电视机还缩到一个角落里，给栏目名称“小莉看时事”五个字让地方。画面最后还又回到了那只美丽的青蛙身上，它戴着一副漂亮的时装蓝边眼睛，眼睛眨一眨地思考着什么。这是个被公认为构思奇妙、想象大胆的宣传片。但是有一个观众来信批评说，这个宣传片是把观众当作“癞蛤蟆把小莉当作“天鹅”。这种理解实在是太严重了。香港的创意者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花费千余港元从宠物商店买来的这只虎皮青蛙，竟被人看作是一文不值的癞蛤蟆这使我想起清朝的一个大冤案，翰林院庶吉士徐骏的一首诗中有这么一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有冤下指控这是“反清思明…徐骏被处斩，诗稿遭焚毁。其实徐骏并无“反清思明”的念头，“明月”不过是套诗家陈词。可见从古至今，我们都活得太累。

凤凰卫视的另一位主持人窦文涛说过：“评价艺员或主持人发迹，香港人很相信‘观众缘’。这是个说不清的东西，但一定是有的，有的人各方面都不错，可就是总也红不起来：有的人似乎不怎么样，但一上镜就很讨好。我常怀疑大众传播学是否能做到很科学，媒体与受众间一定存在一个不可知的神秘地带。当然也有句话是说，机遇只偏爱准备的人。（窦文涛：>）其实早在1970年，阿尔文·托夫勒就在>一书中，提出了“分众”（DEMASSIFICATION）这个概念。当时人们对托夫勒的观点或存疑或不理会。而如今的事实确是，传媒的受众，早已分化成各个不同的群落，因此则所有观众就不能等量齐观，等而视之，因此针对一切人的电视的作品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你要围攻特”

的观众群，因此你不得不放弃另外的观众。

不必对目标观众之外的观众太过在意，不要让他们左右节目的定位。这个概念十分重要。比如针对高文化水平观众的节目，可能不会得到文化水平较低的观众的认同，反之亦然；老人节目青少年观众可能不爱看，反之亦然。

观众是电视台的衣食父母，但请别忘了分众概念，并非所有的观众都是你的拥趸。

明星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有吸引力，有号召力，有个人魅力，但他们并不能做到完全的“人见人爱”，他们需要观众的理解和支持，但他们不能指望每一个观众都对他们没意见。小莉明白这一点，所以她始终无怨无悔，永远是笑意盈盈。什么样的人具有亲和力呢？小莉这样的人。

程鹤麟

她是吴小莉

吴小莉的正版自传要在大陆出版。

“这里是凤凰卫视中文台，吴小莉在香港主持。”自从电视成为我们精神消费的日常品——就像萝卜、白菜和猪肉对于我们的物质消费一样日常后，电视主持人就成了我们对门的邻居。

两年前，当张绍刚代表凤凰中文台扛着机器要采访我的时候，为了什么是“凤凰”给我解释得面红耳赤，谁能料到两年之后，凤凰中文台竟成了几亿人饭桌前的一道佐料和睡觉前的重新打量一遍世界的“包打听”呢，——你不知道世界今天会发生什么。

吴小莉亦然。虽然她在台湾通过华视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短短两年，她通过凤凰台又轻松地走入大陆几亿人的心中，你不能不警惕这世界有许多特质和勤奋的人——她（他）的心路历程一定不轻松，他（她）在坚持不懈地在与这个世界较量。

朋友们的日新月异，就是这个世界和地球同步滚动的一个（一些）动力也是使我们心情愉快的一个来源。

我还比较赞成凤凰台另一个节目的结束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它对于世界段落尾巴的揪断，是多么轻易和利索呀。

第一次见到吴小莉，是在前门烤鸭店的餐桌前——凤凰台请人吃饭，记得那个餐馆桌子腿椅子腿和服务生的腿林立——鸭子上来却不见腿。吴小莉开朗而疲惫——和电视上的容光焕发判若两人——为了捕捉到世界上一些新的风和雨，也把她给累坏了。直到喝了鸭汤之后，她才缓过劲来。她对人热情而礼貌，听人谈话神情期待和专注，脸向谈话者逼得很近——我除了判定她是一个富有教养的中国女性之外，还向她提出了一个有关视觉的问题：你是不是有些近视呀，她用劲地点了点头：是这样。记得那餐饭吃得非常愉快，张绍刚和程鹤麟讲了一些跳蚤、胡子和唱歌的故事除了把我笑得呛了酒和岔了气之外，我还明白了凤凰所以是凤凰——凤凰就诞生在跳蚤、胡子和唱歌之中，吴小莉所以是吴小莉——吴小莉就诞生在疲惫和奔波之后。

再次见到吴小莉，是在未熔基当总理的那天晚上，为了《故乡面和花朵》的签约，金丽红和黎波邀请一些朋友在三元桥附近的一家餐馆相聚。那

天傍晚是吴小莉在世界上大出风头的一个傍晚，在新一届中国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上，吴小莉和朱镕基有一番引起大家广泛注意的默契的对话。当吴小莉从大会堂赶到三元桥，大家都准备看到吴小莉容光焕发的表情。但是吴小莉赶到之后，神态却非常平静，马上就投入到吃饭和朋友们的谈笑之中。当大家回过头有问记者招待会上的情况时，吴小莉仍平静他说：这是我的职业。接着又引导大家继续别的话题。如果吴小莉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的话，这种对于世界荣辱不惊的心态，一定会推动她在这个世界上走得更远——我再一次明白了吴小莉所以是吴小莉。

——吴小莉所以是吴小莉，就是吴小莉这本自传的主旨。我像这本书的许多读者一样，更多时候见到吴小莉，是在每天晚上的电视上。现在她主动由电视上走到了生活中和她过去的历史，由台前走到了幕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本书，她的历史和幕后，看到一个人由童年到成年，由胖到瘦，由努力到成功的一段过程——当然更重要的，我们通过这些质朴的文字，看到了这样一个关于人生和过程的普遍真理：苛求自己，比要求别人更加重要。

给吴小莉这本书的跋就是这样。

刘震云

1998年12月30日北京十里堡

